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游鑑明博士 劉維開博士

跨時代的婦女期刊：以《婦女旬刊》為例
(1920-1948)

研究生：黃健傑 撰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



跨時代的婦女期刊：以《婦女旬刊》為例(1920-1948)

《婦女旬刊》為浙江省最早的婦女刊物，由杭州中華婦女學社社長張儷娟為響應新文化運動，與丈夫和友人一同創立發行。該刊於1920年6月創刊，1937年至1945年中日戰爭期間停刊，直至1946年9月復刊，最後停刊於1948年12月，並曾於1925年、1926年發行《婦女旬刊彙編》2集。

本文認為刊物生產過程主導文本走向，因此先對《婦女旬刊》發行歷程、經營行銷策略、廣告內容形式進行研究。中華婦女學社雖然資金有限，但在編者妥善運用社會關係網絡之下，仍能維持《婦女旬刊》發行，並影響著編輯群、執筆陣容和文本內容的改變，進而使《婦女旬刊》可分為新舊文化交融、民俗學研究，以及戰後重視家庭與婦女關係等三個時期，女性形象也隨著時代演進而有不同的呈現方式。然而，即便《婦女旬刊》有著多重轉變，但試圖擔任新思想與舊道德間緩衝、溝通的橋樑，以及循序漸進的啟蒙者角色，卻從1920年創刊一路跨時代地延續到1948年停刊為止。

關鍵詞：婦女旬刊、期刊史、婦女史、社會關係網絡



謝辭

2013年，大學三年級，我在政大歷史系修習毛知勵老師開設的近代中國婦女史課程，開啟我對婦女史的興趣。撰寫學期報告時，偶然閱讀到恩師，也是此篇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游鑑明老師的文章：〈是為黨國抑或是婦女？1950年代的《婦友》月刊〉，那一刻我才知道原來期刊做為史料可以如此研究。在毛知勵老師、楊瑞松老師的推薦信協助之下，我成功進入政大歷史研究所。第一學期便修習游老師開設的近代中國與台灣婦女史，並在學期末向老師表達入「師門」的意願。非常感謝老師願意擔任我的指導教授，並引領我參加中研院近史所歷史記憶讀書會、西洋婦女史讀書會，去年更協助我獲得蔣經國基金會補助，前往杭州、上海閱讀論文重要史料，開拓我的學術視野。碩士班期間曾經歷許多變故，加上外務繁忙，導致論文延宕，所幸老師願意相信我、鼓勵我，甚至在最後關頭扮演「24小時便利商店」，不辭辛勞地幫我逐字逐句審視論文，來往稿件中的每一筆追蹤修訂都是老師對我的悉心照顧，對老師的感謝確實千言萬語。

感謝校內指導教授劉維開老師。大學時，劉老師的課程使我對於近代中國有著較全面的認識，令我撰寫論文時不至於「見樹不見林」，中國現代史史料分析課程更是教導我如何運用各種資料庫獲得史料。同時也謝謝劉老師去年與游老師一同協助我前往杭州、上海蒐集資料，如此才能順利完成論文寫作。感謝口試委員與工作上的老闆連玲玲老師。三年前，連老師讓我加入近史所工作團隊，老師常說：「不要只把自己當工讀生，要想想這份工作對自己的研究有甚麼幫助。」我很開心的向老師報告，因為這份工作才讓我知道社群關係如何運用於史學研究之上，進而促使這本論文的誕生。

特別感謝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補助，讓我在2018年7月9日至8月31日得以前往杭州、上海進行碩士研究生赴國外短期研究計畫，也非常感謝承辦人林小姐的協助。

感謝所有政大歷史系老師八年來的教導，感謝崔國瑜老師、彭明輝老師給予我課程、教學助理的機會，感謝張曉寧助教、張嘉玲助教、張真榮助教、姚政志助教多年來的照顧，不論是在心靈層面或是口腹之慾。感謝中研院近史所蔡蓉茹小姐、林明宜小姐、陳建安先生、政大附中徐靜欣學姐、李美慧學姐、陳敏雀學姐、洪佩鈺學姐、張哲維學長在工作上的協助。感謝高登補習班、政大附中的學生們，讓我有教學相長的機會。

感謝葉韋君學姐、柯佳昕學姐、許惠雯學姐、黃宇暘學長、黃聖修學長、侯嘉星學長、吳雅琪學姐、楊勝傑學長、鄭啟瑞學長、呂鴻祺學長、范育成學長、陳皓昕學長、衛姿仔學姐、李亞喬學姐、曾令儀學姐、歷史記憶讀書會、西洋婦女史讀書會的各位學長姐、政大歷史男子團體「喬傑宇」的張睿宇、楊文喬，一起念書的林明、姚涵之、許詠怡、曾譯緒、周亞澄、曾雨涵、陳頌閔、陳詩翰、蔡佩淇、高于鈞、丁於堂、林韋聿、曾幸麒、盧梓滿、台大鄧沛力、師大許維安、許臻芸等同學，謝謝你們在學術及生活上的各種協助。

感謝我的同門陳南君，妳的「南南智語」陪我度過不少低潮。

感謝摯友魏怡仙、戴敬珈、李芳睿，謝謝妳們陪我度過這麼多風風雨雨。感謝邊 CLUB、CCXS 聖寶、政大中友會好ㄉ團、課程組、Gina、政大歷史 99 級、Maggie、Emily、王繹喬，以及所有在這八年內陪伴我的朋友們，每次出遊都要你們聽我講古，真是辛苦了。

感謝最特別的友人夏敏軒，還有最可愛的香香香奈兒。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家人，爸爸、媽媽、哥哥，以及新成員嫂嫂季青，謝謝你們以各種方式支持我念歷史，體諒我的任性，我愛你們。

黃健傑 誌於

新店德正街

2019 年 8 月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一、研究動機	1
二、近現代刊物發行與女性議題研究概況	4
三、內容架構	10
第二章 中華婦女學社與《婦女旬刊》的營運策略	11
第一節 浙江省第一份婦女期刊	11
一、《婦女旬刊》出版始末	11
二、《婦女旬刊》的內容樣式	14
三、杭州中華婦女學社	15
第二節 《婦女旬刊》行銷策略	21
一、封面圖畫設計	21
二、名人題字	29
三、廣設營業處、經銷處	32
四、增加刊物曝光度	41
第三節 《婦女旬刊》的廣告	45
一、《婦女旬刊》作為贈品	45
二、《婦女旬刊》作為商品	47

三、《婦女旬刊》內的廣告刊登與社會關係網絡.....	49
四、商品介紹與性別意識.....	55
第三章 《婦女旬刊》的編輯策略變化.....	60
第一節 新舊文化交融時期.....	61
一、《婦女旬刊》中的文學社團.....	61
二、新舊共存，態度中庸.....	65
三、《婦女旬刊》的文章欄目.....	70
第二節 民俗學研究時期.....	71
一、《婦女旬刊》中的杭州中國民俗學會.....	71
二、民俗學與《婦女旬刊》.....	76
第三節 戰後復刊時期.....	77
第四章 《婦女旬刊》中的女性多元形象.....	81
第一節 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82
一、品學兼備的才女.....	82
二、小說中的悲情女子.....	85
第二節 女性的社會角色.....	89
一、高尚人格的養成.....	89
二、職業婦女與婦女回家.....	93
三、她山之石.....	99
第三節 女性的居家責任與功能.....	103
一、既是良母亦是國民之母.....	103
二、一家之主.....	108

第五章 結論	111
一、期刊研究的新方法：刊物中的社會關係網絡.....	111
二、「跨時代」的《婦女旬刊》	112
徵引書目	117
一、中文書目.....	117
(一)期刊、報紙史料.....	117
(二)圖書館出版品	117
(三)工具書、史料彙編.....	118
(四)專書	119
(五)期刊、專書論文.....	121
(六)學位論文.....	123
二、英文著作.....	123
附表	125
附表一 題字人出現次數和年份.....	125
附表二 《申報》中的《婦女旬刊》贈書廣告.....	128
附表三 1922-1930年作者文章數量表.....	132

圖片目錄

圖1：贊助者經太夫人.....	18
圖2：贊助者樊太夫人.....	18
圖3：社長兼總務部主任張儷娟.....	18
圖4：營業部主任何慨秋.....	18
圖5：編輯陳蘭言.....	19
圖6：編輯顧幻音.....	19
圖7：編輯顧菊蝶.....	19
圖8：幹事部主任樊信初.....	19
圖9：海外通訊記者陳玉壺.....	20
圖10：1922年 期86.....	27
圖11：1923年 期97.....	27
圖12：1924年 期143.....	27
圖13：1926年 期211.....	28
圖14：1928年 期264-265.....	28
圖15：1935年 卷19期2.....	28
圖16：1935年 卷19期5.....	28
圖17：1935年 卷19期1.....	31
圖18：1924年 期151.....	31
圖19：1925年 期184.....	31
圖20：1933年 卷17期25.....	31
圖21：1929年 期301.....	31
圖22：1922年《婦女旬刊》銷售分布.....	37

圖23：1923年《婦女旬刊》銷售分布	38
圖24：1928年《婦女旬刊》銷售分布	39
圖25：1946年《婦女旬刊》銷售分布	40
圖26：《婦女旬刊》卷19期8 封面.....	75
圖27：《婦女與兒童》卷19期8封面	75
圖28：《婦女旬刊》卷19期8 首頁.....	75
圖29：《婦女與兒童》卷19期8 首頁.....	75
圖30：《婦女旬刊》卷19期8 出版資訊	76
圖31：《婦女與兒童》卷19期8 出版資訊	76

表目錄

表 1：《婦女旬刊》延誤出版期數表.....	13
------------------------	----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

自 1898 年 7 月 24 日《女學報》在上海創刊以後，婦女報刊正式進入歷史舞台，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婦女報刊更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期刊做為新的傳播媒介延伸了人的視野，重構時空網路，也使女性有了一個新的發表空間。¹隨著時代的進步與發展，女性不僅是大眾媒體和觀眾關注的對象，知識女性也逐漸掌控一些報刊、雜誌的話語權，試著建構自己的形象。如同季家珍《民國鏡象》所述，女性不再只是客體被凝視，她們也展現主體性凝視與創作被凝視者。²藉由婦女期刊研究可以看出當時女性對於時代的認識，以及如何自處。

現今對於五四時期的婦女報刊研究多關注於上海地區，尤其商務印書館出版《婦女雜誌》最為研究者青睞。該刊的發行時間長，發行單位商務印書館在民初出版業擁有重要地位，加上《婦女雜誌》編輯群和文章撰稿人多屬當時重要知識份子，文章內容涉及面向多元，除了婦女問題，也觸及家庭生育、醫藥衛生、廣告宣傳等，相形之下位處杭州，且非由知名出版社發行的

¹ 蔡佳儒，〈新女性與舊文體——呂碧城研究〉（南投：暨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頁45。

² Joan Judge, *Republican Lens: Gender, Visuality, and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婦女旬刊》則被研究者邊緣化。

《婦女旬刊》誕生於新文化運動時期，並持續發展直至中日戰爭結束，即便 1937 年至 1946 上半年停刊，但橫跨 1920 至 1940 年代足以使人從中窺探近 30 年間文化變遷樣貌，理解期刊出版與社會文化變遷如何互相影響。此外，《婦女旬刊》還可以讓研究者思考：一份長期面臨資金壓力、稿件不足的期刊如何在市場中生存？

按總編輯張儷娟回憶「辦報原非易事，早開夕閉者各地皆有」，創刊之初由於缺乏稿件，因此向「舊文字」社團秋聲編譯社、閩聲社購買文稿，使得婦女旬刊在 1925 年以前出現大量「舊文學」、閩秀詩話等「鴛鴦蝴蝶派」刊物的內容。³刊登這類內容雖看似杭州婦女學社創刊宗旨「響應新文化運動而創立」互相矛盾，但對於出版社而言，能有稿件持續刊登，維持刊物出版才是重要的事情。若是刊物停刊，縱使有再多的理想抱負皆無法傳播，因此張儷娟抱持著「先求有，再求好」的態度，先盡力發行刊物，培養市場價值，從過程中賺取廣告費和知名度，再將所得利潤拿去購買或聘請知名作家提供文稿，使《婦女旬刊》得以維持正向循環。

此外，若只以文字形式或體例就將《婦女旬刊》認定為舊式刊物，即落入新文化運動以來，對於「德先生」、「賽先生」的高估。過去新文化運動似乎已被單一解釋為中國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或知識革命，德先生、賽先生也被當作國家命運唯一的解藥。⁴然而此種想法不僅簡化了新文化運動時的內部差異，也忽略張儷娟以「舊瓶裝新酒」的編輯方式，用過去讀者習慣的文章體例雜揉社會中的新思想。

觀看《婦女旬刊》文章可以得知，雖然在 1920 年的出版時多以小說、詩

³ 張儷娟，〈編輯紀略〉，《婦女旬刊彙編》，期1(1925)，頁1。

⁴ 王飛仙，《期刊、出版與社會文化變遷：五四前後的商務印書館與《學生雜誌》》（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2004），頁1。

詞為主，論說為輔，但實際小說、詩詞等內容卻包含諸多婦女議題，例如職業女性、婦女回家論戰、娼妓問題、新女性、戀愛觀、社交公開、婦幼教育、婦嬰衛生、國民責任、響應國貨運動、異族女性的凝視、閨秀詩話、新舊文學、小說詩歌等。雖然 1935 年《女青年月刊》上曾出現一則因《婦女旬刊》支持「婦女回家」的批判文，認定《婦女旬刊》是一本「思想太陳腐，好像一個又老又舊的封建老太婆」的期刊，⁵但不論《婦女旬刊》的立場為何，中華婦女學社願意藉由《婦女旬刊》提供論者討論園地，來回應時局變化，開創討論空間，或與其他刊物進行討論的行為本身即是新文化運動下的行動者。《婦女旬刊》的評語凸顯五四新文化時期的婦女期刊並非一言堂，同樣是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關注的議題和方式如此相近，但在立場上卻保有歧異。

《婦女旬刊》除了曾被看為文學性質刊物，也曾被視為民俗學研究刊物。除了解放、自由、民主、科學等進步理想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而起，1930 年的杭州也興起民俗學研究熱潮。五四的愛國運動起源於巴黎和會，但除了山東問題，列強侵擾邊疆地區使得知識份子認知到中國並非僅由漢族構成之單一民族國家，因此邊疆民族成為國族建構的重要環節，歷史學家、民族學家得藉由歷史證明邊疆對中國「內部」的重要性與不可分割。中國民俗學運動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興起，民間歌謠、地方習俗反映大眾心聲，民俗研究者將其蒐集後分析，不僅得以理解民間文化，還可建立地方、民族認同，更為重要的是將各民族納入「中華」國族建構之中。1921 年，在周作人影響下，《婦女雜誌》第 7 卷開闢了「民間文學」、「風俗調查」專欄。⁶《婦女旬刊》則是在 1935 年時，因為編輯團隊由杭州中國民俗學會接手，所以開始系統性地出現民俗學研究，藉由民間文學、歌謠，或是記錄非漢族女性的生活風貌，提供讀者另一種對女性形象的認識與塑造。

自 1935 年第 638 期〈兒童故事專號〉刊登後，《婦女旬刊》更是在女性、

⁵ 白芸，〈評《婦女旬刊》復興號〉，《女青年月刊》，卷14期，頁215-20。

⁶ 王文寶，《中國民俗研究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頁43-53。

民俗學議題以外，延續先前「婦女回家」論戰，增加許多家庭經營和養育子女的討論。此種將女性與家庭、兒童結合的做法，不僅僅是增添刊物的多元論述，其中言論更多是承襲清末民初以來的「強國保種」觀念，認為養育子女是母親的天職，家庭和睦將使孩子們有良好成長環境，有健全教育的孩童方能成長茁壯為優等國民，使國家興盛。雖然中日戰爭爆發後刊物停刊，但此種女性與家庭、兒童的論述在戰後復刊後仍延續討論直到停刊為止。

藉由以上敘述可知，中華婦女學社會依照各時期時局變化，調整《婦女旬刊》的經營方式和文章。但按照編輯所言，中華婦女學社缺乏資金支撐，卻能發行刊物長達 18 年，故本文將先解析中華婦女學社的營運策略和刊物行銷技巧，其次研究發行期間《婦女旬刊》風格變化與編輯群的關聯性，最後則是探討《婦女旬刊》中的女性形象是如何被展現和建構。

二、近現代刊物發行與女性議題研究概況

目前學界對《婦女旬刊》尚無專文研究，僅有為了找尋周作人、郁達夫、戴望舒、施蛰存等作家散落在各類文本中的論文。⁷或是探討民國時期閨秀詩話作品時，找到《婦女旬刊》在 1926 年以前刊登的各相關專欄。潘靜如〈近代雜誌所載閨秀詩話考論〉考證 1911 年至 1947 年，各期刊中出現的 27 種

⁷ 李妮文，〈關於《婦女旬刊》上周作人的幾篇佚文〉，《文教資料》，期36(2013)，頁12-13；李妮文、唐東堰，〈從佚文《惟有孟母可作女範》看周作人的人格理想與家庭教育思想〉，《東華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33期1(2014.03)，頁20-22；宮立，〈郁達夫的〈答《申報·婦女園地》沁一先生〉〉，《郭沫若學刊》，期109(2014)，頁39-40；陳丙瑩，〈戴望舒早期文學創作鈞沉〉，《新文學史料》，期1(2014)，頁132-140；徐曉虹，〈詩蛰存早期作品鈞沉〉，《新文學史料》，期4(2009)，頁132-133。

閩秀詩話種類和專欄。此文雖為日後研究者提供線索，但對於各刊物為何記載閩秀詩話並未做出更進一步研究。⁸傅宇斌〈晚清民國報刊所見詩畫書錄〉也整理 1872 年至 1949 年報刊中以文言文撰寫之詩歌、雜說，其中也列舉《婦女旬刊》中專欄。⁹

新文化運動時期，文人結社的傳統仍未消除。城市興起後，眾多思想浪潮在此激盪，面對高度異質性的社會，文人結社除了撰文切磋、以文會友外，更是希望能在新舊觀念衝擊、對立之下，能藉此尋找自我認同和群體歸屬。不過此時的結社識友也不再囿於時空限制，報紙、雜誌出現和發行使得不同群體的社團得以藉此抒發理念，迅速崛起的報刊，大致形成商業報刊、機關報刊、同人雜誌三種類別。不同的運作模式，源於相左的文化理念，也顯示不同的編輯策略。注重商業利益的《東方雜誌》、《婦女雜誌》等，關注市場需求，滿足讀者所好；代表學會、團體或政黨立場的《新民叢報》、《民報》等，旗幟鮮明，不隨大眾喜好變換立場；數量極多的同人雜誌，追求相同理念，但缺乏穩定的財政支持，且作者圈子太小，稍有變化，當即人亡政息。¹⁰

《婦女旬刊》是介於商業報刊和同人雜誌之間，或是更準確地說，是以商業報刊營利為目標，但運用同人雜誌編輯群、作者群的方式來撰稿，既迎合時代變化、市場所需，也能為各社團提供創作空間，雙方以互利共生的方式相互依存。余夏雲、趙林就是探討新、舊文學社團如何影響期刊編輯方式，並運用報刊空間宣揚社團理念，拓展影響力。¹¹曹禮軍、李國平、陳香杏、葉中強等研究同樣探討文人如何透過創立社團、辦報、投稿期刊等方式擴展社

⁸ 潘靜如，〈近代雜誌所載閩秀詩畫考論〉，《漢語言文學研究》，期3(2014)，頁50-56。

⁹ 傅宇斌，〈晚清民國報刊所見詩畫書錄〉，收入趙敏俐編，《中國詩歌研究動態：第十四輯古詩卷》（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頁327-347。

¹⁰ 陳平原，《新文化的崛起與流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13。

¹¹ 余夏雲，《雅俗之爭：新文學與鴛鴦蝴蝶派的場域佔位鬥爭考察(1896-1949)》（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4）、趙林，《清末民初浙江新舊文化與文學》（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4）。

會網絡。¹²

中華婦女學社雖然缺乏資金支撐，卻能維持刊物穩定發行多年，不僅響應新文化運動，並成功在社會上引起讀者討論，歸功於《婦女旬刊》的行銷策略得當。出版社既利用人際關係網絡增加市場曝光度，還追尋社會文化變遷更動編輯團隊。王飛仙認為過去五四思想研究多注意期刊文章內容間彼此的關係和脈絡，但甚少注意到，要解開「五四新文化運動如何發聲影響？」這個課題，必須先探討期刊這個作為知識傳播的載體。著眼於此，《期刊、出版與社會文化變遷：五四前後的商務印書館與《學生雜誌》》一文除了關注刊物內的言論，更重視商務印書館是如何因應時局和社會文化變遷更改行銷策略。¹³李家駒雖不集中研究某份刊物，但嘗試以書籍出版史的角度，從機構、人員、出版量、市場等關鍵詞做為切入點，探討商務印書館如何透過出版手段迎合或塑造知識，和圖書市場，以及出版社與知識份子間的互動關係。¹⁴

編輯團隊的更動對刊物造成最大的影響顯現在刊物風格的轉變，因此若能對知識生產團隊進行深入研究，將可以從中得知《婦女旬刊》為何在各個時期展現不同樣貌。如同孔令芝《從《玲瓏》雜誌看 1930 年代上海現代女性

¹² 曹禮軍，〈近代報人小說家群體的代際興替與時代特徵〉，《求是學刊》，卷43期4(2016)，頁108-115；李國平，〈保守主義：吳地現代報人的文化選擇：以1920年代的《晶報》文人群體為中心〉，《蘇州教育學報》，卷32期1(2015)，頁26-31；陳香杏，〈清末民初文人的社會網絡：以上海南社為個案研究(1909-1923)〉，《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期8(2009)，頁141-171；葉中強，〈遊走於城市空間：晚清民初上海文人的公共交往〉，《史林》，期4(2006)，頁80-86、131。

¹³ 王飛仙，《期刊、出版與社會文化變遷：五四前後的商務印書館與《學生雜誌》》頁3。

¹⁴ 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7)，頁11。

形象的塑造》在研究方法中所強調的，要徹底了解一本刊物的性質和時代意義，就得從知識建構背景進行研究，包括刊物的出版社背景、編輯群、作者群、讀者群、廣告內容、編輯策略、欄位編排、甚至是封面外觀等，但作者指出礙於史料限制，對於編輯群僅能關注於主編和專欄編輯，執筆陣容則是確認作者大多為名媛和女學生，但這些撰稿者之間是否還有進一步的社會關係，如校友、師生等，並無進一步分析。¹⁵相同的研究方法亦可見於游鑑明〈是為黨國抑或是婦女？1950年代的《婦友》月刊〉。雖然該研究與《婦女旬刊》時代並未重疊，然而文中指出如果資料充份，研究者對於知識生產過程也應該一併研究，編輯者與投稿人、刊物與閱讀主體之間的權利和互動關係不容忽視。分析知識生產背景和進行文本分析的研究固然能顯示報刊與現實社會的連結，但是進一步分析編輯群、作者群甚至是讀者群之間的社會關係網絡，更能將知識創造的過程呈現出來。

回顧《婦女旬刊》中的文章議題大致可以分為戀愛、婚姻、家庭、女子教育、婦幼教育、非漢族女性民俗調查、閩秀詩詞、政治參與，並曾出版「生產節育專號」、「婦女戀歌專號」、「兒童文學」、「國貨專號」等具有主體性專刊。在近代中國諸多女性刊物裡，最為研究者青睞，且文本分析成果最為豐富的婦女期刊為《婦女雜誌》。第一份針對《婦女雜誌》所作的綜合性論著是 Jacqueline Nivard 的“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 1915-1931*”，Nivard 強調此雜誌在五四時期的影響力和貢獻。¹⁶而周敘琪認為《婦女雜誌》中的家庭、婚姻、社交等討論呈現出當時婦女實際的生活情形。¹⁷

¹⁵ 孔令芝，《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的塑造》，頁10。

¹⁶ Jacqueline Nivard, “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 1915-1931*,” *Republican China* 10-1b(Nov. 1984), p.37-55. 轉引自孔令芝，《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的塑造》(臺北：稻鄉出版社，2011)，頁8。

¹⁷ 周敘琪，《1910-1920年代都會新婦女生活風貌：以《婦女雜誌》為分析實例》，臺

2004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發行《婦女雜誌》研究專號，學者們分析雜誌內容、性別秩序、性別差異、娼妓問題、醫事衛生顧問、女性文學與新舊文化衝突、節育政策、日本在雜誌17年刊行期間日本女性觀的變遷，以及比較和分析《婦女雜誌》和韓國《新女性》中的兒童論說。¹⁸之後游鑑明探討《婦女雜誌》對近代家政知識的建構，¹⁹葉韋君分析《婦女雜誌》通信欄與讀者投書，²⁰或是如簡金生〈民國時期漢人對西藏婦女的情色化想像〉更是藉由民族主義角度切入，探討漢人如何在報章雜誌和個人著作中書寫西藏和宣傳西藏的論述，藉由觀看西藏女性的身體和生活，製造與漢族女性的對比，甚至期望漢族女子能學習其放足、參與勞動的精神。²¹

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叢刊，1996年。

¹⁸ 陳姪媛，〈《婦女雜誌》(1915-1931)十七年簡史—《婦女雜誌》何以名為婦女〉、江勇振，〈男人是「人」、女人只是「他者」：《婦女雜誌》的性別論述〉、許慧琦，〈《婦女雜誌》所反映的自由離婚思想及其實踐—從性別差異談起〉、姚毅，〈「犧牲者」、「受害者」言辭的背後—以《婦女雜誌》的娼婦論述為中心〉、張哲嘉，〈《婦女雜誌》中的「醫事衛生顧問」〉、胡曉真，〈文苑、多羅與華髮——王蘊章主編時期(1915-1920)《婦女雜誌》中「女性文學」的觀念與實踐〉、呂芳上，〈個人抉擇或國家政策：近代中國節育的反思—從1920年代《婦女雜誌》出版產兒制限專號說起〉、須藤瑞代，〈《婦女雜誌》與日本女性：「同為女人」在近代東亞的意涵〉、池賢淑，〈《婦女雜誌》(1915-1931)中出現的有關兒童的論說——與《新女性》(日帝治下的朝鮮)比較〉，以上皆收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2期。

¹⁹ 游鑑明，〈《婦女雜誌》(1915-1931)對近代家政知識的建構：以食衣住為例〉，收錄游鑑明著，《當二十世紀中國女性遇到媒體》(臺北：五南出版社，2017)，頁317-346。

²⁰ 葉韋君，〈個人經驗與公共領域：《婦女雜誌》通信欄研究(1915-1931)〉，《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29(2017年)，頁21-104。

²¹ 簡金生，〈民國時期漢人對西藏婦女的情色化想像〉，《新史學》，卷25期3(2014.09)，

上述性別議題皆曾出現於《婦女旬刊》之中，然而《婦女旬刊》卻未受到矚目，除了不在上海發行、擁有知名出版社之外，其原因很可能與《婦女時報》相似。季家珍 *Republican Lens: Gender, Visuality, and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通過對《婦女時報》內容地毯式、全面詳盡的分析，將史料與議題的討論置於民國初年中國社會變革的脈絡之中，並思考《婦女時報》近期才被研究者關注的原因可能是新文化運動中的知識分子們所造成，因為該刊有許多作者被畫歸為「鴛鴦蝴蝶派」，且有許多以文言文寫作的文章，因此在當時知識分子眼中不啻是本「舊刊物」；²²胡曉真《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清末民初上海「傳統派」文人與閨秀作家的轉型現象》亦結合時代背景，並講述傳統派文人對刊物的影響。當中的論點可以進一步思考，《婦女雜誌》中設立「文苑」專欄蒐羅閨秀作品歸因於主編王蘊章對於舊式文學和女性文學的喜好，並商業性地思考市場接受度。²³由此可推論《婦女旬刊》編輯群，或許也存在著相同的文學偏好和市場衡量，使得《婦女旬刊》中也出現了類似的專欄。賀麥曉(Michel Hockx)《文體問題—現代中國的文學社團和文學雜誌(1911-1937)》除了分析文學社團與文學雜誌的密切連結，更進一步回應何謂「五四新文學」，賀麥曉質疑過去許多研究將新文學與五四文學畫上等號，但事實上新文學只是五四文學中的一種類別。²⁴

在這基礎上，本文將先以中華婦女學社與《婦女旬刊》做為探討主題，藉由刊物中的社群關係網絡分析刊物的發行策略以及風格轉變，之後再討論民國時期的女性形象如何在各刊物中呈現以及被呈現。

頁 103-142。

²² Joan Judge, *Republican Lens: Gender, Visuality, and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²³ 胡曉真，《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清末民初上海「傳統派」文人與閨秀作家的轉型現象》（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

²⁴ 賀麥曉，《文體問題—現代中國的文學社團和文學雜誌(1911-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三、內容架構

本文透過《婦女旬刊》的出版社、行銷策略、編輯群、執筆陣容和內容，探討《婦女旬刊》如何以少量資源在 1920 至 1948 年間，於文化市場中站有一席之地，並且觀察發行的 18 年內，女性形象是如何形塑與被形塑。

第一章緒論部分，研究動機陳述外，並回顧相關研究成果供本文借鏡。

第二章是對中華婦女學社與《婦女旬刊》的營運策略做全盤分析。清末民初以來知識分子擅於利用報刊宣揚思想，和關懷社會議題，中華杭州婦女學社即承繼此方法創辦《婦女旬刊》，但不同於商務印書館擁有龐大資金援助，《婦女旬刊》的編輯時常在「編後語」講述籌款辦刊的艱辛過程，其中刊物「告白」便是重要資金來源，編輯們透過優化刊物內容提高購買率，以此吸引廣告上門刊登，之後再利用廣告費用邀請知名作家、文學社團為刊物供稿，《婦女旬刊》就是藉此經營模式維持刊物運作。第一節就《婦女旬刊》發行始末、刊物版形樣式、出版單位中華婦女學社進行全盤考察；第二節分析《婦女旬刊》行銷策略，包括封面設計、名人題字、增設營業處、經銷處、增加刊物曝光度等；第三節討論《婦女旬刊》的廣告，其中又分為《婦女旬刊》作為贈品、商品刊登於其他刊物的廣告，以及《婦女旬刊》內的廣告刊登與社會關係網絡，最後是商品與性別意識的連結。

第三章是將《婦女旬刊》分為三個時期，探討每一時期刊物風格演變的原因。第一節是新舊文化交融時期，在這時期裡文學社團扮演重要角色，影響刊物欄位編排與文章形式、內容；第二節民俗學研究時期，探討杭州中國民俗學會的歷史以及它為《婦女旬刊》帶來的改變；最後是戰後 1946 年復刊後的《婦女旬刊》，可以明顯看出此時期與先前兩時間的文章形式有明顯斷裂，內容也改成婦女與家庭、兒童的關係。

第四章則論述《婦女旬刊》中的女性多元形象。首節呈現的是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包括品學兼備的才女、小說中的悲情女子；第二節講述女性被塑造的社會角色，如追求高尚人格的養成、職業婦女與婦女回家的對立，以及民俗學研究呈現的非城市、非漢族女性的樣貌；第三節承繼婦女回家和男性對女性的居家責任與功能設定，解析女性、母親與國民之母的關係，以及一家之主須掌握何種家政知識，學習持家。

第五章結論，以兩個方向綜述第二到四章的內容，分別是刊物中的社會關係網絡，以及編輯張儷娟如何自處、面對新文化運動。

第二章 中華婦女學社與《婦女旬刊》的營運策略

第一節 浙江省第一份婦女期刊

一、《婦女旬刊》出版始末

《婦女旬刊》為浙江省最早的婦女界刊物，由杭州中華婦女學社編輯發行，創刊於1920年12月，原則上每10日發行一期，發刊時間跨越1920、1930至1940年代，發行期間曾兩次停刊，共計發行18年。首次停刊是因為1924年江浙戰爭，該年9月起，經社員開會決意躲避戰亂，暫遷至上海，兩個月之後方回杭州，不過主編也表示因為戰爭使得商業大半停頓，廣告的數量與稿件的質量均比以往差。²⁵另一次停刊是因為中日戰爭爆發，中華婦女學社由杭州遷移至蘇北、鹽城、興化、泰興、泰縣一帶兩年，後因戰事轉往浙東、寧波、金華等縣，1942年又因戰火波及遷往江西上饒、鉛山、福建崇安、南平、永安、連城、福建廣東邊境，直至1946年9月，在國民黨中央宣

²⁵ 張儷娟，〈新希望〉，《婦女旬刊》，期167(1925年)，頁5。

傳部、內政部核准下復刊，續出第 721 期。²⁶最後停刊於 1948 年 12 月 749 期。另出有《婦女旬刊彙編》第 1-2 集，收錄 1920 年創刊至 1925 年間的重要文章。²⁷目前能找到最早的《婦女旬刊》是 1922 年第 81 期，對於此期以前的出版、行銷情況和刊物內容研究，只能依照《婦女旬刊彙編》中整編的史料，或是時人於其他報紙、期刊、書籍提及的資訊。

《婦女旬刊》1920 年初創時，每期僅如同報紙般刊載一小張，至 1921 年 7 月後因銷量提升，收入增加，才將版面擴大一倍成為一大張，並增加刊稿數量，隨後再因銷量增加，於 1922 年 7 月第 74 期起，將原有的新聞紙式出版形式，改以書卷單行本出刊。由於史料闕如因而無法得知新聞紙式一小張、一大張的原始尺寸。單行本的大小經查閱浙江圖書館孤山古籍部所藏 1923 年《婦女旬刊》第 124 期原件可知，寬約 16.2 公分，長約 27 公分，²⁸與 1934 年上海 China Commercial Advertising Agency 出版，林振彬編寫英文書籍 *China Publishers' Directory* 《中國報紙雜誌指南》所述，每頁寬 5 1/4 英吋，約 13.34 公分，長 8 3/4 英吋，約 22.23 公分接近。²⁹編者張儷娟形容《婦女旬刊》由一小張至一大張，再至單行本的三個時期，恰如嬰兒「呱呱墜地至牙牙學語」。

³⁰

儘管《婦女旬刊》自 1922 年以來皆以單行本出刊，但十日之內須完成集

²⁶ 梅，〈告讀者〉，《婦女旬刊》，期721(1946年)，頁1。

²⁷ 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杭州圖書館編，《杭州歷史大事記》(杭州：方志出版社，2006年)，頁639。

²⁸ 2018年7月，因獲得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獎學金，得以前去杭州浙江圖書館孤山古籍部翻閱《婦女旬刊》原件。

²⁹ 1934年，林振彬，*China Publishers' Directory* (Shanghai: China Commercial Advertising Agency, 1934)，p.6.

³⁰ 張儷娟，〈婦女旬刊社十年來之經過〉，《婦女旬刊彙編》，期2(1926年)，頁10。

稿、編輯、印刷、出版、郵寄等所有出版事宜實屬困難，使得刊物延宕出版屢屢發生，編輯只得在刊物中向讀者致歉，各期延期出版原因見表一。

表1：《婦女旬刊》延誤出版期數表

91 期 〈編輯室燈下〉	編輯事繁，這期遲二天出版，實在抱歉
95 期 〈十日一敘〉	本刊因印局的原故，屢次誤期，實在抱歉，本期特為趕早付印，請閱者原諒
99 期 〈編者之餘墨〉	本刊因印局的關係所以遲誤了五天，本刊排印向由何慨秋君親自辦理，現在慨秋患眼疾還未十分全好，所以對於閱者抱歉很深
101 期 〈十日一敘〉	今年以來因受陰曆年關的影響，屢次本刊都誤期，對於閱者是抱歉萬分，實在是印刷工人仍守舊俗，因此排印上大受延誤，同人再三設法，自下期起已仍照舊例逢五出版以答閱者之雅望
261-263 期 〈敬告閱者〉	去冬因承印局被焚，並將本刊 259 暨 260 兩期，均已毀於火中，不克再印，今春付印，又因其他印局規模狹小，每月印刷三期，均不克負責印成，不得已自 261 號起，暫改每月一本，對於材料已較前加增
264-266 期 〈編者言〉	本刊因受印局工忙的原因，每旬不能出版，不得已暫為一月一本
17 卷第 3 期 〈本刊緊要啟事〉	本刊自發行以來，深蒙海內外讀者諸君一致維護，不勝感恩。近因整頓社務及本刊內容以致延誤出版日期，並累各界殷殷垂詢本社實抱萬分歉疚

本表僅陳列編者自述的期數，並不代表《婦女旬刊》僅有這7期延誤出版。

由於延誤出版屢次發生，1936年時編者終於提出自第691期起，暫時將《婦女旬刊》由單行本改回單張出版，減少徵集稿件、印刷時間，以盡力維持每旬出版。日後《婦女旬刊》維持此出版形式到1936年720期，此後暫時停刊，待1946年復刊發行第721期才又改以單行本出刊直至1948年停刊。

二、《婦女旬刊》的內容樣式

總編輯張儷娟指出，改訂成冊出版以後，因無先前樣本可供參考，只能購閱市面書籍報章，並以商務印書館贈送的《婦女雜誌》、《英語週刊》作為仿效對象。由於每期出版間隔只有十日，編輯團隊須在短時間內完成出版事宜，使得《婦女旬刊》雖然知道報章式簡易裝訂不美觀，但因時間上關係，一時無法更易，裝訂方式只得照舊。雖然編輯曾擬用較厚的紙張作為封面，使得刊物看起來更美觀，但因為每期頁數過少，且印刷費用增加，因而只能暫緩。³¹

《婦女旬刊》每頁版面初分為3欄，之後按照各期稿件數量、文章內容，適當調整為2欄或4欄。每期文章稿件約為3頁半至4頁，但隨著銷量上升，將稿件改為每期5頁。不過每期文章稿件雖僅有3至5頁，翻閱現存的《婦女旬刊》後可知，每期平均頁數為25-30頁，與*China Publishers' Directory*所記載平均頁數為22頁相近。換言之，扣除封面、封底、目錄後，每期《婦女旬刊》約有15-20頁為廣告，這樣的現象讓曾於1930年代接手《婦女旬刊》編輯工作的鍾敬文回憶：

學會後來出的《婦女與兒童》，原來是當地有一個人辦的《婦女旬刊》，

³¹ 張儷娟，〈婦女旬刊社十年來之經過〉，《婦女旬刊彙編》，期2(1926年)，頁10。

他辦這雜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招登廣告，至於刊物內容他根本不重視。學會得知這一情況後，就和他商量合作，結果這個刊物變成了民俗資料旬刊。³²、

《婦女與兒童》，婁子匡主編，我給以贊助，出 8 期。這是在原來一份招登廣告的雜誌《婦女旬刊》的基礎上更名興辦的，主要刊載民俗資料，也有些理論文字。³³

鍾敬文指出《婦女旬刊》長期以來廣告與文章並重，甚至是廣告多於文章的出版情況。《婦女旬刊》既然自詡創刊目的是「以開通女界，輔助家庭教育為主旨」，為何又以廣告數量凌駕於文章數量之上？1922 年，主編指出《婦女旬刊》廣告繁多而文章內容不能增加的主要原因正是經濟不足。³⁴1929 年新任編輯樓尹庚也指出，作為《婦女旬刊》編輯目標自然是將刊物辦得有聲有色，然而除了編者自行努力，出版社的資金援助更是關鍵。編者坦言許多文稿沒有相當的報酬，導致徵稿都感到萬分困難，並表示接下《婦女旬刊》編輯工作只是友情相挺，甚至沒有領薪水。³⁵由此可知《婦女旬刊》最主要出版困境實為發行單位中華婦女學社資金不足，進而導致文稿不足，便以招攬廣告收取費用，形成惡性循環。因此我們不禁要問，究竟中華婦女學社是何種社團性質？又為何要發行《婦女旬刊》？

三、杭州中華婦女學社

《婦女旬刊》編輯歷程主要是由中華婦女學社進行主導，其間雖有不同文學、民俗研究社團相繼擔任刊物編輯，甚至是掌握主導權，但刊物的發行單

³² 楊哲，《風雨世紀行：鍾敬文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62。

³³ 鍾敬文，《鍾敬文學述》（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04。

³⁴ 編者，〈編餘小話〉，《婦女旬刊》，期89(1922年11月16日)，頁8。

³⁵ 尹庚，〈編後〉，《婦女旬刊》，期304(1929年)，頁17

位一直都是中華婦女學社。故本文以中華婦女學社為主要研究對象，至於編輯的更動則將於第三章討論。相較於 1930 年代接手編輯的杭州中國民族學會，目前關於杭州中華婦女學社的資料相當稀少，只能藉由《婦女旬刊》中零散的史料找尋蛛絲馬跡。參照 1928 年《婦女旬刊》第 273-275 集合輯〈婦女學社宣言〉可知成立背景和動機：

西人有恆言：國家之強弱係乎教育之興衰，教育事業品彙斯繁，而女教尤諸教之先也。三代以前，男女並重。……秦漢而後暴君迭出，抑女縱男，……以六經為男兒專書，由是婦女教育遂一蹶不能復振，女子無才是德之說又從而摧殘之。所謂婦女之教育無非針黹之末技，粉代之修飾而已。間有出類拔萃者，如韋母之設帳授經、…木蘭之代父從征、紅玉之助夫破敵，賢女傳中雖有人在，然芸芸女界此不過碩果晨星耳。夫女子握家庭教育之全權關係於社會甚巨，若愚頑不化、才智毫無，則姑媳聰側竟作禍水之原，夫婦反目，斷卻天倫之樂，既不能助夫子成令名，又豈能為社會謀利益乎？此婦女學社之所由設也。且近今以來，新文化之潮源既澎湃於全國，而解放婦女之聲浪亦磅礴而鼓盪。我國女界雖不乏明哲，然際此婦女教育尚未普及之時，青年婦女智識初開趣響未定，若無女子團體補正之，鮮有不為邪說所誤者。故婦女學社之設即以開通女界，輔助家庭教育為主旨，務斯女界有自立之能力，力除取憐仰食積習，勉與男子同負國民責任。³⁶

〈婦女學社宣言〉指出婦女先前不受教育，致使無法助夫教子，更不能為社會謀福利。之後在新文化運動中，解放婦女的風潮逐漸影響社會男女，然而為避免新思潮傳遞過程中，青年婦女誤讀典籍，所以創立婦女學社，擔任傳播、教育婦女解放的領導者，帶領女性突破「女子無才是德」的束縛，接

³⁶ 〈婦女學社宣言〉，《婦女旬刊》，期273/274/275(1928)，頁1。

受新知、擁有自立能力，養成獨立人格，進而與男性一般肩負國民責任。為達此目的，婦女學社創辦《婦女旬刊》以「致力於女子文化進展，重視兒童培養，及研究方法，為家庭謀幸福」為目標。

中華婦女學社的組織均依照普通報社之例，分營業、幹事、編輯、廣告等部門，部門幹部皆由熟識的親友擔任，如營業部主任何慨秋是學社社長兼刊物發行人、總務部主任張儷娟的丈夫。張儷娟，江蘇省句容人。據何慨秋敘述，句容當地婦女「守著閨門不出一步，所以街上有一個女子行走，那兩旁的店夥就引頸而望，好像奇怪極了。」至於女子教育也只有高等和初等教育，學生並不多。³⁷雖無史料記載，但以張儷娟得以創辦刊物和撰寫文章推斷，應有受過教育。何慨秋，本名何致遠，字慨秋，江蘇省興化人。6歲時赴杭州，15歲才又回到興化，曾就讀浙江公立法政學校。³⁸據《中國攝影學會畫報》所述：「何慨秋君，擅交際，助其夫人。經發事業，亦極幹練，說者為『何張伉儷』。」若以他運用與秋聲社、新光郵票研究會、綠社等社團關係而言，何慨秋的確擅長交際，協助張儷娟營運中華婦女學社與《婦女旬刊》。

³⁹

其餘部門分別由友人顧幻音、陳蘭言、顧菊蝶擔任。幹事部主任樊信初的母親樊太夫人，早在1920年，便與經太夫人以巨資襄助中華婦女學社的成立和刊物的發行。《婦女旬刊》另設有海外通訊記者，由陳玉壺擔任此工作。⁴⁰上述人物照片見圖1至圖9。

³⁷ 張儷娟，〈滬寧杭途中旅行記〉，《婦女旬刊彙編》，期1(1925年)，頁19、何慨秋，〈句容風俗一夕談〉，《婦女旬刊彙編》，期1(1925年)，頁23。

³⁸ 何致遠，〈興邑新年之風俗：附照片〉，《少年(上海1911)》，卷9期1(1919年)，頁10-12、鍾韻玉，〈杭州早期文藝報刊〉，收入杭州市政協文史委編，《杭州文史叢編—文化藝術卷》(杭州：杭州出版社，2002)，頁232。

³⁹ 三由，〈女界人材〉，《中國攝影學會畫報》，卷4期158(1928年)，頁5。

⁴⁰ 張儷娟，〈婦女旬刊社十年來之經過〉，《婦女旬刊彙編》，期2(1926年)，頁5-7。

圖1：贊助者經太夫人

圖2：贊助者樊太夫人



圖3：社長兼總務部主任張儷娟

圖4：營業部主任何慨秋



圖5：編輯陳蘭言

圖6：編輯顧幻音



圖7：編輯顧菊蝶

圖8：幹事部主任樊信初



圖9：海外通訊記者陳玉壺



圖1至圖9是《婦女旬刊》贊助者及中華婦女學社各部門負責人。
資料來源：《婦女旬刊彙編》，期1(1925年)，頁20-22。

除了幾位重要成員以外，學社並無對外徵求正式社友，也無收取社費，凡認同《婦女旬刊》理念，或介紹刊物、訂閱刊物，皆被視為同志。⁴¹不過在《婦女旬刊》，或其他報紙中，也可見到婦女學社徵求社員的公告。如1932年16卷26期「本社為婦女界研究學識之唯一機關，特發行旬刊一種專供社員討論，應用學術互相砥礪。茲為擴充社務起見，續徵新社員五百名(只限女性)」。⁴²但因為沒有固定社費收入，發行經費只得由幹部同仁共同負擔；成立之初，學社與商家之間的信用尚未確立，願意資助或是刊登廣告的商家也很少。雖然張儷娟認為由親友共籌資金的方式，較股東出資來得自由，但也因

⁴¹ 張儷娟，〈婦女旬刊社十年來之經過〉，《婦女旬刊彙編》，期2(1926)，頁6。

⁴² 〈婦女旬刊啟事—徵求免費社員〉，《婦女旬刊》，卷16期26(1932)，頁3。

為資金有限，無法提高資金購買稿件，讀者因此批評《婦女旬刊》不求改良，導致銷售量無法突飛猛進。為此，婦女學社的第一步便是邀請北京東華銀行主任劉介白擔任總務部主任，希望運用他的金融背景和知識，讓刊物維持發行、不斷刊，再設法增加銷售量和知名度，期望藉由銷售成績吸引商家的廣告投資。最後就是強化刊物主軸、塑造自身獨特性，藉此尋找適合的商家投入廣告。⁴³

以下將分析中華婦女學社如何藉由有限的資金，搭配人際關係網絡改善《婦女旬刊》封面、刊頭設計，並增設各地經理、經銷商，以及參與社會活動，再與其它出版社、書局互贈刊物等手段高度提升銷售量和曝光度，最後建立與商家之間的信任，使得商家願意刊登廣告於《婦女旬刊》，讓婦女學社得以獲得穩定收入，讓刊物持續發行。

第二節 《婦女旬刊》行銷策略

一、封面圖畫設計

在眾多雜誌之中，若只想憑藉刊物聲量、文章質量、主軸議題等策略，是難以使新的讀者迅速產生購買欲望、閱讀誘因，或是有鑑賞、收藏的動機，因此擁有吸睛的封面至關重要，它不只代表著刊物形象，也建立讀者的第一印象。1920年，聞一多就讀清華大學、編纂《清華週刊》時，曾著〈出版物的封面〉一文，內容提到美的出版物封面圖案不只吸引買家注意、也使藏書家小心收藏，又或者得已藉由美的封面使讀者心怡氣平，容易接受書本內容，更可以直接或間接的提升刊物經濟價值。⁴⁴《良友畫報》編者曾言：「最先入

⁴³ 張儷娟，〈婦女旬刊社十年來之經過〉，《婦女旬刊彙編》，期2(1926)，頁6。

⁴⁴ 聞一多，〈出版物的封面〉，原載1920年，《清華週刊》第185期，轉引自謝積才主

閱者視覺的，自然是封面了。」總計 172 期的《良友畫報》中，男性為封面人物僅有 10 次，其餘 162 期皆為女性，且多是時髦的摩登女子，成功吸引讀者目光。⁴⁵

《婦女旬刊》創刊之初，封面僅有簡單的刊頭「婦女旬刊」，配上該期目次(見圖 10)。雖然起初銷量也能維持水準，但為了增加訂閱數量，《婦女旬刊》編者決意與畫家們合作，企圖利用畫作增加刊物銷售量：「本刊銷路既增，報紙上自應改良，以使美觀。先後與名畫家商洽，添加繪圖，本刊因此內外兩部，形色為之一新。」⁴⁶98 期時編者提到：「本刊自今以後的內容及封面務求美觀以醒眉目。」⁴⁷就目前能掌握的《婦女旬刊》而言，封面帶有圖畫、照片的共有 64 期，其中以圖畫作為封面的期數共計 45 期。⁴⁸由慕琴、⁴⁹清磐、

編，《現代文學名家作品選—經典文藝理論批評》(吉林：吉林大學出版社，2004)，頁 126-131。

⁴⁵ 關於《良友畫報》封面研究可見高郁雅，〈從《良友畫報》封面女郎看近代上海的摩登狗兒(Modern Girl)〉，《國史館館刊》，復刊期 26(1999年6月)，頁 57-96。

⁴⁶ 張儷娟，〈婦女旬刊社十年來之經過〉，《婦女旬刊彙編》，期 2(1926)，頁 3。

⁴⁷ 張儷娟，〈編輯室〉，《婦女旬刊》，期 98(1923年)，頁 8。

⁴⁸ 1923 年第 97、98、99、100、101、109、111、121 期；1924 年 141、143、144、146、147、148、149、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 期；1926 年 211、213、216、217、218 期；1928 年 264-266、267-269、270-272、276-278、282-284、285-287、288-290 期；1929 年 322-324 期；1930 年 355 期；1931 年 373、375 期；1932 年 16 卷 13 期、16 卷 18 期。

⁴⁹ 丁悚(1891-1969)，字慕琴，上海金山楓涇人。曾出版《上海時裝百美圖詠》、《丁悚百美圖》、《丁悚百美圖外集》等。1912 年參與創辦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出任教務長。丁悚的許多作品發表於《申報》、《新申報》、《神州日報》、《時事新報》，並應約擔任《新聞報》、《上海畫報》、《三日畫刊》等刊物特約漫畫作者。還曾參

⁵⁰漢光、⁵¹個凡、⁵²大鈞、亞光、⁵³聯輝、⁵⁴丁訥、⁵⁵安可、一琴等 16 名畫家賜

與創辦《滑稽畫報》、編輯《世界畫報》、《健康家庭》等刊物。丁悚甚至還自 1914 年創刊號起，為《禮拜六》刊物繪製封面直至 200 期。黃可，《漫話海派漫畫》(上海：文匯出版社，2015 年)，頁 17-19。

⁵⁰ 楊清磐，上海中國藝術專科學校西畫教員。徐建融、劉毅強主編，《海派書畫文獻彙編》(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 年)，頁 466。1919 年，參與劉海粟、汪亞塵發起的美術團體天馬會。成員有劉海粟、汪亞塵、江小鶴、丁悚、楊清磐等人。邵洛羊主編，《中國美術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 年)，頁 242。

⁵¹ 何漢光，1920 年與張聿光、丁悚、沈伯塵、楊清磐等人創辦漫畫月刊《滑稽》；1921 年，參加晨光美術會。唐薇、黃大剛，《張光宇年譜》(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年)，頁 20-23

⁵² 個凡，1913 年，負責繪製中華書局《中華童話》叢書封面、插畫；1922 年，負責《小朋友》週刊插畫；1923 年，《鐘聲》週刊創刊，嚴個凡與胡亞光、胡漢光擔任特約繪圖者。除了畫家身分，也是上海戲劇協社成員。黃可，《上海美術史札記》，134、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編，《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記(1919.5-1937.7)》(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 年)，頁 60、鄭逸梅，《鄭逸梅選集卷》(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549

⁵³ 胡亞光(1901-1986)，名文球，字亞光，號夢蝶樓主、安定居士。浙江杭州人，為胡雪巖曾孫，初從張聿光學習西畫。1922 年與施蟄存、戴望舒、張天翼等人在杭州成立蘭社。1923 年創辦亞光繪畫研究所、杭州暑期繪畫學校。1937 年抗戰爆發後遷居上海，在肇光中學擔任教員。徐國衛，《觸摸歷史：中國西洋畫的開拓者》(下冊)(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564。

⁵⁴ 柯聯輝(1887-1964)，浙江鄞縣人，1918 年進入美商克勞廣告公司，1921 年轉入法商法興印刷所廣告部，1924 年自行創聯輝美術社、承辦工商美術和包裝裝潢設計，1929 年編繪出版《英文美術字母範本》。徐昌酩主編，《上海美術誌》(上海：上海圖畫出版社，2004 年)，頁 114

⁵⁵ 丁訥，與張聿光、丁悚、張光宇、謝之光、楊清磐、何漢光等人共同為 1918 年《世界畫報》繪製插畫，並與丁悚、胡伯翔、倪耕野、梁鼎銘等人為英美菸草公司廣

稿及繪製。

《婦女旬刊》幾乎皆以女子作為封面主角，首張圖畫是 1923 年第 97 期由畫家胡亞光繪製。畫中女主角留著燙捲短髮的時髦髮型，身穿蝴蝶、花瓣圖樣上衣，佩上黑色長裙，穿著高跟鞋，並以珍珠項鍊作為飾品，這張圖畫之後還出現在第 98、101 期(圖 11)。之後胡亞光還為 1928 年第 288、289、290 合輯繪製封面。1923 年第 99、100、109 期則是由長期為《禮拜六》繪製封面的知名畫家丁悚繪製。畫中主角也是燙短捲髮，身著直條紋上衣、過膝深色長裙、腳穿淺色高跟鞋，搭配手部動作，以食指筆向期號。第三位出現在封面的女性由清磐繪製，穿著上衣下裙，但頭髮則是綁著辮子。第四位是由個凡繪製，該女子雙手捧著一隻鳥站在樹下，留著短髮、身穿素色上衣和裙子。第五位女性是由王鸞繪製。⁵⁶相較於前面四位的穿著，第五位女性也是上衣下裙搭配高跟鞋，但裙子花樣不是素色，而是跟上衣一樣的花紋，上衣領口更不同於前面直逼脖子，雖未露至胸口，但以比前面幾幅畫更顯大膽。此外，女子身後的山水背景可以推測是在戶外郊遊，對比前面四幅畫更具有動態之感(圖 12)。

告部畫家，主要繪製菸殼。鄭逸梅，《鄭逸梅選集第六卷》，頁440、汪洋，《中國廣告通史》(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01

⁵⁶王鸞，1927年加入英美菸草公司廣告部，與丁悚、丁納、張光宇等畫家共事。之後到慎昌洋行廣告部任職，1930年聯合廣告公司成立，王鸞成為股東之一兼任圖畫部主任。1939年，再承接新光內衣廠圖畫部負責人。

由國慶，《民國廣告與民國名人》(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14年)，頁139、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彙編：工業商業》第7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1、益斌，《老上海廣告》(上海：上海畫報出版社，1995年)，頁14。

第六位出現的女性是由大鈞繪製，她的穿著雖與第五位相近，但較先前五位特別之處在於她手中拿著一份《婦女旬刊》，這是封面首次有女子與書本共存的畫面。緊接著 148 期第七位女主角又再度伴隨花草出現。這幅圖畫是《婦女旬刊》封面重複使用最多的一幅，共計使用 14 次。⁵⁷畫中女主角將頭髮綁起，身穿素色無花紋旗袍、深色長裙，整體看來若似女學生穿著，不過該女子踩著高跟鞋，翹著腳倚坐沙發上的姿態卻散發出摩登氣息。

由車籟繪製的第八位女性較之前女主角更顯動態，該名女子衣著打扮雖然略顯樸素，但重要的是她在戶外奔跑的姿態傳達了女性個性活潑、身體健康的意象，而不僅是在室內靜坐、或讀書。此外，手上拿著一把火炬，整體形象就像美國自由女神，更似乎象徵著《婦女旬刊》正是西方婦女解放聖火的傳遞者，這幅十分具有象徵意義的圖畫一共在封面出現五次(圖 13)。⁵⁸

264、265、266 合輯與 267、268、269 合輯。與大鈞所繪不同，第九位女主角不只是拿著《婦女旬刊》，而是坐在沙發上閱讀，明確傳遞出《婦女旬刊》的假想讀者為女性，而且從穿著來判斷，是摩登女子(圖 14)。同樣的概念也可見於第 270、271、272 合輯，雖然無法辨別該名女子閱讀甚麼書本，但不論是否是《婦女旬刊》，都還是傳遞出女子與知識的關聯性。陸家齊繪製的 276、277、278 不僅延續讀書畫面，讓讀者更耳目一新的是桌上的留聲機，和首次在封面出現了露出胳膊的旗袍。雖然先前的女主角同樣留著短髮、穿著高跟鞋，但在陸家齊筆下的女子，髮飾、耳環和身上的配件皆比以往明顯，對比先前女子寬大衣著，貼身的旗袍更展示出女子婀娜姿態，手中的書刊再一次傳遞「摩登」之於女子不僅是外表光鮮亮麗，女子在日常生活中應該與書本、知識，乃至教育的關連。這幅具有突破性的畫作僅在封面出現兩次，另一次是 1930 年第 355 期。由聯輝接續期後繪製 282、283、284 合輯封面

⁵⁷ 1924 年第 148、149、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 期

⁵⁸ 1926 年第 211、213、216、217、218 期。

又再次回到單純的女學生裝扮，285、286、287 合輯甚至只以鳳凰鳥圖作為封面。

除了上述幾期以圖畫作為封面外，其他期數皆以一般廣告、該期目次作為封面，但面臨重大社會事件時，則以描述該事件作為封面。1931 年第 387 期，《婦女旬刊》的刊頭還加上：

提倡國貨，是我國民經濟獨立的基礎！紀念國恥，要加緊提倡國貨運動！用國產服飾，能表現愛國的精神！用國貨食品，是塞利權外溢的漏卮！一身使用國貨，為國民絕對的義務！國人使用國貨，為國民應盡的天職！國貨運動，是國民大家的事！我們應明白國貨運動，我們應作國貨運動！

1933 年，第 17 卷第 7 期編者則是以這段文字呼籲讀者愛國、救國：

節約救國：願全國婦女界亦應組織起來籌募「婦女號」。暴日東侵，國難日亟，欲謀自救之策，端賴鞏固後盾。最近各界紛紛響起，咸有航空救國之組織，而尤引人注意者為《新聞報》茶話編輯小記者先生發起之「兒童號」，僅集區區糖果之資，以冀完成一救國巨大戰機；我浙婦女在在皆消費之所，盡將無謂之修飾品上面節省幾許，彙成巨款以購「婦女號」，望智識學女同志們起來組織之！

上述改變是主編因應時局變化，鼓勵讀者們響應國貨運動，不過封面上真正產生巨變是從 1934 年第 19 卷第 2 期開始。在杭州中國民族學會接手編輯《婦女旬刊》的情況下，除 19 卷第 1 期仍是以畫作「易安居士三十一歲之照」作為封面，第 2 期開始編輯們改採各地風俗民情銅圖，為《婦女旬刊》增添更多色彩，讓讀者產生不一樣視覺體驗。這些封面照片主題包羅萬象，如戴著龐大的耳環的少數民族女人(圖 15)、瀾滄江畔栗蘇族女人、綏遠農家

姑娘、菲律賓女子頂甕入谷汲水(圖 16)、衡水縣的懷兒婦人、吹柴笛的蝦夷女人、海南島黎族婦女與兒童、芬蘭婦女與兒童、八十六歲的蒙古老婦和孫兒、南洋群島的少女等。除了外部改變，刊物中亦增添以往未曾設置的照片欄位，刊登與各地民俗風情有關係的圖片，使得封面、插圖和內文更有一致性。

圖10 1922年 期86

圖11 1923年 期97

圖12 1924年 期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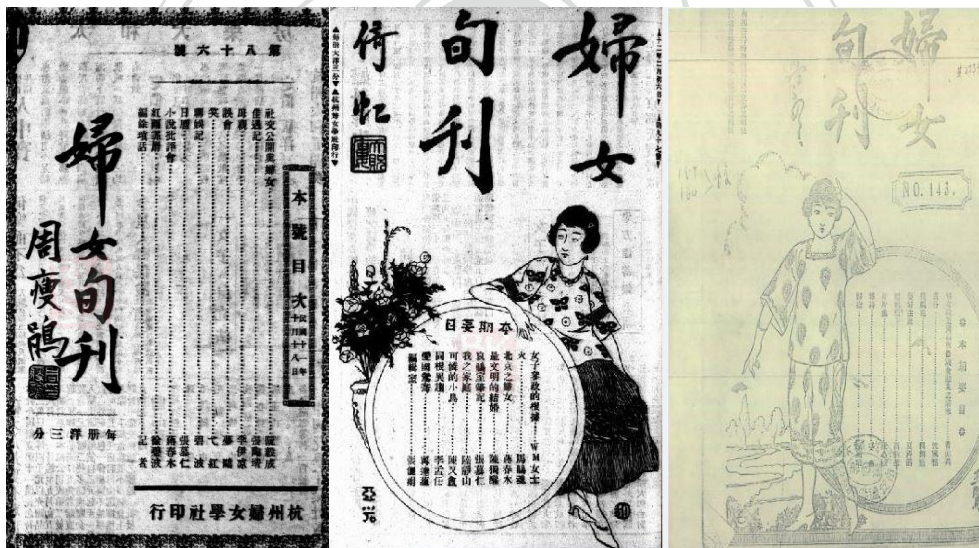


圖13 1926年 期211



圖14 1928年 期264-265



圖15 1935年 卷19期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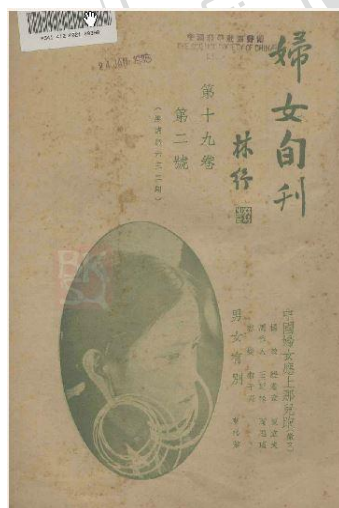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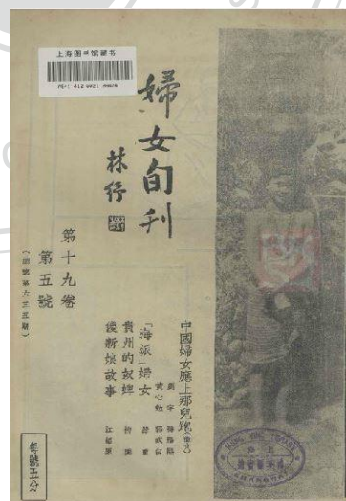


圖16 1935年 卷19期5



二、名人題字

除了利用精心設計的封面強化讀者第一印象，張儷娟為使刊物銷路增加，「每類之首，復請當代名人畫眉當代，並按旬更換題字，尤使本刊生色。」⁵⁹邀請名人為刊物題字的做法也是刊物用來吸引讀者目光，增加買氣的常見作法。以《紫羅蘭》為例，為《紫羅蘭》題寫刊名的多是知名人物，例如人稱「袁門子建」的袁世凱次子袁克文、京劇大師梅蘭芳。⁶⁰

按照張儷娟的說法，《婦女旬刊》是「按旬更換題字」，但就目前可閱讀到 172 期的《婦女旬刊》，扣除無法辨識、或是無署名的刊頭 24 期，僅 51 名政要、畫家、作家等名人為刊物題字，其中出現次數最多的前五名是文學家、書畫家、翻譯家林紓(20 次，見圖 17)、⁶¹《婦女雜誌》主編王蘊章(14 次

⁵⁹ 張儷娟，〈婦女旬刊社十年來之經過〉，《婦女旬刊彙編》，期2(1926)，頁2。

⁶⁰ 季芬，〈民國名刊《紫羅蘭》的視覺傳播策略分析〉，《中國出版》，期16(2015.8)，頁83、沈柳，〈試論《紫羅蘭》的裝幀設計〉，《出版科學》，卷22期6(2014年)，頁103。

⁶¹ 林紓(1852-1924)，字琴南，號畏廬，別署冷紅生，福建閩縣人。光緒八年舉人，桐城派古文家。亦是文學家、書畫家、翻譯家，五四運動後以反對文學革命而著名。1897年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是中國介紹的第一部西洋小說。此後受商務印書館邀請專譯歐美小說，單行本主要由商務印書館發行，未出單行本多在《小說月報》、《小說世界》上刊載。除了翻譯小說，另有《畏廬文集》、《續集》、《三集》、《畏廬詩存》、《畏廬漫錄》、《韓柳文研究法》等文學著作。

王余光、徐雁主編，《中國閱讀大辭典》(南京：南京大學，2016年)，頁1147、《近代文觀止》編委會編，《近代文觀止》(上海：學林出版社，2015年)，頁75。

見圖 18)、⁶²書法家劉青(12 次，見圖 19)、⁶³、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張嘉璈(10 次，見圖 20)、⁶⁴立法委員樓桐孫(6 次，見圖 21)。⁶⁵其餘名人尚有康有為、蔡元培、于右任、孔祥熙、孫科、包天笑等。各期題字人詳見附表 1。透過名人題字不僅使《婦女旬刊》刊頭避免流於印刷體呈現出的呆板，為刊物添加藝術氣質，同時還利用收藏名人字帖的文化傳統，增加傳收藏價值，更可以讓讀者以為《婦女旬刊》獲得名人背書、代言，為刊物出版增添話題。

⁶² 王蘊章(1884-1942)，字菊農、蕁農，號西神，別號西神殘客，江蘇無錫人。多以「王西神」為《婦女旬刊》題字。擅長書法、詩詞、小說。曾擔任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婦女雜誌》主編。1925年辭商務印書館工作遊歷南洋各國，作《南洋竹枝詞》百首。1928年回上海後，歷任滬江大學、南方大學、國立暨南大學國文教授，兼任上海《新聞報》秘書、上海正風文學院院長。曾參加柳亞子等所辦的南社，常在滬、錫各報刊撰寫小品文。

徐友春等編，《民國人物大辭典》(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頁187-188。

⁶³ 劉青(1879-1933)，字照藜、介玉，號天台山農，浙江黃岩人。皆以「天台山農」為《婦女旬刊》題字。幼時寓杭，自練書法，後成書法家，以魏碑、行書見長。曾擔任上海大世界遊藝場創辦人黃楚九秘書、與孫玉聲合編《大世界報》、與朱大可合編《小說新報》、為《新聞報》副刊《快活林》撰寫小說。

陳玉堂編，《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269。

⁶⁴ 張嘉璈(1889-1979)，字公權，江蘇寶山人。皆以「張公權」為《婦女旬刊》題字。1933年為《婦女旬刊》題字時擔任中央銀行理事、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財政委員會、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張朋園、沈懷玉編，《國民政府職官年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頁330、374、474。

⁶⁵ 樓桐孫(1896-1992)，字佩蘭，浙江永康人。1929年為《婦女旬刊》題字時擔任立法院第一屆立法委員。徐友春等編，《民國人物大辭典》，頁187-188。

圖17 1935年 卷19期1 圖18 1924年 期151 圖19 1925年 期184



圖20 1933年 卷17期25 圖21 1929年 期301



三、廣設營業處、經銷處

廣設營業處、經銷處的主要目的即是協助銷售刊物，為《婦女旬刊》打開外地市場、增加銷售量，並可以提供訂閱戶售後服務。刊物在寄送過程中或許會遺失、寄錯，造成讀者可能因無法收件而假設出版社停寄、停刊，甚至因此沒停止訂閱。所以當訂閱戶沒有來信告知，出版方則理所當然認為對方已收到，導致誤會發生，婦女學社設立分部辦理，即可以使讀者在最短時間內向出版方反應，以避免日後產生糾紛。

1922年4月，婦女學社聘請濟南《工商新報》、《省縣日報》總經理劉子剛擔任駐山東全省經理，每期認銷50本；南京則是由《慈善週報》經理李秉超擔任南京推銷事宜。⁶⁶1922年第81期出版後，因為《申報》、《新聞報》上的廣告，使得婦女學社截至第83期出版前便收到892封訂購函件，其中也含有詢問經理辦法，因此營業部主任何慨秋提出每埠設總理一位，管理全埠事務，分經理若干，學校學者、商號職員不論男女均可擔任。每次須訂至少10本，至30本時經理可獲7折優惠、40至60本可獲6折優惠、70至120本可獲5折優惠，並將此事交由婦女學社營業部負責。⁶⁷

除了《申報》，還可見於其他刊物之中。如1923年《木鐸週刊》就刊有「婦女旬刊為家庭中唯一消遣品，文字非常有趣，茲為普及……招請全國各埠經理」。⁶⁸《婦女旬刊》更在滬寧和滬杭甬兩段鐵路中提供販售，乘客可向車上的報販購買。之後又與向天津、南京浦口、武漢、北京、奉天等路段接洽。

⁶⁶ 張儷娟，〈婦女旬刊社十年來之經過〉，《婦女旬刊彙編》，期2(1926)，頁7-8。

⁶⁷ 何慨秋，〈編輯啟事〉，《婦女旬刊》，期81(1922年)，頁7。

⁶⁸ 〈婦女旬刊招請經理、贈送珍品〉，《木鐸周刊》，期168(1923年3月11日)，頁4。

⁶⁹不過後來因為效果欠佳，隨即便停止派報。⁷⁰

待 1922 年第 87 期出版時新增了條件，願為各埠經理者須付保證金 2 元，且提高基本訂閱數至 20 本，但至少可以 7 折優惠購入，每月若未售完，不得退還超過 4 成，即 10 本至少須售去 6 本。除此之外，營業部特別制訂一條僅供讀者，但經銷者不適用的優惠訊息，若讀者介紹親友訂閱全年 12 份者，即可獲贈中華圖書館出版《禮拜六》週刊半年，或香水精 2 瓶。介紹全年 6 份者，贈香水精 1 瓶、《婦女旬刊》全年 1 份。若個人自訂 1 年份，可獲贈 1923 年日記本 1 本或日曆 1 份。1922 年時，《婦女旬刊》售價每本洋 3 分，若訂 1 年含郵資需 1 元、半年則是 6 角。另外，營業部為了招募全國女學校學者為經理員，特別給予特別酬勞優待，但如不願為經理員，只以個人名義訂閱，如來函蓋有校章，全年也只收大洋 8 角。若女學校教職員以及學生願為特約通訊員，每月通訊至少 1 次，則可獲贈刊物。⁷¹

至 1922 年底，《婦女旬刊》已在多處設有經理，⁷²1923 年又新增駐湘經理伍菊農、雙林經理吳景行，吳興商務印書館為湖州經理，開封新豫書館、

⁶⁹ 何慨秋，〈婦女旬刊啟事〉，《婦女旬刊》，期83(1922年)，頁8

⁷⁰ 張儷娟，〈婦女旬刊社十年來之經過〉，《婦女旬刊彙編》，期2(1926年)，頁10。

⁷¹ 〈《婦女旬刊》公告〉，《婦女旬刊》，期87(1922年)，頁1。

⁷² 除先前提到的駐山東濟南經理劉子剛，尚有北京駐京總幹事樊信初、總經理楊朗之、開封中華派報社呂師端、太原公道商店、長沙民業日報劉碧如任駐湘總幹事、汕頭怡華公司、漢口正言報社、武昌中華書局、西安關隴報社、南昌福興潤號、安慶張友鸞、南京南洋圖書局、鎮江《婦女旬刊》分館經理張慕仁、揚州靜社、蘇州靜社分社、常州新群書社、張陶堦、無錫唐忍菴、溫州駐溫總經理黃孟輔、寧波甘白學校、九江中華書局、河南省會文化學社、上海三廉學社鄧履冰、駐申總幹事顧菊蝶、生生美術公司、雲南中華書局張亮時、杭州浙江書局、杭州菇古齋、杭州周經堂書局等數十處。

張儷娟，〈編輯室燈下〉，《婦女旬刊》，期91(1922年)，頁8。

南京經理陳又龢。⁷³到了第 99 期時，營業部更決議以 5 折優待所有經理，以價格作為誘因，吸引更多人擔任經理或經銷商。⁷⁴

1928 年第 279 期出版時，《婦女旬刊》提高每期售價漲價三倍之多至每期洋 1 角，全年 1 元 2 角，若是學生則國內一元，付費則是希望定閱戶最好用可在上海及杭各銀行支取之支票，或郵局匯票。若是不能用支票及不通郵匯之區域，可用郵票代現(九五折計算)，但外國郵票不收。另外，或許是因為許多訂戶僅以書信告知訂閱，卻未付款，使得學社虧損，在此特別強調「報資須隨函惠到，空函無效」。為了方便讀者購買，經售處又再新增上海暨各省商務印書館地址等地。⁷⁵不過此後《婦女旬刊》在出版項的部分越來越少提及經售處，甚至只簡化為「上海暨各省商務印書館」，價格的部分也不斷起伏，漲價、減價沒有一定的起伏。⁷⁶直到 1946 年 9 月戰後復刊才又再次提及新增的經售處。

1946 年 11 月第 722 期《婦女旬刊》復刊時，除戰後已恢復的成都、漢口等地經售處，又聘請孫慶堂為北平辦事處主任、關世楨、張楨華為天津辦事處經理，至於臺灣、瀋陽、錦州、昆明、重慶、貴陽、長春、等地則在洽

⁷³ 張儷娟，〈編輯室〉，《婦女旬刊》，期97(1923年)，頁8。

⁷⁴ 張儷娟，〈編輯室餘墨〉，《婦女旬刊》，期99(1923年)，頁8。

⁷⁵ 北平琉璃廠、天津大胡同、保定天華牌樓、張家口上堡仁壽街、奉天鼓樓北、吉林糧米行、黑龍江南大街、濟南西門大街、太原橋頭街、開封新財政街、西安粉巷口、南京花牌樓、杭州保佑坊、蘭溪官井亭、安慶龍門口、蕪湖西門大街、南昌佳山廟南、九江中洋街、漢口後城馬路、長沙南正街、常德常清街、衡州八元坊、成都春熙路、重慶白象街、福州南大街、廈門大走馬路、廣州永漢北路、潮州鋪巷、梧州九坊街、雲南城隍廟街、貴陽南大街。

〈婦女旬刊價目〉，《婦女旬刊》，期279-281(1928年)，頁17。

⁷⁶ 《婦女旬刊》，卷16期26(1932年)，頁16。

商之中。價格則是因郵資、印刷工、紙張飛漲，自第 723 期起每本漲為法幣 500 元。⁷⁷到了 1947 年第 730 期每本則是漲到法幣 2000 元，不過訂閱方式更為簡便。《婦女旬刊》委託全國各地郵政局代為訂閱，因此各地讀者只須將費用就近送交郵政分支局即可辦理，或可至杭州浙江省銀行信託部、上海北京路國華銀行信託部、福州福建省銀行信託部繳交費用。⁷⁸1948 年價格不斷飛漲，743 期每本售價法幣 13 萬元，8 月改行金圓券以後，745 期每本售價改為金圓 1 角，⁷⁹停刊前第 747 期漲成金圓 3 圓，漲幅高達 30 倍，航空郵資也從單筆 1000 元，漲至 1500 元。⁸⁰

海外經銷方面，1922 年，在僑務旬刊社社長何海鳴介紹之下，婦女學社與各地僑胞接洽，藉由北婆羅洲黃自生公司、吉隆坡南亞公司擔任經銷。⁸¹雖然當時外銷份數每次可達百餘份，但張麗娟認為經銷者因為是兼職代售，並未盡力推銷，且當時海外經銷處少且範圍狹小，國外的讀者尚未能十分明了《婦女旬刊》的創刊宗旨。1923 年 4 月，陳玉壺自新加坡陳嘉庚橡皮公司返上海，函問並得知銷售情況不如預期後，便主動將刊物介紹至南洋各地，後增設多達 17 處經銷處，其中又以吉隆坡柏榮女校長吳雪華、培德女校長李玉玲兩人最為熱心，至此每期須寄送 500 份刊物至南洋群島。除了南洋以外，紐約領事館的屠楚漁、華盛頓僑星報社、芝加哥工商日報社、舊金山中西日報社、菲律賓華僑商報社等亦紛紛答應擔任海外經理。⁸²1928 年 8 月，海外

⁷⁷ 戰後首先恢復昆明、成都、重慶、漢口、天津、北平、長春、福州、南京、貴陽等地，待 723 期又新增臺灣、瀋陽、錦州。

梅，〈編者言〉，《婦女旬刊》，期 722(1946 年)，頁 14、梅，〈編者言〉，《婦女旬刊》，期 723(1946 年)，頁 18。

⁷⁸ 梅，〈編者言〉，《婦女旬刊》，期 730(1947 年)，頁 12。

⁷⁹ 《婦女旬刊》，期 745(1948 年)，頁 14。

⁸⁰ 《婦女旬刊》，期 747(1948 年)，頁 14。

⁸¹ 1922 年，第 87 期，〈《婦女旬刊》各埠經理一覽〉，《婦女旬刊》，頁 1。

⁸² 如爪哇泗水傅孫轍、曾持平、洪隆熙、馬六甲沈鴻輝、吉隆坡張禮記、黃錫琛、

訂戶還可在香港皇后大道、新加坡大馬路等地購得。⁸³戰後《婦女旬刊》復刊後，雖未再提及南洋地區或美國的經售處，但在 1947 年時卻新增臺灣台北市台灣銀行信託部作為台灣經售處，讀者只須在此繳交費用即可訂閱。⁸⁴

圖 22 至圖 25 將分別呈現《婦女旬刊》自 1922 年至 1947 年來銷售地區的演變。



檳城李映雪等人。

張儷娟，〈婦女旬刊社十年來之經過〉，《婦女旬刊彙編》，期2(1926年)，頁14。

⁸³ 〈婦女旬刊價目〉，《婦女旬刊》，期279-281(1928年)，頁17。

⁸⁴ 梅，〈編者言〉，《婦女旬刊》，期730(1947年)，頁12。

圖22 1922年《婦女旬刊》銷售分布



圖中房屋標識處為《婦女旬刊》出版地杭州。由此圖可見1922年底以前，《婦女旬刊》銷售處集中於杭州周邊城市，但北京、廣東汕頭、雲南也可見到《婦女旬刊》蹤跡。

資料來源：張麗娟，〈編輯室燈下〉，《婦女旬刊》，期91(1922年)，頁8。

圖23 1923年《婦女旬刊》銷售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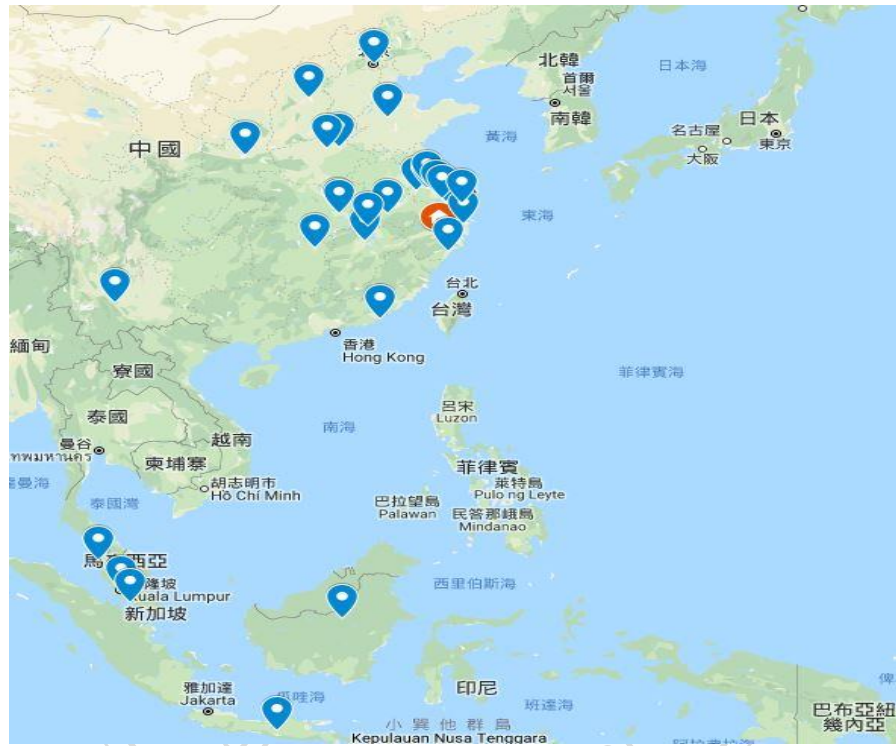


圖8呈現1923年《婦女旬刊》銷售處，相較於1922年圖9，增加南洋地區，如新加坡、泗水、菲律賓檳城。除了南洋以外，尚有紐約、華盛頓、芝加哥、舊金山等地。

資料來源：張儷娟，〈編輯記(七)〉，《婦女旬刊》，期121(1923年)，頁5、張儷娟，〈婦女旬刊社十年來之經過〉，《婦女旬刊彙編》，期2(1926年)，頁14。

圖24 1928年《婦女旬刊》銷售分布



圖9呈現1928年《婦女旬刊》經售處分布地區，由圖可見此時《婦女旬刊》除了有海外據點，國內也發行至東北吉林、奉天(瀋陽)、成都、重慶等地。

資料來源：〈婦女旬刊價目〉，《婦女旬刊》，期279-281(1928年)，頁17。

圖25 1946年《婦女旬刊》銷售分布



圖10呈現戰後《婦女旬刊》銷售分布情況，可以明顯看出較1937年戰前少了許多經銷處，海外地區只剩下臺灣。

資料來源：梅，〈編者言〉，《婦女旬刊》，期722(1946年)，頁14、梅，〈編者言〉，《婦女旬刊》，期723(1946年)，頁18。

藉由《婦女旬刊》代售處持續新增可以推斷刊物的普及率不斷上升，而且範圍亦不限制於杭州、上海等沿海城市，還發展至東北吉林、奉天，內陸西安、雲南、四川，以及海外僑胞居住地。雖然戰後經銷處銳減，但以戰前發展而言，《婦女旬刊》已培養穩定讀者群，日漸擴大刊物影響力。

四、增加刊物曝光度

中華婦女學社第 4 種讓《婦女旬刊》增加市占率的方式就是增加刊物曝光度。編輯們透過與其它出版社的往來、互贈刊物達到效果，或是以學社的團體身分參與各社會組織、社會運動。1920 年秋季，何慨秋因與前杭州青年會總幹事鮑乃得、杭州女青年會總幹事麥凱女士有交往，因而以兩人的介紹函件後與上海各團體結識，成功地使《婦女旬刊》在 1921 年元旦銷量大增至 5000 多份。同年 5 月 5 日，第三屆中國報界聯合會於北京展開。⁸⁵《婦女旬刊》委託蘇州正大日報創辦人孫壹衣代表婦女學社前去開會，成為當時唯一出席大會的女界刊物。之後孫壹衣還主動邀請《婦女旬刊》附刊於《正大日報》，藉此杭州與蘇州女界交流。婦女學社為此按旬增印附送，直到《正大日報》改由日本商人接手才主動終止合作。⁸⁶

《婦女旬刊》自創刊以來，便積極與各大報紙藉由互贈書刊、互登廣告達到交流、拓展知名度目的。例如婦女學社和《婦女旬刊》以贈刊方式獲得《申報》共計 7 次，首次出現是 1920 年 10 月 21 日，《申報》在獲得婦女學社贈送《婦女旬刊》4 份後特別刊登致謝公告。⁸⁷

自 1922 年 9 月至 1933 年 6 月，曾與《婦女旬刊》交往的出版社、刊物、公司行號，以及贈送物品繁多。⁸⁸ 由於時常獲得各出版社贈送刊物，加上《婦

⁸⁵ 〈京報界大開後之會議〉，《申報》(上海)，1921年4月4日，版6。

⁸⁶ 張儷娟，〈婦女旬刊社十年來之經過〉，《婦女旬刊彙編》，期2(1926年)，頁3。

⁸⁷ 〈誌謝〉，《申報》(上海)，1920年10月21日，版11。

此後又分別於1920年10月31日、11月17日、12月2日、12月22日、1921年2月27日、1922年6月26日刊登公告。〈誌謝〉，《申報》(上海)，1920年10月31日，版11、1920年11月17日，版11、1920年12月2日，版11、1920年12月22日，版11、1921年2月27日，版11、1922年6月26日，版16。

⁸⁸ 上海中華書局贈《教育界》、《小朋友》、上海《銀行週報》社贈《票據法研究》、

女旬刊》自身的庫存，婦女學社儲存空間早已滿溢，因此當各地團體來函索要刊物時，便以贈書作為結交手段，所贈之書除了《婦女旬刊》，也包含婦女學社成員之個人著作，如何慨秋《群藝彙編》，或是經由婦女學社出版。據統計，1921年7月至1925年，先後寄贈杭州基督教青年會226本，揚州靜社80本、杭州基督教進修公益社600本，上海儉德儲蓄會40本，杭州通俗圖書館600本，杭州正則青年會60本、浙江公立圖書館500本、上海總商會商業圖書館10本、浙江英文專門學校58本。⁸⁹

不論是藉由販售或是贈送的方法，都帶給中華婦女學社和《婦女旬刊》曝光機會，增加書籍流通，例如查閱上海總商會商業圖書館目錄可見到婦女

上海商務印書館贈《婦女雜誌》、《英語週刊》、作家張枕綠贈《十七年後》、上海總商會贈商品陳列報告書、上海三友實業社贈美女畫、上海太平洋水火保險公司贈畫、上海種德園贈畫、生生美術公司贈畫、家庭工業社贈畫、上海五洲藥房贈月分牌、俞伯葵贈上海和興實業公司月份牌、利華公司月份牌、胡仲軒贈華義銀行掛曆、陸叔歧贈美孚洋行月分牌、上海德士谷火油公司贈月份牌、張靖軒贈華發洋行贈月份牌、上海下內門洋碱公司贈美女畫、上海美電洋行贈月份牌、上海香亞公司贈美女畫、上海《新聞報》社贈創刊紀念冊、華安人壽保險公司贈日曆、華商紗廠聯合會贈季刊、上海中醫學會贈刊物、唐忍菴贈《月月雜誌》、廣生行贈《廣益雜誌》兩本、上海世界書局贈《家庭雜誌》、上海《泰晤士報》、《大晚報》、《字林西報》、《文匯報》各贈報1份、上海五洲廣告社及泰華印刷局各贈上海中西行名錄1冊、杭州胡亞光先生贈百美圖。

何慨秋，〈婦女旬刊啟事〉，《婦女旬刊》，期84(1922年)，頁7、張儷娟，〈十日一敘〉，《婦女旬刊》，期95(1923年1月16日)，頁8、張儷娟，〈編輯室〉，《婦女旬刊》，期98(1923年2月16日)，頁8、張儷娟，〈編者之餘墨〉，《婦女旬刊》，期99(1923年2月)，頁8、張儷娟，〈十日一敘〉，《婦女旬刊》，期101(1923)，頁8-9、張儷娟，〈編輯之言〉，《婦女旬刊》，期109(1923)，頁10。

⁸⁹ 何慨秋，〈編輯啟事〉，《婦女旬刊》，期81(1922)，頁

學社贈何慨秋《群藝彙編》、⁹⁰方慶州小說《電術奇術》、《婦女旬刊彙編》，⁹¹或是在1929年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⁹²1933年南京中央圖書館、⁹³1935年金陵大學圖書館、⁹⁴1936年漢口市新聞紙雜誌暨兒童讀物展覽大會、⁹⁵1937年上海市圖書館等地皆有館藏《婦女旬刊》。⁹⁶

除了贈送給各團體、圖書館，婦女學社也參加不少公益活動。1920年10月27日《申報》報導：

〈婦女學社〉婦女學社自成立以來對於公共事業頗為熱心，今因北方災區浩大，慘不忍聞，特開會議，將歷次所出版之《群藝彙編》及《秋聲》刊共一百五十餘本，約值洋四十餘元一併送至本埠紅十字會，託其變價出售。將欲全數充賑，想海內女界不乏熱心者，諒能仿行斯舉嘉惠災民也。⁹⁷

⁹⁰ 上海總商會商業圖書館編，《上海商會商業圖書館目錄目次》（上海：上海總商會圖書館，年份不詳），頁128。

⁹¹ 上海總商會商業圖書館編，《上海總商會圖書館》（上海：上海總商會圖書會，1925年），頁127、151。

⁹² 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編，《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館刊》（蘇州：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1929年），頁16。

⁹³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期刊目錄 第一輯》（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1933年），頁156。

⁹⁴ 金陵大學圖書館編，《金陵大學圖書館中文期刊備檢目錄》（南京：金陵大學圖書館出版，1935年），頁140。

⁹⁵ 漢口市新聞紙雜誌暨兒童讀物展覽大會編，《新聞紙展覽特刊》（漢口：漢口市新聞紙雜誌暨兒童讀物展覽大會出版，1936），頁54、

⁹⁶ 上海市圖書館編，《上海市各圖書館所藏本國雜誌聯合目錄》（上海：上海市圖書館，1937年），頁94。

⁹⁷ 〈婦女學社〉，《申報》（上海），1920年10月27日，版10。

此則報導雖然沒有提到《婦女旬刊》，但至少能在讀者心中建立對婦女學社的良好印象。1921年秋季，杭州皮市巷基督教會少年服務團勞工夜校部由何慨秋負責主持，此後服務團欲成立婦女識字部，何慨秋便代表中華婦女學社捐贈 6 金協助成立。地方學生事務方面，11 月 4 日是杭州省會中等以上學校聯合運動會，婦女學社在兩週之前就預備前去會場販售刊物，在戴夢鷗、趙文涓、孫增祺、范劍雲、李伊涼等人的協助分售下，銷售情況良好，連贈送一起計算約在四百份上下。此舉不只為學社帶來一些收入，更重要的是增加知名度，也可以藉此機會結識杭州本地的青年才俊。11 月 5 日，何慨秋借用杭州基督教青年會舉辦下午茶會，邀請杭州中等學校以上學生參加，最後出席的共計 12 位。何慨秋坦言此次開會宗旨正是希望藉由連絡學界獲得協助，盼望這些學生能盡力代《婦女旬刊》向同學、家人宣傳，此外何慨秋更言道，《婦女旬刊》目前廣告雖然很多，內容卻無法增加實是因為經濟不足，但是婦女學社抱持著堅定發行的宗旨，只要能藉由宣傳來提高銷售量，將來定能不負學生們雅望。⁹⁸

綜上所述，《婦女旬刊》為了增加讀者訂閱意願，不只在封面上花費心神，刊頭的設計也下了工夫，提高消費意願之外，更提高刊物本身的收藏價值，若是對名人墨跡、畫作有興趣，便可藉由訂閱刊物獲得。另外，廣設各地經理、經銷商，或是藉由不同優惠策略可看出中華婦女學社非常積極地宣揚《婦女旬刊》，希望達到喚醒女性讀者意識，擔任教育的領頭羊。透過每期的編輯餘錄或是 1926 年《婦女旬刊彙編》中張儷娟〈婦女旬刊社十年來之經過〉可

⁹⁸ 出席學生：之江大學張盤深君、醫藥專校狄培慶、蠶校姚効先、嚴靜安、工業學校常廷芳、商業學校文碩人、杭州第一師範鐘以智、安定中學馬蟄先、宗文中學羅妻梅、《學星》週刊經理張樂生、蘇州《星》週刊理事編輯高遙觀。

何慨秋，〈總務部的報告〉，《婦女旬刊》，1922年11月16日，第89期，頁6。

讓後世研究者明白，一個不收社費、僅有少數固定成員的社團，如何在資金有限情況下，將單張發行的報紙式旬刊發展到集冊出版，況且發行期間雖歷經浙江戰爭、中日八年戰爭，但最後仍然復刊成功，維持一個刊物的發行長達近 20 年。

第三節 《婦女旬刊》的廣告

一、《婦女旬刊》作為贈品

《婦女旬刊》廣告不同於一般商品直接表明價格，而是先以「試閱」作為推銷策略。《婦女旬刊》初次以商品樣貌出現在《申報》中是 1922 年 10 月 31 日，婦女學社以週年慶為由「奉送珍品」給《申報》讀者，並標榜此書與「女界及兒童方面尤為注意」，若要追求家庭幸福的讀者只要將地址寄送到杭州婦女學社辦事處，並附上郵資三分即可獲得。婦女學社同時藉由這篇廣告招請全國女學校教師為婦女學社通訊員。⁹⁹此後婦女學社亦多用贈品形式贈送《申報》讀者，已達廣告目的，詳見附表 2。

婦女學社時常透過回函附上郵資的方式贈送刊物給《申報》讀者，其中有幾期甚至要求讀者需剪下贈品券，方可獲贈。值得注意的是，在這 12 則廣告中，僅有 1 則明確標明贈品為《婦女旬刊》，其他多用珍品、寶書、良伴等取代。筆者推測婦女學社不直接告知讀者所贈刊物為《婦女旬刊》，或許是期望讀者在收到時保有驚喜感，又或者是避免讀者已閱讀過但不滿意《婦女旬刊》，因而行文隱晦。但不論編者的動機為何，藉由上述廣告可以得知婦女學社明確地將《婦女旬刊》定位為提倡女子教育、有益於家庭和樂的刊物，並希望藉由贈送刊物培養對此議題有興趣的讀者，以達到宣傳、教育成效。

⁹⁹ 〈奉送珍品〉，《申報》(上海)，1922年10月31日，版15。

除了上述 12 則以婦女學社名義刊登廣告，社長張儷娟分別以個人名義於 11 月 18 日刊登〈徵求汽車增刊啟事〉以及 26 日刊登〈徵求家庭週刊啟事〉。〈徵求汽車增刊啟事〉提到「鄙人欲得申報汽車增刊四六至五一共六期。海內收藏家允寄贈者，鄙人以收藏之優美報紙奉贈」。¹⁰⁰〈徵求家庭週刊啟事〉提到「鄙人素閱申報家庭周刊，今缺少五十號至六十二號計十二份，海內收藏家如允割愛相贈，鄙人以收藏之美報紙奉酬」，不過兩則啟事最後都加上「無報亦可索取，附郵花三分」，¹⁰¹收件地址皆為杭州興忠巷 35 號。透過前述 10 月 31 日的廣告內容可以推測，張儷娟所謂「鄙人以收藏之優美報紙」正是《婦女旬刊》。這兩則廣告也顯示，無論函寄給張儷娟的《申報》讀者是否持有且願意割愛汽車增刊或家庭週刊，只要附上郵資三分，就可以獲得《婦女旬刊》。此種不說明「優美報紙」為何的行銷手法讓人無法預測，一來製造懸疑效果，二來可以使對於婦女或兒童議題不感興趣，但喜歡閱讀報刊的讀者在不經意的情況下接觸《婦女旬刊》。無論日後收到刊物的讀者喜歡與否，對於出版方而言，不只是銷去 1 本刊物，也可能培養出 1 位對相關議題產生興趣的讀者。

1923 年 11 月 25 日，張儷娟又變換推銷方式，這一次她偽裝成藏書家，藉由〈敬告各界〉一文表述自己喜歡閱讀各種書報，現在藏有 1 種內容皆為名家作品，且有多位女性作家投稿、每期有多達 2 萬字、包裝又精美的刊物。張儷娟表明自己閱讀後興趣無窮，現在出版社正在進行推銷，希望她能夠代為贈送給各界，每本只需要郵費 4 分。另外，張儷娟還假冒自己為經銷代理商，如訂閱全年原價連帶寄費 1 元 8 角，但聲明是由她介紹，只需 1 元。¹⁰²

¹⁰⁰ 〈徵求汽車增刊啟事〉，《申報》(上海)，1922年11月18日，版26。

¹⁰¹ 〈徵求家庭週刊啟事〉，《申報》(上海)，1922年11月26日，版8。

¹⁰² 張儷娟，〈敬告各界〉，《申報》(上海)，1923年11月25日，版19。

如同前述兩則啟事，張儷娟從頭到尾皆未曾透露自己就是婦女學社社長，也不提及《婦女旬刊》，只埋下伏筆，告知消費者這是一本精美豐富的刊物，使消費者產生好奇心。除了張儷娟以自己作為經銷代理商進行推銷，1928年8月12日、14日，《申報》連續刊登兩則〈張梅仙贈報〉，內容皆是「僕喜研究婦女問題，茲有著名女報，文字華麗，取材豐富風行全國，刻求普及，託代贈送。」只要附上郵資5分即可獲贈；9月15日又刊登〈何毓芳女士贈書〉，內容說到「君欲安慰伴侶，解決人生幸福，家庭和睦，謀高尚職業，培養子女乎，茲有名書專論此項問題，閱之使君滿意，身心有益，生活上必愉快。」亦是附上郵資9分就可獲得。雖然3則廣告皆未提到《婦女旬刊》或婦女學社，但從廣告提到收件地址「杭州直骨牌街十九號」便可得知是婦女學社。

二、《婦女旬刊》作為商品

不同於贈送刊物般不提及刊物名稱，銷售廣告很明確告知讀者販售物品即為《婦女旬刊》。1924年9月11日《婦女旬刊彙編》廣告是婦女學社首次於《申報》上直接將刊物作為商品販售。廣告詞強調刊物的宗旨是提倡女子教育、發展女子技能、研究兒童培養、力謀人生、家庭幸福，更是「中國婦人的前進指路標」、「現代女性的餘聞進修書」，並且提到刊物裝訂精美、封面由三色印刷而成，1935年後再加上知名作家群姓名，如周作人、顧頡剛、江紹原、郁達夫、趙景深……等，藉由廣告語告知讀者刊物核心價值，並期望以知名作家、精美裝訂等內外因素吸引讀者訂購。

《申報》以外，上海《工商新聞》是婦女學社刊登第二多廣告的媒體，共有11則，¹⁰³其中9則刊登日期集中於1923年8至10月，介紹詞亦完全相

¹⁰³ 1923年8月11日、18日、25日、9月1日、8日、15日、2日2、29日、10月10日。

同：

杭州婦女學社，發行之婦女旬刊，出版已有五年，為吾國女界最著名之報紙，亦最有精神之報紙。提倡女子教育，發揚女子本能。茲聞該社特印彙刊一萬本，布面金字洋裝一鉅冊。定價五元，七折計算，預約兩元，寄費二角。無論家庭學校團體，均宜購置一冊。¹⁰⁴

由廣告內容可知，無論刊登於何處，《婦女旬刊》皆非常重視宣揚刊物宗旨，也都會特別強調封面十分精美，想讓讀者不只能從刊物中習得知識，也能將刊物視為收藏品。不過若細看廣告內容也可看出廣告不實之處。廣告內容提到《婦女旬刊》出版已有5年，但實際上卻是創刊於1920年12月，至1923年8月不過3年。同樣情形亦可見於《申報》。1934年11月25日說到創刊於民國6年6月，即1917年，但1935年3月1日則說刊物已有19年歷史，即創刊於1916年。繼續追查其他刊物中廣告說詞，例如與婦女學社交往密切的《銀行雜誌》亦可見到一些誇大或不實資訊。

此外，1924年10月刊登在《銀行雜誌》的《婦女旬刊彙編》第2集廣告除了如同以往敘述刊物內容豐富、為改良家庭、教育子女不可或缺讀物之外，更提到《婦女旬刊彙編》是因為《婦女旬刊》創始於「民國九年六月，迄今已經十年」，為慶祝「十年之成績，茲逢十週年紀念之期，特將十年各種稿件彙訂一冊」所以發行彙刊以茲紀念。¹⁰⁵1924年民國13年10月距民國9年6月不過4年，在廣告中卻被形容為出版已達10年。《婦女旬刊彙編》第2集中，張儷娟更以〈婦女旬刊社十年來之經過〉¹⁰⁶為標題撰寫創刊以來心路歷程，可文中卻也表示刊物創辦於民國9年，而且這篇〈婦女旬刊社十年

¹⁰⁴ 〈介紹婦女旬刊〉，《工商新聞》(上海)，1923年8月11日，版7。

¹⁰⁵ 〈婦女旬刊彙編第二集出版廣告〉，《銀行雜誌》，卷4期3(1924年)，頁5

¹⁰⁶ 張儷娟，〈婦女旬刊十年來之經過〉，《婦女旬刊彙編》，期2(1926)，頁1。

來之經過)與《婦女旬刊彙編》第1集中的〈編輯紀略〉內容上完全相同，僅是更換標題並加上標點符號又重新刊登。或許編者目的在於強調刊物已在報刊市場中穩定長久發行，藉此樹立專業形象，但卻造成了當時讀者對於創刊年份的混淆。例如談社英《中國婦女運動通史》、¹⁰⁷林振彬 *China Publishers' Directory*、¹⁰⁸盧震京《圖書學大辭典》，¹⁰⁹皆認為出版於民國6年，但項士元《浙江新聞史》則說是民國9年。¹¹⁰不過若以現存最早印有出版日期之1922年9月5日《婦女旬刊》第82期往前推算，《婦女旬刊》的確是創刊於民國9年6月下旬。

由此可見，婦女學社為強化自身的歷史脈絡不惜於廣告中以不實的內容誑騙讀者，並也成功的達成行銷目的，令當時的書刊在介紹時會呈現《婦女旬刊》歷史悠久的敘述。

三、《婦女旬刊》內的廣告刊登與社會關係網絡

辦報原非易事，早開夕閉者，各地皆有。大凡報紙收入，共分二種，報費及廣告費。至報費經售者尚須酬勞、除去折扣，所得實不可償紙印等費中十分之一。且有報販延期不繳等事。廣告費，乃一報最大最大收入。按月之一切應用，大半賴其幫助。¹¹¹

刊物和出版社經營資金來源就是依靠刊物銷售以及商家刊登廣告的收入，兩者之間存在著互利共生的關係。不過如同引言所述，單靠販售刊物能獲得的利潤非常少，加上《婦女旬刊》前期多以推廣為主，販售為輔，目的

¹⁰⁷ 談社英，《中國婦女運動通史》(南京：婦女共鳴社出版，1925年)，頁93。

¹⁰⁸ 林振彬編，《*China Publishers' Directory*》，p.6。

¹⁰⁹ 盧震京，《圖書學大辭典》下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頁310。

¹¹⁰ 項士元，《浙江新聞史》(浙江：之江日報社，1930年)，頁134。

¹¹¹ 張儷娟，〈婦女旬刊社十年來之經過〉，《婦女旬刊彙編》，期2(1926)，頁1。

在於增加市場中聲量，因而時常能見到編輯在刊中「編輯談話」吐露苦水，表示經費不足使得內容無法增進成長，進而陷入銷量不夠，營運虧損的惡性循環之中。更嚴重的是，銷量未提升則商家不願意投放廣告，同樣會造成刊物缺乏營運資金，最後成為「早開夕閉者」。反之，若刊物起初便能按時發行，且在選題上獨樹一格，創造出自己的市場價值，雖不求銷售量急速攀升，但求能穩定出版，擁有固定讀者，則商家便會願意投放廣告，出版社便可再獲得資金後藉由買稿、邀稿或如《婦女旬刊》邀請知名畫家、作家繪圖、題字等手段，精進刊物內容和增加收藏價值吸引更多讀者，以此提高銷量，吸引更多商家刊登廣告，將刊物經營導向良性循環。《婦女旬刊》得以持續獲得資金發行，就張儷娟說法正是因為即便稿件短缺，或內容幼稚，仍設法定期出刊。

面對眾多出版社招募商家投放廣告，商家必須發揮最大效益，將每年有限的廣告預算錢花在刀口上，所以廣告專責部門或受委託的廣告公司必定挑選銷售數量且聲譽昭著者，能有效提升產品銷售的廣告媒體。因此前一段即分析中華婦女學社四種增加銷售量的行銷方法，將社團營運和刊物出版導向正向循環。

1920年，社長張儷娟派丈夫兼營業部主任何慨秋加入上海中國廣告公會。此公會是由上海各中西商行經理、報界執事與廣告業者組織，雖然廣告公會僅運作兩年，但在參與期間結識《申報》經理張竹平、生生美術公司經理孫雪泥等，並藉由他們的引薦成功招攬廣告。¹¹²1922年，由於上海商行與婦女學社的接觸日漸頻繁，因而決定設立廣告部專職負責，同時也因為收入款項增加，乃新增會計部統理一切，由此可以看出婦女學社對於廣告收入非

¹¹² 張儷娟，〈婦女旬刊社十年來之經過〉，《婦女旬刊彙編》，期2(1926)，頁5。

常重視的態度。¹¹³除了缺漏期數，《婦女旬刊》自 1922 年 81 期至 1948 年 748 期共有 381 間商家、出版社刊登 2636 則廣告。依照廣告數量、商品類別大致上可區分為文教書本、醫藥用品、服裝布料鞋襪、食物酒類、工業產品、銀行保險、女性生理、化妝用品、香菸、日常清潔用品等 9 種。值得關注的是《婦女旬刊》中有部分廣告是獨厚自家人，例如何慨秋編輯的書籍《群藝彙編》，並有許多廣告商和販售物品與婦女學社或刊物有著密切關聯性，而不僅是一般商家投放廣告的商業利益關係。

以《婦女旬刊》內的《蘭友》期刊廣告為例，該刊於 1922 年由杭州蘭社出版，經理者正是中華婦女學社。¹¹⁴《蘭友》作品多以小說為主，1922 年《婦女旬刊》85 期秋季小說號便委託蘭社成員代為編輯，¹¹⁵其他蘭社成員江紅蕉、何海鳴、范煙橋等參與刊物《最小報》、《千秋》等，或張枕綠小說《十七年後的》，以及既是蘭社成員又是《婦女旬刊》蘇州經理的徐碧波作品《倩娘碧血記》，皆是利用與婦女學社良好關係於《婦女旬刊》進行置入行銷，何海鳴更是如前一節所提，將《婦女旬刊》介紹給南洋地區的僑胞。另外一份刊物《揚州新報》為揚州文學社團靜社創立，不僅副社長顧菊蝶、編輯顧幻音是《婦女旬刊》編輯，¹¹⁶婦女學社總務部主任何慨秋也是《揚州新報》的編輯。¹¹⁷兩者之間的交疊的網絡使得 1922 年《婦女旬刊》第 81 期中可見到婦女學社贈送 80 本書籍給靜社作為交流，¹¹⁸並如同蘭社一般，93 期冬季小說號便交

¹¹³ 張儷娟，〈婦女旬刊社十年來之經過〉，《婦女旬刊彙編》，期2(1926)，頁16。

¹¹⁴ 〈小說專刊：蘭友〉，《婦女旬刊》，期90(1922年)，頁5。

¹¹⁵ 〈編餘剩語〉，《婦女旬刊》，期85(1922年)，頁14。

¹¹⁶ 戟鋒主編，《同聲抒懷抱：姚江同聲詩社總編》(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頁352。

¹¹⁷ 〈婦女旬刊啟事〉，《婦女旬刊》，期83(1922年)，頁8。

¹¹⁸ 1922年，第81期，何慨秋，〈編輯啟事〉，《婦女旬刊》，頁7、

由靜社代為編輯。¹¹⁹此外，顧菊蝶還與顧幻音創辦上海盍簪社，顧菊蝶擔任總務部及書記部主任，顧幻音擔任編輯部副主任，盍簪社招收會員時便刊登廣告於《婦女旬刊》之上，¹²⁰兩社間的關係使得 1923 年 7 月 1 日出版《盍簪》雜誌時，除了刊登婦女學社的祝賀，¹²¹亦刊登《婦女旬刊》廣告。¹²²

利用社員之便達到推廣期刊的互惠作法也可見於中華婦女學社與上海三廉學社之上。1922 年 8 月，三廉學社社長鄧履冰投稿〈癡人之一日記〉於《婦女旬刊》。9 月，鄧履冰刊登三廉學社廣告於《婦女旬刊》第 82 期，兩者由編者與作者的關係轉變為商業合作關係。待 11 月，改換鄧履冰在其主編之《幻術月刊》刊登《婦女旬刊》贈送刊物與招募經理廣告：

《婦女旬刊》招請經理，贈送珍品。《婦女旬刊》為家庭中唯一消遣品，文字非常有趣，茲為普及起見，特廣贈各界士女。凡開明地址附郵花二分，即奉一冊。訂閱全年洋一元，並招請全國各埠經理，擔任者不妨固有職業，可得極大利益。詳請函詢，又招各埠廣告經理數位，願充任者函至杭州婦女學社營業科接洽。¹²³

12 月，張儷娟聘請鄧履冰為上海經理，販售地點即在上海三廉學社內，¹²⁴此舉不僅強化婦女學社與三廉學社的關係，更增添《婦女旬刊》在上海文化市場中的盟友。

1922 年 9 月 25 日，張包子俊與浙江公立法政學校同學何慨秋、方獻、

¹¹⁹ 〈小敘寒暄〉，《婦女旬刊》，期93(1922)，頁1

¹²⁰ 〈上海盍簪社徵求同志〉，《婦女旬刊》，期111(1923)，頁17。

¹²¹ 杭州婦女學社，〈《盍簪》雜誌，出版萬歲〉，《盍簪》，期1(1923年7月1日)，頁8。

¹²² 《盍簪》，期1(1923年7月1日)，頁65。

¹²³ 〈婦女旬刊招請經理〉，《幻術月刊》，期3(1922年11月)，頁26。

¹²⁴ 〈十日一敘〉，《婦女旬刊》，期92(1922)，頁8。

高霽初、包振華等人共同創立《學星》文藝月刊，內容有論說、散文、遊記、小說、詩歌等，並請畫家胡亞光繪製插畫。¹²⁵關於《學星》的出版消息，何慨秋除在《婦女旬刊》第 83 期的編輯啟事提到：「慨秋友人樂生遙觀諸君現在辦了一種學星，某月一次，9 月 25 日是誕生日。敝處可代收價每份 2 分，注意男女學界消息，非常有趣。」此後亦刊登廣告：「學星週刊每週出版一期，專重學藝並全國各學校消息。發行以來，已蒙學界歡迎銷數日增，茲為酬答閱者起見，全年只收大洋六角。撰述者為高遙觀、張子俊、何慨秋諸先生。」¹²⁶、「單張週刊中之大王就是《學星》。每逢星期一出版，內容分言論、文藝、小說、新聞(學界的)，現在已出至 11 期，定月半年 3 角半，全年 6 角，郵在內。」¹²⁷

此外，從張包子俊成為《婦女旬刊》代理主編的過程，也可看出當時《婦女旬刊》如何透過廣告，與張包子俊等建立人際關係，1923 年，張包子俊參加由杭州青年會組織新光社集郵小組，1925 年，張包子俊等人將集郵小組擴大為新光郵票研究會，並藉郵票展覽會邀請同學何慨秋加入，致使 1929《婦女旬刊》國貨專刊上出現新光郵票研究會和《新光雜誌》廣告。1924 年，杭州文藝社團綠社由鍾韻玉、潘光震成立。在潘光震介紹之下，鍾韻玉結識張包子俊，並於新光郵票研究會中結識何慨秋。1928 年，何慨秋便邀請鍾韻玉、張包子俊，以及另一位新光郵票研究會成員憶媚共同擔任《婦女旬刊》代理主編，開啟《婦女旬刊》日後與綠社的關係，邀請綠社成員擔任刊物的專欄編輯「閨秀詩話」和「名閨詩話」，以及提供文稿。¹²⁸

¹²⁵ 鍾韻玉，〈杭州早期文藝報刊〉，收入杭州市政協文史委編，《杭州文史叢編—文化藝術卷》，頁 232。

¹²⁶ 〈學星〉，《婦女旬刊》，期 85(1922)，頁 22。

¹²⁷ 〈學星〉，《婦女旬刊》，期 91(1922)，頁 14。

¹²⁸ 李毅民，《集郵家的業績》(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320-321、憶媚，〈本社的改組〉，《婦女旬刊》，期 267-269(1928 年)，頁 24。

除了這些社群網絡之外，觀看《婦女旬刊》廣告時還發現張儷娟除了藉由販售刊物和招登廣告賺取收入，甚至還經營一間名為「儷記興號」的商號。1929年《婦女旬刊》國貨專號中，首次出現「儷記興號」廣告，標榜此商號「推銷中華國產，經售靈效藥品，定價克己，物品精美」，地址在杭州直骨牌弄19號。雖然整篇廣告中未提到與婦女學社的關係，但參照1926年4月6日《申報》中《婦女旬刊》廣告「本社為研究人士娛樂及提倡女子教育……剪此券附郵九分即奉。杭州直骨牌弄十九號婦女學社啟」，¹²⁹以及1930年4月30日〈「贈送名貴國貨專號」內載國貨言論，並附小品文字。極有興趣請寄郵費一角二分即奉。杭州直骨牌街19號，儷記興號。〉¹³⁰再加上儷記興號的「儷」字便可知道這兩個組織皆是由張儷娟經營。

儷記興號主要代理的商品有香港天壽堂姑嫂丸、上海中法洋行盧普安女科丸、上海屈臣氏國貨汽水、新加坡星洲日報等。由此可以得知張儷娟雖然多以婦女學社、《婦女旬刊》編輯、記者之名出現在商業和文化市場之中，實際上卻同時擁有店鋪商家主的身分。不過礙於史料缺漏的限制，雖然我們無法推斷張儷娟是否是因經營商家有成，方有資金創辦刊物，或是因為創辦刊物、以廣告吸取經費後尚有盈餘，才開始經營商家，但兩種可能都彰顯張儷娟這名女性多角經營的能力。她不僅派丈夫何慨秋前往上海結識其他廣告業或出版業人士，更利用他的文化圈網絡為《婦女旬刊》增添多種面貌，並同

關於憶媚，無法辨明是本名或是筆名，但可自新光郵票會會刊《郵票新聲》中看到憶媚的文章，加上在《婦女旬刊》第267-268期同時成為編輯，所以在此推斷憶媚也是新光郵票會成員。其著作可見憶媚，〈華郵四寶之討論〉，《郵票新聲》，卷2期1(1927年)，頁3。

¹²⁹ 〈注意良伴益友〉，《申報》(上海)，1926年4月6日，版5。

¹³⁰ 〈贈送名貴國貨專號〉，《申報》(上海)，1930年4月30日，版12。

時招攬廣告賺取收益，為期刊營運添加更多保障。

研究《婦女旬刊》廣告不但可以了解婦女學社如何招攬廣告，以及學社與各廣告商錯綜複雜的社會網絡，我們更可以透過《婦女旬刊》廣告研究刊物的預設讀者，以及女性形象的呈現。前述已提及商家每年廣告經費有限，因此刊登廣告必定需要發揮最大效益，商家定然會先研判刊物的讀者身分、性別比例或有甚麼樣的興趣等考量，再置入相關的商品廣告。由於《婦女旬刊》不僅名為婦女，又常以「婦女刊物」旗幟行走於文化市場中，因此廣告內容多半也與女性有密切關係，如婦科藥品、女性化妝品、生理用品等，而這些商品廣告又彰顯社會對於女性的期待，以下將藉由分析廣告內容研究女性在市場中的形象建立。

四、商品介紹與性別意識

在《婦女旬刊》中，與女性形象有關的廣告主要分布於醫藥用品、服裝布料鞋襪、銀行保險、女性生理、化妝用品之上，其中又以醫藥用品佔最高比例。這一類廣告內容不外乎是主打商品帶有養氣、補血、調經、保胎、調理身體，或是更明確的指出能夠幫助懷孕，解決家庭紛爭等功用。例如第 206 期中，屬名桃源雷桐室主的藥商便以「諸姑姐妹惠鑒」為標題販售「益母種子珠」藥丸，廣告內容提到：

諸姑姐妹，伉儷情深，宜早結愛情之果，永享人生幸福。其在舊家庭而未曾懷甲者，尤宜及時種玉，早獲佳兒，克昌厥後，庶免翁姑詬病，夫婿別戀。……「益母種子珠」乃古傳秘方，不才令荊人試服，連獲一女二男。¹³¹

由引言可知此藥丸主打讓婦女能夠順利懷胎生育，以避免翁姑嫌棄，或

¹³¹ 〈諸姑姐妹惠鑒〉，《婦女旬刊》，期206(1926年5月11日)，頁9。

丈夫因無後而另結新歡。整份廣告不脫傳統價值觀，認為女性必須靠生育方能於夫家站穩地位，類似的廣告也可見於第 216 期香港延壽堂藥行販售的「鳳凰種子丸」。延壽堂以「家庭良藥、婦女珍品」為標題，搭配一名時髦短髮、戴著眼鏡的女性圖片，並寫下「種子有異方，文明人斷不肯求神拜佛，請服延壽堂鳳凰種子丸」。不同於前者行文較為傳統，延壽堂將閱讀此則廣告的讀者奉為「文明人」，奉勸欲懷孕者需用現代科學的方式取代求神問卜的傳統作法。

除了生育問題，《婦女旬刊》中更值得注意的廣告是銀行保險業廣告。1925 年張儷娟在〈五年來中國之婦女〉提到當今女子最切身的問題即是受教育，必須先藉由學習增加知識，提高人格才能選擇適合工作，而非低就於不道德職業。不論最後從事工商頁或事其他職業後就可獲得薪水，如此經濟便可以獨立，不再受他人管束、不仰食於他人，能夠自由的運用或儲蓄金錢方是真正的女界進步。¹³²有著這樣的理念使我們在閱讀時發現銀行保險業的廣告非常鼓勵女性進行儲蓄。最早是 1922 年 81 期的上海東亞儲蓄銀行以「經濟獨立為求自由根本問題，女士們要知經濟獨立方法請閱東亞儲蓄會章程包可解決。」¹³³以及上海東方儲蓄銀公司標榜「每月得優厚俸金，不費思想不費時間，又不必費一文資本，實有女子自立良法」¹³⁴為廣告說詞邀請女性讀者將身邊金錢存寄於銀行之中。1923 年中華書局出版《婦女寶鑑》書中也標榜此書能教女子「持家、理財、育兒、交際、待客、衣服、飲食、居住、生理、衛生、醫藥、看護、文藝、美術、手工、運動、遊戲、園藝、豢養」等

¹³² 〈五年來中國之婦女〉，《婦女旬刊彙編》，期1(1925年)，頁1。

¹³³ 〈上海東亞儲蓄銀行〉，《婦女旬刊》，期81(1922年)，頁13。

¹³⁴ 〈東方儲蓄銀行〉，《婦女旬刊》，期81(1922年)，頁13。

技能。¹³⁵到了 1928 年，上海國華銀行甚至改編兒歌「兩隻老虎」，寫了儲蓄歌：

提倡節儉，提倡節儉，快儲蓄，快儲蓄。一日儲蓄一錢，千日便成一千，備憂患，娛晚年。

勿效奢華，勿效奢華，能儲蓄，自富足。提倡平民儲蓄，提倡婦女儲蓄，有國華，有國華。¹³⁶

這首奢侈歌是《婦女旬刊》中首次出現「儲蓄以備不時之需」的概念，且除了平民儲蓄，還特別加上的「婦女儲蓄」。強調在這重尚奢侈消費的時刻，國民應懂得儲蓄。國華銀行除了設置一般儲蓄部門，還專為女性客戶延聘女行員、設置婦女儲蓄部，專營一切關於婦女方面儲蓄。除此之外，1929 年國貨專刊中，國華銀行除原有的活期儲蓄、定期儲蓄、特種儲蓄存券、禮券儲蓄，再提婦女儲蓄。若以婦女儉德、各項基金、子女婚嫁為存款名目，則利率自週息六釐至一分一釐，與教育基金一樣是所有儲蓄項目中利率最高的儲蓄方式，藉此鼓勵女子節儉存款。¹³⁷

同樣在國貨專號中，香港國民銀行也提出「人生儲蓄之必要」，強調父母應要計畫兒女教育費，「每月儲有定之金額以為兒女教育之經費，務使年年有養，毋有失學之餘。」並教導子女儲蓄理財的概念，讓孩子減少衣服裝飾、出遊享樂的花費。¹³⁸但到了 1932 年，香港國民銀行則是將儲蓄工作交付於母親之上：

婦女旬刊從單張辦起，經營十餘年，全賴平日的努力。女子平日苟能節省零星金錢，努力實行毅力儲蓄，家庭中的快樂，兒女輩學金，夫

¹³⁵ 〈中華書局婦女寶鑑〉，《婦女旬刊》，期109(1923年)，頁22。

¹³⁶ 〈儲蓄歌〉，《婦女旬刊》，期279-281(1928年8月30日)，頁30。

¹³⁷ 〈國華銀行〉，《婦女旬刊》，國貨專號(1929年5月)，頁12。

¹³⁸ 〈人生儲蓄之必要〉，《婦女旬刊》，國貨專號(1929年5月)，頁125。

婦的養老金，均可不憂而先備，有一切偉大的效果。成功非僥倖得來的，願女子努力。¹³⁹

除了銀行儲蓄廣告，還可以從保險廣告查看社會對於女性社會角色、功能的期待。1922年上海華安合群保險公司便邀請馬寅初撰寫廣告，文案指出：

女子嫁後，應使丈夫保險。社會之經濟組織，今異於昔，普通人多遷徙往來，且多恃衣身之技能以為生，故多無恆產；有此身存則無虞衣食，身亡則無升斗之蓄。寡婦孤兒，何以為生？如保壽險，平時所費無幾，不覺其負擔之痛苦，不幸而為未亡人，則可收入一筆保險費以之送死養生而有餘，按此便牽扯到女子較育與素常對於經濟事業之注意問題。¹⁴⁰

即便張儷娟的願景是女性成為受過教育的職業婦女，能夠以經濟獨立達成女界的期盼，但社會中對於女性的要求仍以家庭為主。雖然前面藥品廣告鮮少提及「國民之母」概念，但卻可在銀行儲蓄、保險買賣中見得。女性賺得薪水後不應購買奢侈品，而是需要培養節儉美德，將金錢存入銀行以備家中不時之需，更重要的是讓小孩受教育過程中能不受經費所困，沒有失學的危機。這些廣告雖然多傾向於將女性放置在被動消費角色，但實際上女性卻也能從這些廣告之中獲益。

以先前提到中華書局《婦女寶鑑》為例，雖然「寶鑑」內容不包括婦女職場指南，而是將內容限制於家庭之中，但對於意圖增進家政技能的女性來說又何嘗不是本寶鑑呢？或是日用食品廣告如味精、奶粉、罐頭等商品，雖然欲設客群就是家中賢妻良母，看似再次限縮女性生活界限，但實際上卻也

¹³⁹ 〈努力〉，《婦女旬刊》，卷16期29(1932年)，頁23。

¹⁴⁰ 〈家庭之樂，人壽保險〉，《婦女旬刊》，期124(1923年11月20日)，頁4。

提供婦女在料理或看照嬰兒上具體的協助。其他如化妝品或是服裝廣告也是讓女性得以追求美感、展現身體的健康、美麗。

此外，1928年甚至也出現女性題字收取潤筆費用的廣告。例如上海吳玉珍、鄧梅孫母女，¹⁴¹或是譚雲珊皆以書寫楹聯、堂幅、條幅、扇面、冊頁、招牌、名片為生，為文化市場中增添女性身影。¹⁴²

本章至此分析杭州中華婦女學社為經營浙江省第一份婦女刊物《婦女旬刊》，並確保刊物能持續經營而非朝開系閉，運用多種行銷策略如封面裝幀設計，邀請知名畫家繪製封面、政要題字，再與其他知名出版社交換刊物、互登廣告，或主辦地方活動，延攬讀者，並且廣設分銷經理處。甚至還利用編者本身的社會關係網絡延攬廣告，以獲得經費。不過除了這些行銷作為，中華婦女學社的社長張儷娟還與營業部主任何慨秋抓住文化市場脈動，因應時局不斷更動文章編輯團隊，使得這份《婦女旬刊》既有討論婦女的文字，更兼備小說、詩詞、雜文，甚至是民俗研究議題，文字選用上更是文白並列，呈現多元樣貌。以下章節將分析《婦女旬刊》自創刊以來編輯團隊的更迭，以及刊物風貌、內容的轉變。

¹⁴¹ 〈母女書約〉，《婦女旬刊》，期276-278(1928年7月30日)，頁11。

¹⁴² 〈譚雲珊買字粥文潤例〉，《婦女旬刊》，期279-281(1928年8月30日)，頁17。

第三章 《婦女旬刊》的編輯策略變化

《婦女旬刊》的編輯主要是由杭州中華婦女學社進行主導，但礙於經費不足時常缺乏稿件，導致總編輯邀請其他社團擔任客座編輯，希望能以專刊形式刊登該社團同仁的文章，避免《婦女旬刊》因稿件不足延誤出刊，甚至停刊。除了尋求社團協助，總編輯也邀請知名作家出任客座編輯，希望藉由作家名氣提升刊物銷售量。這樣的經營方式不只延續《婦女旬刊》發行壽命，更提供這些社團或作家施展的舞台，達到雙贏成效。不過除了關心刊物發行策略，透過中華婦女學社邀請的社團或作家還能進一步觀察 1920 年至 1948 年間文化市場趨勢，以及刊物中的社群網絡。

在《婦女旬刊》發行的 18 年歷史中，中國經歷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知識傳播等重大改變，這些轉變皆可由刊物編輯方針的修改或移轉看出端倪。中華婦女學社曾邀請文學社團綠社、蘭社、青社成員，以及民俗學研究社團杭州中國民族學會擔任刊物編輯和增加文章，使得《婦女旬刊》雜揉多種文類，形成多元樣貌。整體而言，起先《婦女旬刊》看似文學雜誌，之後又成為民俗學研究刊物，中日戰爭過後又轉為論述婦女與家庭為主的刊物。然而，由於刊物以「婦女」做為名稱，加上中華婦女學社又不比上海商務印書館出名，使得文學研究學者雖然注意到相同時期的《婦女雜誌》因為編輯策略、文章內容而被形容為新舊文學交鋒的戰場，但卻忽略《婦女旬刊》也是五四新文學與傳統文學共存的刊物。

至於民俗學研究者雖然關注中國民俗學的發展，但皆將目光放置北京大學、廣州中山大學的民俗研究社團、刊物之上，即便提到杭州中國民俗學會，也只談論杭州民俗學刊物《婦女與兒童》、《孟姜女》，但兩者的前身《婦女旬刊》皆草草帶過，未對中國民俗學會與中華婦女學社間的關係有進一步論述。

但無論是新舊文學爭辯或是民俗學研究熱潮的興起，《婦女旬刊》其實皆置身其中，刊物的編輯方針也隨著文化市場轉變進行調整。

中日戰爭期間《婦女旬刊》雖然停刊，但 1946 年 9 月在內政部和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許可下復刊，續出第 721 期直至 1948 年 12 月。雖然戰後的《婦女旬刊》不像戰前有其他社團協助出版，而是由零星的撰稿者編輯，但這樣的轉變正好可以研究戰爭對於出版社經營造成何種影響，中華婦女學社的編輯們在缺乏「盟友」協助之下如何延續刊物生命？

本章將依照《婦女旬刊》編輯群、刊物內容的轉變，將 18 年來的出版歷史分為 3 個階段，分別是新舊文化交融時期、民俗學研究時期，以及戰後復刊時期，企圖藉此方式討論《婦女旬刊》這本因五四愛國運動而起的刊物，日後又是如何隨著社會思潮演變更改編策略。此外，觀察各時期變化時，還可進一步分析文章作者們與編輯群之間的關聯性，從中找尋《婦女旬刊》知識生產者間的社會關係網絡。

第一節 新舊文化交融時期

一、《婦女旬刊》中的文學社團

張麗娟在〈婦女旬刊社十年來之經過〉一文中提到，因創刊初始缺乏稿件，因而向「舊文字」社團秋聲編譯社、閨聲社購買文稿。秋聲社發起人為李允臣，以《秋聲雜誌》作為社刊。刊物主任為范耀雯，內容有名著、文藝、詩詞、筆記、閨聲、劇談、小說、譯從、餘興等欄位。除了李、范二人，秋聲社另一管理者正是日後中華婦女學社總務部主任、《婦女旬刊》編輯何慨秋，在《秋聲雜誌》第一期，何慨秋寫道：

鄙人才淺學薄，承本社發起諸君推為管理社務之職，鄙人情不可卻，

只得勉力為之，此後尚望海內諸大文豪有以教正，鄙人幸甚。¹⁴³

不只何慨秋協助管理秋聲社社務，《婦女旬刊》編輯顧菊蝶也為《秋聲雜誌》撰稿。1920年10月27日，中華婦女學社聽聞北方發生災禍後，便將何慨秋編輯的《秋聲雜誌》和《群藝彙編》共150餘本一併送至紅十字會，託其變價出售以賑濟難民。至於另一社團閩聲社礙於史料缺乏，只知編輯為高劍華女士，由上海群學社於1917年3月出版，但與《婦女旬刊》、中華婦女學社的關聯並不清楚。¹⁴⁴

除了上述兩社團外，1922年《婦女旬刊》第83期〈後記〉寫道：「本刊八十五號特請蘭社編輯秋季小說號特此預告」，第85期「編餘剩語」：

這次婦女旬刊，要求我們蘭社，給他編輯「秋季小說號」稿子完全由同人擔任。所以蘭社，就召集了一次臨時會，討論這件事，後來議決通過，由每人撥出幾小時，暫停他處的稿件，由蘭社編輯部，給他們編輯一下子，這也是我們，對於婦女旬刊，一番熱心的表示呢。¹⁴⁵

蘭社是1922年於杭州成立，主要發起人為戴望舒，¹⁴⁶因愛好文學所以號召同學張天翼、戴杜衡、施蟄存、李伊涼、胡亞光等人組織而成，¹⁴⁷作品多

¹⁴³ 何慨秋，〈慨秋啟事一〉、〈慨秋啟事二〉，《秋聲雜誌》，期1(1918年11月20日)，頁4。

¹⁴⁴ 「出版項」，《閩聲》，期1(1917年3月)，頁204。

¹⁴⁵ 〈編餘剩語〉，《婦女旬刊》，期85(1922年)，頁14。

¹⁴⁶ 戴望舒，浙江杭州人，原名朝宗，字戴丞，號夢鷗。

¹⁴⁷ 《蘭友》中提供的蘭社成員名單：江紅蕉、王天恨、呂碧城、何海鳴、沈家驥、沈劍濡、李伊涼、吳靈園、范菊高、範煙橋、施青萍(施蟄存)、徐桌呆、徐碧波、姚民哀、姚庚夔、陳獨醒、孫弋紅、黃轉陶、張枕綠、張無諍、趙眠雲、戴荻源(杜衡)、戴夢鷗(戴望舒)、馬鵬魂、張函胡。而這幾位作家皆曾在《婦女旬刊》中

發表在《禮拜六》、《星期》、《半月》、《婦女旬刊》等刊物上。據施蟄存自述：

識戴望舒、戴杜衡、葉秋原、張天翼，皆中學四年級生，方以文字投寄上海報刊，秋原、天翼，皆善書法，已訂潤例鬻書。既有同聲之契，遂有節社之舉。同學文風而來者幾十許人，成立蘭社。¹⁴⁸

1923年發行社刊《蘭友》，歷時半年，到同年7月1日出版第17期以後，因經濟不支而停刊。有趣的是，《蘭友》經理者即是中華婦女學社。¹⁴⁹

兩者之間的友好關係使得中華婦女學社邀請蘭社擔任《婦女旬刊》秋季小說號編輯，除了這期以外，1923年第129期〈編輯部啟事一〉也寫道：「本部自即日起，特請張寒壺、馬鵬魂二君，襄助編輯，擔任撰述，二君年少多才，素蒙清譽，此後當專心為本刊造福。」¹⁵⁰除了擔任編輯，蘭社社員胡亞光曾為何慨秋創立的《學星》文藝月刊繪製插畫，也為《婦女旬刊》繪製多期封面。1923年創立亞光繪畫研究所、杭州暑期繪畫學校後更是多次刊登廣告於《婦女旬刊》之上。

此外，檢視《婦女旬刊》中「閨秀詩話」和「名閨詩話」專欄後發現，欄位編者呂君豪、范海容皆為綠社成員。綠社是在1924年由鍾韻玉成立於杭州，鍾韻玉既為綠社也是蘭社成員，綠社以《綠玉》月刊作為社刊，先後共出23期，以小說、雜文、舊詩詞為主，之後另出《綠雲》半月刊，共出版

投稿作品。其中趙眠雲、範煙橋、黃轉陶、范菊高、姚庚夔、徐碧波同時是星社成員，徐桌杲、江紅蕉、張枕綠也為青社成員。

¹⁴⁸ 沈建中編撰，《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上海：上海古籍書出版社，2013），頁46、章達庵著，〈蘭社詩人戴望舒〉，收入於政協杭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杭州文史資料》（杭州：杭州出版社，1994）第18輯，頁27。

¹⁴⁹ 杭州市政協文史委編，《杭州文史叢編》（杭州：杭州出版社，2002），頁111、〈小說專刊：蘭友〉，《婦女旬刊》，期90（1922年），頁5。

¹⁵⁰ 〈編輯部啟事一〉，《婦女旬刊》，期129（1923年），頁10。

8 期。¹⁵¹中華婦女學社與綠社的關係在本文上一章討論《婦女旬刊》廣告中的社會關係網絡時已略有提及，兩者之間的關係建立在何慨秋與鍾韻玉共同參加新光郵票研究會之上。之後綠社成員黃轉陶更是在《婦女旬刊》121 期後擔任名譽編輯，而黃轉陶也利用職務之便向《婦女旬刊》讀者們廣告即將出版的雜誌：

轉陶欲於歲終時，創辦文藝日刊一種，名尚未定，囑記者在本欄徵求讀者，有贊成斯舉者，請惠函黃君滿百人贊成即實行。¹⁵²

除了蘭社和綠社以外，本文對 1922-1934 年間《婦女旬刊》投稿數量在 3 篇以上的作者進行分析後發現，許多作者皆為上海青社、蘇州星社成員，尤其是發表文章數量眾多的作家，如蔣春木、徐碧波、馬鵑魂、戴夢鷗、范海容、李伊涼、鍾韻玉、戴滌源、薄友羊等人。

青社是張枕綠、嚴芙孫在 1922 年成立於上海，規定參加者必須有長篇小說著作，並經全體社員同意方可加入，曾出版社刊《長青》；¹⁵³星社則由范煙橋、趙眠雲在 1922 年成立於蘇州，至八一三會戰後才解散。星社曾以《星》(週刊)、《星報》(三日刊)作為社刊。社員以撰寫長篇、短篇小說創作為主，

¹⁵¹ 鍾韻玉著，〈杭州綠社〉，收入於顧國華編，《文壇雜憶全編》第1冊(上海：上海書店，2015)，頁151；鍾韻玉著，〈杭州早期文藝報刊〉，收於政協杭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杭州文史資料》第8輯(杭州：杭州出版社，1987)，頁82。

¹⁵² 〈編輯室〉，《婦女旬刊》，期124(1923年)，頁10。

¹⁵³ 青社成員：王鈍根、王蘊章、包天笑、周瘦鵑、李涵秋、胡寄塵、嚴獨鶴、何海鳴、江紅蕉、畢倚虹、朱瘦菊、程瞻廬、程小青，范煙橋、徐卓呆、趙苕狂、張舍我、張碧梧、許厘父、沈禹鍾、張枕綠、嚴芙孫。魏紹昌，《我看鴛鴦蝴蝶派》(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頁194-195。

筆記、詩畫、劇談為輔。¹⁵⁴

星社與青社為民初上海舊派文學或舊派小說作者參與的文學社團，這些作家大體與「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有高度重疊。¹⁵⁵在與這些文學社團結盟的情況下，《婦女旬刊》中出現大量小說、詩詞等娛樂性質較高的文體，此舉雖然讓《婦女旬刊》成為多元樣貌的雜誌，但缺乏論述文類使得刊物雖以啟蒙婦女為名，卻行舊文學之實，讓《婦女旬刊》被外界指為類似小說刊物，而非為女性謀福利，亦未能啟蒙、解放女性，違背創刊宗旨。面對這類嚴厲批判，總編輯張儷娟雖然也希望能提升刊物品質，但也有其他考量。

二、新舊共存，態度中庸

中華婦女學社的成立是受新文化運動影響，其宗旨與當時眾多刊物相同，意圖突破「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束縛，使女子接受新知，養成獨立人格和經濟獨立，進而與男性一般成為國民，肩負責任，所以希望藉著創辦《婦女旬刊》提升女子文化，並重視兒童培養，為家庭謀求幸福。然而，總編輯張儷娟在觀察同期其他刊物後指出，當時全國報章雜誌因五四愛國運動影響風起雲湧，內容大半為長篇論說文為主，《婦女旬刊》出版旨趣雖然希望內容也以刊登關於家庭、婦女、兒童的討論文章，但若完全仿效這些刊物，「殊多無益於士女，並必不得社會之歡迎。」更重要一點，張儷娟認為中國仍處於

¹⁵⁴ 蘇州星社1922年創立之初僅有趙眠雲、范煙橋、顧明道、鄭逸梅、姚蘇鳳、范菊高、屠守拙、范君博、孫紀予等9人，1932年又加入江紅蕉、蔣吟秋、徐卓呆、程小青、黃轉陶、嚴獨鶴、金芳雄、程瞻廬、周瘦鵑等26人。1937年時已達105人。徐乃翔主編，《中國現代文學詞典：第1卷 小說卷》（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52。

¹⁵⁵ 胡曉真，《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清末民初上海「傳統派」文人與閩秀作家的轉型現象》，頁121-123。

新舊過渡時代，必定不能完全以新法取代傳統，否則僅是紙上談兵，毫無意義。加上社會大眾對較為新潮、激進的言論早已麻痺，一旦讀者新鮮感消失將導致刊物銷量停滯，最後走向停刊下場。

張儷娟坦言道：「本刊只抱持久不敗之志，日久定必有所貢獻於女界與家庭」，換言之，就是抱持著「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精神，她相信只要期刊還能繼續出版，並且在每期小說雜品之中摻入「驚醒女界，改良家庭之言語」，就能讓刊物內容有益於社會大眾，並循序改變讀者們對於婦女的認知。¹⁵⁶張儷娟認為：

新文化之潮既澎湃於全國，而解放婦女之聲浪亦磅礴而鼓盪。我國女界雖不乏明哲，然際此婦女教育尚未普及之時，青年婦女智識初開，趣響未定，若無女子團體補正之，鮮有不為邪說所誤者。¹⁵⁷

相較於只傳播新潮言論，《婦女旬刊》的發行用意就是要擔任循序漸進的知識、思想傳播者，以避免快速更改社會價值觀帶來的誤讀、誤解與衝突。即便是論說文，也要求能論說文也「均抱折衷雙方兼顧之旨，以符合社會人士心理」。

除了大眾容易對長篇論述感到不耐和麻痺，更重要的是「女界在當時能知新文學情形，尤不易求」，換言之，即便張儷娟願意將《婦女旬刊》文章全部改為論說文，仍會面臨稿件不足的困境。因此，為了使《婦女旬刊》普及化，編輯們曾於 1923 年 111 期中宣告：

本刊往後，擬按定篇幅，劃分欄目，…本刊於應時或倡酬之詩詞、詩話、詩鐘、遊記、哲學、倫理，鼓吹世界語之文字，及侈言愛情以外

¹⁵⁶ 張儷娟，〈婦女旬刊社十年來之經過〉，《婦女旬刊彙編》，期1(1925)，頁1-18。

¹⁵⁷ 〈婦女學社宣言〉，《婦女旬刊》，期273/274/275(1928)，頁1。

之小說……。¹⁵⁸

但張儷娟這樣的態度致使《婦女旬刊》日後的編輯感到困擾，1928年，何慨秋聘請新光郵票研究會的張包子俊和憶媚擔任編輯，憶媚就表示《婦女旬刊》雖然已經有多年的歷史，但必須承認過去內容完全是新舊過程中的產物，缺乏開明、進步的思想，也沒有大膽的言論，雖然不乏品質很好的文章，但是對於婦女問題的討論似乎還有待加強。¹⁵⁹幾個禮拜後，憶媚便收到讀者的怨言和建議。

第 279 期中，一名署名葉元燦的讀者表示，《婦女旬刊》除極少數文章外，多半是抱持折衷主義，帶有中庸之道的文章，鮮少有放膽說話的言論。他對這種「新舊兼收的雜貨店態度，與騎牆精神，委時反對。」尤其是刊物中的小說皆是暮氣沉沉，甚至不能算是文藝作品。在得知現在編輯換人之後，葉元燦希望未來《婦女旬刊》能加強 4 個主題：婦女問題、學術論文、文藝作品、讀物指導。葉元燦認為婦女問題應該是《婦女旬刊》最注重的議題，而學術論文和讀物指導則能提供受過教育的女子持續學習新知，並能藉由編輯提供的書籍、書評帶領讀者閱讀，以拓展女性視野。文藝作品也務必專門刊登純粹的新文學，而不是那類「腐朽的爛調文章」。¹⁶⁰

面對葉元燦苦口婆心的評論和建議，《婦女旬刊》編輯再次表達編輯最大難題就是稿件缺乏，加上經費不夠無法購買知名作家的文稿，使得編輯們只好用較為「次等」的文藝作品填補婦女問題論說文的空窗，同時，編輯們也呼籲讀者若要看更有品質的《婦女旬刊》，應不吝投稿。相關徵稿條件也與 1923 年徵稿啟事不同，編輯希望文章主旨以婦女問題和文藝為主，其他科學、自然、社會、藝術及書報批評，或是各地婦女生活狀況及勞動婦女的情形等

¹⁵⁸ 記者，〈編輯餘瀋〉，《婦女旬刊》，期111(1923年)，頁10。

¹⁵⁹ 憶媚，〈本社的改組〉，《婦女旬刊》，期267-269(1928年)，頁24。

¹⁶⁰ 葉元燦，〈通訊〉，《婦女旬刊》，期279-281(1928年)，頁20-22。

文字也十分歡迎。不過，編者也強調縱然文稿立場對立，只要邏輯通順，結構完整皆會刊登。¹⁶¹

1929年，樓尹庚接下編輯重任後也表示，雖然編輯刊物是令一般女性曉得解放的需要，但是「人的思想誰也不能強同，我們並不希望全刊物的一致，所以在這裡的稿件，只是作者個人負責，即使矛盾的言論，也一樣的容納。」¹⁶²由此可見，即便讀者已來函要求編輯們不要再抱持兩面討好的態度，但編輯們仍保持一貫中立的態度，力求《婦女旬刊》成為「異言堂」，而非「一言堂」。

《婦女旬刊》的堅持雖然如張儷娟表示有自身考量，但不僅部分讀者不滿，也使得《婦女旬刊》即便達到流通效果，但多半只留給讀者發行時間較長的印象而已。例如1936年，談社英在《中國婦女運動通史》中提到：

元二年後，婦女運動又告沉寂，蓋值袁氏壓抑民黨時代，各種民眾運動，均不能有所推進，婦女運動，更無論矣。故各地婦女團體，至鮮存在，所能有較久之歷史者，只一、二富有團結性，努力推行之團體耳。因而婦女刊物亦俱停頓，一時幾無婦運之痕跡，迨民國六年，杭州婦女學社創辦婦女旬刊，六月一日出版，內容多載關於婦女及家庭諸消息，**雖非若一般婦女刊物專以提高婦女地位為關鍵**，然其生命特長，固已有其十數年之歷史，出至六百餘期，至今尚存在也。¹⁶³

另外一項飽受批評的即是刊物作者的性別比例。1930年項士元在《浙江新聞史》中提到浙江地區發行時間較久、傳播時間較廣的刊物包括《婦女旬

¹⁶¹ 〈徵稿啟事〉，《婦女旬刊》，期279-281(1928年)，頁2。

¹⁶² 尹庚，〈編後〉，《婦女旬刊》，期294-296(1929年)，頁22-23。

¹⁶³ 談社英，《中國婦女運動通史》，頁92-93。

刊》。但是刊物「迄今主筆屢易，婦女學社之組織，亦依然未有進展，最近主持筆政者，為樓尹庚，**婦女參加者甚鮮。**」¹⁶⁴項士元的批評不無道理，附表3列出目前所掌握最早的資料1922年第81期至1930年324期，《婦女旬刊》555名作者中，撰稿3次以上的編輯和投稿人83名。¹⁶⁵扣除無法找到生平資料，也無法從文章內容判別性別的作者13名，女性於其中僅佔8名。不過早在項士元提出質疑以前，許多期的編後語就可以看出編輯群對此情況感到焦慮。1923年第98期編後語說道：

在過去的本刊中，男子投稿較女子約占全部三分之二，女子僅占少數，諸姑姊妹如認吾女界各種問題為重要者，不甘男子單獨進行，自身處於被動地位，尚望多於匡助無任企盼，本刊既提倡女權，故今年起預備徵求女校作品，使本刊增添材料，從事革新。¹⁶⁶

在121期，來自蘇州的讀者顧明道撰文提出對《婦女旬刊》的閱讀心得，除了希望編輯能多刊登家庭常識和家政方面的實用文章，以及圖畫外，更表示他覺得「旬刊上面婦女的著作還少，所以我望讀婦女旬刊的女同胞，快快用心做些稿子，來代自己女界中充先覺，使我國婦女文化史放一光明異彩饒好。」但也期望蘇州能早日有如《婦女旬刊》一般的婦女刊物，教化當地女子。¹⁶⁷同一期中，張儷娟又再次徵求女性撰文投稿：

本刊自出版迄今，最不能滿意者，即歷次所收各稿，吾女界姊妹寄來者，為最少數，且有時不能得女界片紙隻字，實為一大缺憾也，在閱者方面以為本刊不盡力向女界徵求，不知吾國女界諸君尚有不願作稿

¹⁶⁴ 項士元編，《浙江新聞史》，頁20-21。

¹⁶⁵ 本研究利用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系統」、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近代婦女期刊資料庫」、北京線裝書局整理出版《婦女旬刊》，以及浙江圖書館孤山古籍部收藏《婦女旬刊》，對刊物作者進行統計。見頁114。

¹⁶⁶ 張儷娟，〈編輯室〉，《婦女旬刊》，期98(1923)，頁8。

¹⁶⁷ 顧明道，〈我對於婦女旬刊的感想〉，《婦女旬刊》，期121，頁10。

寄贈...本刊盼望女界諸君以後破除裹步自守之成法，隨時發揮個人之意見，源源賜教，不負本刊創辦之初旨也。¹⁶⁸

1924年141期，張儷娟更將該期內容設定為新詩，希望藉「登載這種關於性靈的文字，導誘婦女界走上文藝的路上去，更希望海內熱心婦女文藝的，加以指導。」同時還邀請女性文學家金明霞擔任名譽編輯，希望藉金明霞的名聲和相對容易撰寫的新詩來提升女性投稿數量。¹⁶⁹

綜觀《婦女旬刊》在這一時期的編輯方針改變，其實可以得知總編輯張儷娟不斷尋求各類文學社團與作家協助，並維持中立態度，務求刊物內容不偏頗任何一方。

三、《婦女旬刊》的文章欄目

《婦女旬刊》自創始之初，並無明確訂定各欄目名稱，雖偶有出現「言論」、「說蒼」、「滑稽」、「小說」、「筆記」、「文苑」等標題，但並非所有相同類型的文章在每一期中皆被安置其中。直到1925年中華婦女學社為總結過往6年發行成績，將連載於各期的論說、小說、雜文等重新編排刊出，並分別於1925年、1926年出版兩集《婦女旬刊彙編》。

雖然《婦女旬刊彙編》收錄的文章僅有1920年至1925年，但觀察這6年成果大致可以理解《婦女旬刊》的特色。《婦女旬刊彙編》分為圖畫、思潮、詩話、短篇小說、叢談、藝林、長篇小說、雜俎等9類。「圖畫」除了放置4張西湖風景圖，最重要的是提供9張贊助者、中華婦女學社職員照片。「思

¹⁶⁸ 張儷娟，〈編輯紀略〉，《婦女旬刊》，期121(1923)，頁5。

¹⁶⁹ 記者，〈寒暄語〉，《婦女旬刊》，期141(1924)，頁1。

潮」這類即是論說文，兩期彙編中共有 31 篇文章，探討主題包括婦女解放、婦女參政、女子教育、女學生、婚姻、社交公開、家庭經營以及兒童照顧等。雖然看似囊括諸多議題，但每個議題至多僅 3 篇文章討論，遠遠不及其他婦女刊物。兩期彙編中還是以小說類和雜談類佔據刊物較多版面：詩話 6 篇、叢談 34 篇、短篇小說 71 篇、藝林 71 篇、長篇小說 9 篇、雜俎 24 篇。

由此可見，1925 年以前「思潮」論述文章僅占《婦女旬刊》兩成以下，雖然張儷娟認為只要在每期小說、雜文之中摻入部分「驚醒女界，改良家庭之言語」，就能收寓教於樂的效果，但實際上卻給讀者留下雜文多於正式討論婦女解放和啟蒙的文章。另外，由於《婦女旬刊》過往在徵稿時，未要求讀者使用白話文，或是標點符號，使得這些文章多半使用文言文寫作。單以《婦女旬刊彙編》最重要的文章為例，張儷娟在《婦女旬刊彙編》第 1 期以〈編輯記略〉講述創辦中華婦女學社和《婦女旬刊》的心路歷程，但此文缺少句讀，讀者僅能自行斷句閱讀。第 2 期時，張儷娟再次刊出相同文章，但將標題改為〈婦女旬刊社十年來之經過〉，並加上標點符號方便讀者閱讀。不過也僅限於這篇文章而已，其他部分仍是文白交雜、缺少標點符號。1926《婦女旬刊彙編》第 2 期出刊後至 1935 年以前，《婦女旬刊》的內容皆與先前幾乎相同，並未因編輯更迭而明顯改變論說文、小說、詩詞雜揉的情況。直到 1935 年第 19 卷開始，整體風格才有了大幅改變，而此差異主要正是因為《婦女旬刊》至此開始交由杭州中國民俗學會編輯，所以內容上增添許多民俗學相關文章，而小說、詩詞等文類則大幅減少。

第二節 民俗學研究時期

一、《婦女旬刊》中的杭州中國民俗學會

1935 年 1 月 1 日，《婦女旬刊》出版第 631 期(第 19 卷第 1 期)，並將這

期定為「復興號」，至於復興何物編輯卻隻字未提。不過自此開始，《婦女旬刊》在封面和文章結構安排與之前有顯著改變，其中最重要的改變就是《婦女旬刊》往後每一期皆增加多篇民俗學研究論文，封面也由原來的子樣貌畫作改為各地非漢族女性的圖片。雖然編者不同以往在編後語對編輯群或刊物內容更迭提出解釋，但本文在分析作者群身分後得到結論，《婦女旬刊》自第 631 期以後，雖仍由中華婦女學社發行，主要編輯成員已不是過往的文學社團或作家，而是由杭州中國民俗學會承擔編輯工作。

杭州中國民俗學會正式成立期間學界目前仍有爭議，學者王文寶經考證後認定該會成立於 1932 年。杭州民俗學活動起於 1929 年浙江大學文理學院「民俗週刊社」，終於 1937 年《孟姜女》停刊。民俗週刊社於 1929 年 5 月 30 日至 7 月 18 日間發行 9 期《民俗週刊》，是杭州第一份民俗學刊物和組織。1930 年，鍾敬文又與江紹原等人組織「杭州民俗學會」，並於《杭州民國日報》上以副刊形式出版《民俗週刊》，自 10 月 16 日《民俗週刊》第 8 期開始，刊頭上右側悄然印上「民俗學會編」、左側則是「通訊處：浙江杭州直吉祥巷 43 號婁子匡轉」等字樣。而與《婦女旬刊》有關係的第三個組織「杭州中國民俗學會」則是 1932 年才由鍾敬文、婁子匡、錢小柏等人成立。¹⁷⁰

鍾敬文在 1987 年時回憶中提到杭州中國民俗學會雖然會員不多，資金

¹⁷⁰ 關於杭州地區民俗學研究發展，學者各有推斷、結論。但與《婦女旬刊》最有關聯的杭州中國民俗學會創辦人鍾敬文也坦言對此回憶已不太清楚。王文寶以創辦人間信件和各相關刊物進行反覆考證後推論應為 1932 年成立。王文寶，《中國民俗學史》（成都：巴蜀書社，1995），頁 232-234。相關資料和研究也可參考：黃書權編，《鍾敬文文集：第一卷 民俗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楊哲，《風雨世紀行：鍾敬文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或者施愛東，《中國現代民俗學的鼓吹與經營》，臺北：秀威出版社，2018。

也匱乏，但由於中國民俗學發展在歷經北京大學歌謠運動、廣州中山大學民俗學運動後，學界和出版文化界對於民俗學已有基本認識和興趣，加上又獲得各地學者如顧頡剛、周作人、董作賓等支持下，很快便在杭州形成民俗學運動第三波高潮。然而，中華婦女學社與杭州中國民俗學會的連結不同於早年與蘭社、綠社等建立在友誼關係之上。¹⁷¹

據鍾敬文說法，杭州中國民俗學會曾在 1935 年出版《婦女與兒童》，而這份刊物是接續《婦女旬刊》而來。鍾敬文認為《婦女旬刊》主要目的是為了招登廣告，至於刊物內容根本不重視，長期以來廣告與文章並重，甚至是廣告多於文章的出版情況。所以中國民俗學會便與中華婦女學社商量合作，接下編務，自 1935 年《婦女旬刊》第 638 期改名為《婦女與兒童》，將刊物性質轉為民俗資料旬刊。¹⁷²

《婦女與兒童》創立後，由妻子匡以「柳飛燕」作為化名擔任編輯，但之後妻子匡認為《婦女與兒童》出版的「朝鮮民間文藝號」、「說明神話號」、「民俗女英雄故事號」等專號已悖離「婦女」與「兒童」的主旨，遂將刊物於 1937 年 1 月 1 日更名為《孟姜女》，專門刊登民俗學研究成果，直到抗戰前夕停刊。¹⁷³

若依據鍾敬文所述，《婦女旬刊》的壽命終止於 1935 年 5 月 1 日第 638 期，然而本文比對《婦女旬刊》、《婦女與兒童》後發現，《婦女旬刊》第 638 期出版時，《婦女與兒童》也同時發行，兩者皆將該期定為「兒童故事專號」。但有趣的是，這兩份刊物內容完全相同，僅在刊頭和出版資訊相異。

首先，在《婦女旬刊》上，刊頭右側寫著「創始於民國六年六月一日」，

¹⁷¹ 黃書權編，《鍾敬文文集：第一卷 民俗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334。

¹⁷² 楊哲，《風雨世紀行：鍾敬文傳》，頁 162。

¹⁷³ 王文寶，《中國民俗研究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頁 124。

左側則是「第十九卷第八號(總第六百三十八期)，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一日出版」；《婦女與兒童》則僅有左側寫道「第十九卷第八號(總第六百三十八期)，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一日出版」，少了右側「創始於……」(見圖 26 至圖 29)。其次，《婦女旬刊》內出版資訊寫道：

編行人長名寺巷九號、經售處上海福州路生活書店、定購處杭州官巷口正中書局、寄售處上海杭州各大書店。每期每號五分，預訂連郵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

國民政府內政部警字第一七九七號登記證、中央宣傳委員會文字第三十八號登記證、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第五二二號認為新聞紙類。¹⁷⁴

然而，《婦女與兒童》又是另一風景：

編輯人柳飛燕、發行者婦女與兒童社、經售處杭州新民路北新書局、杭州官巷口正中書局。

社址杭州吉祥巷四十二、刊價每號五分、定閱連郵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

藉引文對比便得知雙方在 638 期後於發行資訊處「各說各話」(見圖 30、31)，承繼《婦女旬刊》的《婦女與兒童》雖然在刊頭捨棄悠久歷史淵源，卻仍以「第十九卷第一期」作為期數，一直到 1936 年中旬，仍以「第二十卷」作為刊物編號，而內容也持續與《婦女旬刊》相同。礙於史料限制，雖然無法判定雙方所謂的「商量合作」究竟是如何協議，是否同意以不同刊物名稱共享稿件，不過至少可以證明《婦女旬刊》的發行並非如現階段各中國民俗學研究論文所說終於杭州中國民俗學會手上。

¹⁷⁴ 「出版資訊」，《婦女旬刊》，卷19期8(1935)，頁7。

圖26 《婦女旬刊》卷19期8 封面

圖27 《婦女與兒童》卷19期8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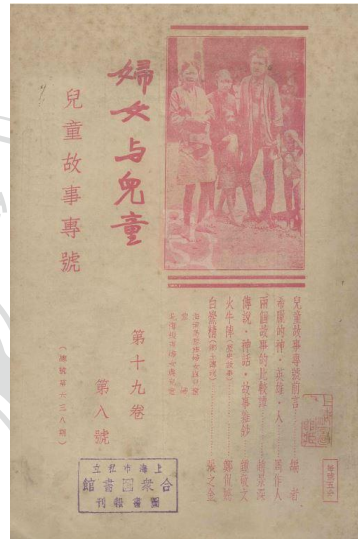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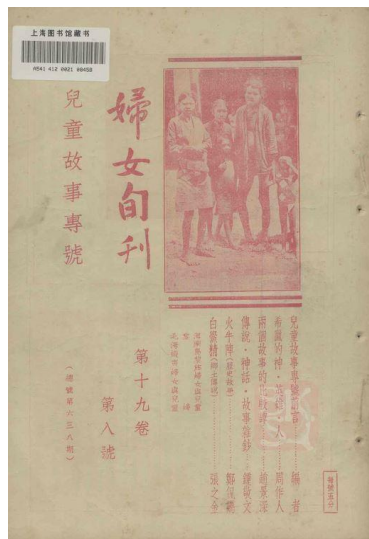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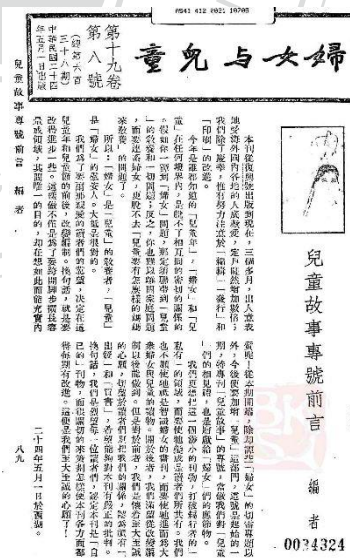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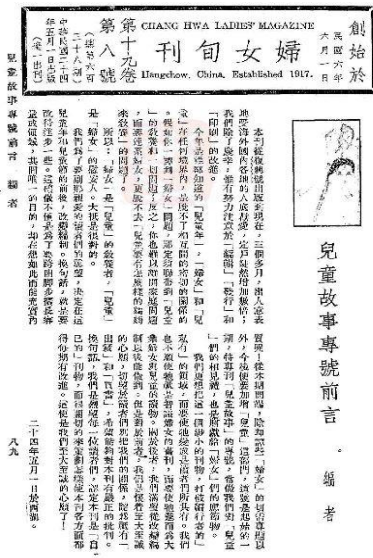


圖28 《婦女旬刊》卷19期8 首頁

圖29 《婦女與兒童》卷19期8 首頁



文學提供寶貴資料。¹⁷⁶

《婦女旬刊》中首次刊登各地風俗民情見於 1923 年第 95 期，蔣春木〈北京之婦女〉。蔣春木到北京後特意觀察該地婦女，並提出北京的女乞丐較男乞丐多、多數婦女仍裹小腳、女子出門多穿旗袍等觀察。¹⁷⁷但不同於《婦女雜誌》，《婦女旬刊》未在之後設立專欄，固定徵求相關研究或趣事，直到 1928 年才在徵稿啟事中看到編輯歡迎讀者各地婦女生活狀況及勞動婦女的情形，但效果不彰。一直到 1935 年杭州中國民俗學會協助後才開始系統性刊登相關著作，例如〈陝東一代怎樣結婚〉、〈處女祭蛇傳說：朝鮮民間故事〉、〈獸娘的故事〉。不僅如此，《婦女旬刊》又以兒童故事、婦女生活經驗、兒童歌謠、婦女戀歌等主題做為刊物專號，廣蒐各地資料。

必須注意的是，《婦女旬刊》雖出現民俗學刊物的樣貌，但並未捨棄原先對於婦女議題的堅持，甚至比以往刊登更多論述文章。編輯們更是於第 19 卷時，將《婦女旬刊》帶入當時「中國婦女回家」論戰，編輯找來眾多名人撰寫意見，並如同過往歡迎各種對立立場的文章，但此舉也使得有些讀者將《婦女旬刊》歸類為保守態度。

第三節 戰後復刊時期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期間，中華婦女學社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教育部、中央賑濟委員會、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中國戰區急救兒童聯合委員會幫助下，由杭州一路撤退至閩粵邊境，最後於 1946 年 9 月，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內政部核准下復刊，續出第 721 期。¹⁷⁸藉刊物內提供出版資

¹⁷⁶ 〈編輯餘錄〉，《婦女雜誌》，卷7期1(1921年)，頁126。

¹⁷⁷ 蔣春木，〈北京之婦女〉，《婦女旬刊》，期95(1923年)，頁2。

¹⁷⁸ 梅，〈告讀者〉，《婦女旬刊》，期721(1946)，頁1。

訊可知《婦女旬刊》發行者雖改為中華婦女旬刊社，但實際上與過去的中華婦女學社仍是相同組織，因為這兩個名稱在戰前發行時即不時替換使用。然而過去的總編輯張儷娟、何慨秋，或是戰前主持刊物的杭州中國民俗學會等人皆不再出現於《婦女旬刊》中，取而代之的編輯只署名「梅」。

除了編輯改變，依據戰後《婦女旬刊》期數便可知出版頻率也大幅下降，以第 727 期和 728 期為例，兩者出版時間分別是 1947 年 3 月 31 日和 4 月 30。所以雖名為旬刊，實際上幾乎成為月刊或半月刊。但若不論發行是否準時，戰後《婦女旬刊》的文章品質不輸過往，甚至令人有青出於藍的感覺。這時期可閱讀到的《婦女旬刊》共有 26 期，文章總數 217 篇，其中不論是原創作品或是翻譯著作，論說文便有 163 篇，佔整體高達四分之三。這些文章主旨多圍繞在家庭經營、夫妻之道、節制生育，以及兒童營養衛生、教育之上，即便是散文或是小說主題也是如此，與戰前充斥著詩詞、漫無邊際的雜文截然不同，而且不再文白不分，每一篇文章也都加上標點符號。

值得注意的是，刊登的文章依舊秉持《婦女旬刊》一貫宗旨，只要邏輯通順，即便立場相左、對立，編輯們仍會將稿件刊出，交由讀者自行學習和評判。另外，對這 217 篇文章進行作者統計後可以發現，文章數量最多的作者即是編輯團隊，包括每期編後語以及外國新聞或女界消息的翻譯作品，以及先前未曾出現的家庭知識專欄。其他作者最多也只撰寫兩篇文章，但多數都只是單篇作品而已，這點也與戰前有很大差異。不論是在新舊文化交融時期或民俗學研究時期，皆可以看到撰稿多篇的作者，如金震、蔣春木、徐碧波，或是中國民俗學會的鍾敬文、婁子匡等人，但《婦女旬刊》復刊後，經營方式不同於過往與社團結交，使得刊物裡缺少「明星作者」，但是這也使得刊物不會被特定社團或作家掌握，雖然文類僅剩下論說文、小說和極少量的散文，與之前雜揉各文體的多元面貌不同，但少了社團引領創作潮流反倒使

得文章內容更顯豐富。

本章依照編輯群、文體變化將《婦女旬刊》分為三個時期，但須注意的是，雖然每一時期文章風格轉變顯著，但在思想上卻都是「新舊交融」，沒有絕對保守，也無全然的進步。《婦女旬刊》出版時即處於文學研究者所說的新舊文學交融或是交戰時期，杭州中華婦女學社雖是響應新文化運動創立《婦女旬刊》，但就本章第一節分析可知，《婦女旬刊》中的「舊時代」文學體例、文學家、文學社團仍占據大量篇幅，然而這樣是否就代表著《婦女旬刊》違背新文化運動的「創新」精神呢？

1942年，陳蝶衣於期刊《萬象》中指出，五四以後，新舊文學雖形成了對立局面，但卻很少有人能對新舊文學畫出明顯界線。一般人會以三種方式判別：第一是以寫作的工具是文言文或白話文來區分新文學或舊文學，第二是以派別作為區分，如「鴛鴦蝴蝶派」，第三種是以表現的文體區分，如古詩相對新詩，章回小說對應歐化體小說。但這三種分類方法僅是皮毛之見，陳蝶衣認為新舊文學的界線應該以思想，而非形式作為區分。¹⁷⁹誠如張儷娟的辯白，作家們雖然都是用文言文小說或雜文形式寫作，而不是具有強烈論證意識的論說文，雖然看似不符合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風潮，但就內容而言，仍是帶有婦女解放、家庭革新的觀念。

此外，自1898年7月24日《女學報》在上海創刊以後，婦女報刊正式進入歷史舞台，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婦女報刊更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期刊做為新的傳播媒介延伸了人的視野，重構時空網路，也使女性有了一個新的發表空間。¹⁸⁰隨著時代的進步與發展，女性不僅是大眾媒體和觀眾關注的對

¹⁷⁹ 陳蝶衣，〈通俗文學運動〉，《萬象》，卷2期4(1942年)，頁131-132。

¹⁸⁰ 蔡佳儒，〈新女性與舊文體——呂碧城研究〉(南投：暨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頁45。

象，知識女性也逐漸掌控一些報刊、雜誌的話語權，試著建構自己的形象。如同季家珍《民國鏡象》所述，女性不再只是客體被凝視，她們也展現主體性凝視與創作被凝視者，¹⁸¹《婦女旬刊》雖然沒有提出擲地有聲的大膽言論，卻也以「辦刊物」作為回應時代的方式，藉此展現女性對於時代的認識以及如何自處。下一章將對《婦女旬刊》進行文本分析，探討這份發行長達 18 年的刊物關注哪些婦女議題，以及小說、詩詞或民俗學研究與婦女又具有何種關聯性？



¹⁸¹ Joan Judge, *Republican Lens: Gender, Visuality, and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第四章 《婦女旬刊》中的女性多元形象

第三章已將《婦女旬刊》發行歷程按時間、風格轉變分為新舊交融時期、民俗學研究時期以及戰後復刊等 3 個階段，然而時間和風格雖然可以分出區段，但思想的演變過程卻無法一刀切割。綜觀刊物內容可以發現，總編輯張儷娟的確保有她對讀者的承諾，雖然不是整本刊物都以論說文為主，但不忘利用各種不同文體展現對女性議題的關懷。例如第一階段刊載多屬於「舊時代」小說、詩歌，作者也多為「舊派文人」，第二階段又增加許多看似無關的民俗學研究，但大部份作品主題仍然圍繞在情感關係、教育政策、政治經濟發展、文學成就等四個與其他婦女刊物共同關注的話題之上，並未讓《婦女旬刊》成為純粹的文學刊物或民俗學研究刊物。雖然看似專業度不夠，但以編輯和出版社辦刊發行目的而言，《婦女旬刊》確實藉由多元的議題培養出不同類型的讀者，維持刊物發行。

《婦女旬刊》的四個議題又包括諸多面向，情感關係涵蓋社交公開、男女貞操觀平等、婚姻自由、戀愛自由、限制生育、家庭經營等方向；教育政策包括女子「賢妻良母」式教育、職業教育、女學生與社會形象塑造等議題；政治經濟發展關注女性經濟獨立、職業婦女回家論戰、女性與社會階級、女子參政權等論點；文學成就則討論古今女性創作，如閨秀詩話、長篇、短篇小說等作品。這些議題分別在不同時期，藉著論說文、散文、文學小說、民俗故事、詩歌等不同文體出現在《婦女旬刊》之中。

在張儷娟秉持一貫中立的立場下，《婦女旬刊》登載的文章中，時常出現各種衝突、矛盾的言論。面對讀者對於《婦女旬刊》態度曖昧的批評，張儷娟認為刊物一旦成為「一言堂」便使那些持反對立場的讀者放棄閱讀，造成刊物發行量降低。所以本章秉持刊物的精神，將《婦女旬刊》中的議題分類，觀看編輯群們如何藉由傳播媒體塑造女性形象。

第一節 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一、品學兼備的才女

《婦女旬刊》創立宗旨與其他通俗刊物一樣，不僅希望讀者能將閱讀視為日常休閒娛樂，更能從中達到啟蒙作用。然而如同張儷娟所說，若整份刊物皆是嚴肅論說作品，久而久之讀者即喪失閱讀樂趣，所以希望《婦女旬刊》能夠寓教於樂、雅俗共賞。在這種期望下，小說或詩詞的趣味性更能引起讀者興趣，因此《婦女旬刊》便刊載許多文藝、詩詞、筆記、閨秀詩話、小說等專欄。在眾多餘興文章中，閨秀作品收錄許多女性的生平資料，以及她們所創作的各類詩詞曲賦。

閨秀詩話時常見於民初雜誌專欄之中，除了《婦女旬刊》，還可見於《婦女雜誌》、《婦女時報》等女性刊物，或是《家庭雜誌》、《眉語》、《藝林月刊》。¹⁸²這些記錄不僅為研究女性文學提供重要資料，更可從中分析閨秀詩話的創作是否有固定的模式，又或者報刊登載這些作品可以傳遞何種資訊給讀者，達到啟蒙作用。

《婦女旬刊》中有關女性文人生平資料和作品的文章可見於單篇文章，如〈蕭嫺女書家小史〉、〈范雪英女士小傳〉、〈紅鵑女士傳〉、〈次周梅影女士見贈韻〉、〈泣珠餘話〉、〈信芳集〉等，¹⁸³或是系列連載文章，如范海容〈閨秀詩

¹⁸² 潘靜如，〈近代雜誌所載閨秀詩畫考論〉，頁50-56。

¹⁸³ 薄友羊，〈范雪英女士小傳〉，《婦女旬刊》，期96(1923年)，頁8、高秋埜，〈紅鵑女士傳〉，《婦女旬刊》，期161(1924年)，頁7、謝玉冰，〈次周梅影女士見贈韻〉，《婦女旬刊》，期163(1924年)，頁4-5、徐枕亞，〈泣珠餘話〉，《婦女旬刊彙編》，

話)、¹⁸⁴呂君豪〈名閨詩話〉、〈名媛詩話〉¹⁸⁵、陳蘭言〈羅魂木影室尚友錄〉，共計 111 名。¹⁸⁶不同於《婦女雜誌》在 1 卷 1 時設立「文苑」專欄時，已標明不論是詩、詞、歌、賦，皆要是女子所作，¹⁸⁷《婦女旬刊》內的女性文章多是由男性文人集稿而成，僅有〈信芳集〉與〈羅魂木影室尚友錄〉是由女性作者自己投稿。

編者們選錄的女作家除少數為宋代、元代，或民國當代，大部分是明清時期的宦宦眷屬、文人妻室，但也不乏收錄旅行途中所見的詩詞文章。作品多半以宦遊所見所聞、夫妻唱和、深閨怨婦、詠物傷感、思鄉離別等情感敘述作為主題。例如姚民哀〈婦女詩話〉裡其中一位女主角武昌蕭蓮蓀，與丈夫宦遊浙江時寫下《望江樓詩集》；洪翠雲於表妹出嫁時作詩三首，將閨房情景描寫入微。¹⁸⁸

就讀者而言，理所當然認為閱讀這些詩詞可展現女子的心聲，揭開女性閨房和心靈的神秘面紗。但就字裡行間透露的訊息可知，許多女性完成作品後，只給家人欣賞，之後便自行焚毀或散佚，若非親友刻意蒐集，再無重見天日之時。換言之，一部詩集的完成須經過編纂者、題跋者、題詞者、校勘

期1(1925年)，頁1-2、呂碧城，〈信芳集〉，分別載於《婦女旬刊》，期167、168、171、172、173、174、178(1925年)、期197、199、202(1926年)。

¹⁸⁴ 范海容，〈閨秀詩話〉，《婦女旬刊》，期177(1925年)，頁2、期180(1925年)，頁2-3、期186(1925年)，頁5。

¹⁸⁵ 呂君豪，〈名閨詩話〉，《婦女旬刊》，期128(1923年)，頁12、期129(1923年)，頁5、〈名媛詩話〉，《婦女旬刊彙編》，期1(1925年)，頁3。

¹⁸⁶ 陳蘭言，〈羅魂木影室尚友錄〉，《婦女旬刊彙編》，期1(1925年)，頁17-18。

¹⁸⁷ 不過學者已指出，自1卷3期後「限女」規定就被打破，之後男性作品越來越多，甚至到2卷1其後，「文苑」收錄的文章都是貞女傳、節孝傳，婦女詩詞作品不復存在。胡曉真，《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清末民初上海「傳統派」文人與閨秀作家的轉型現象》，頁178-184。

¹⁸⁸ 姚民哀，〈婦女詩話〉，《婦女旬刊彙編》，期1(1925年)，頁2-3。

者和序文作者層層「審查」。值得注意的是，選文的標準是掌握在男性文人們之上，所以讀者雖然可以藉由詩集內容體察女性聲音，但更重要的是在閱讀過程中，也逐漸形塑對於文學的認知，「工詩詞、善曲賦、通音學」這類的評價不僅是彰顯才女們對於詩詞格律有充分的掌握，更是顯示出男性文人的標準和品味，並同時建構女性文人應有的形象。¹⁸⁹

然而，在描述女性才華洋溢，並對作品作出品評之外，評論家們更不忘描述她們的性格。首篇閨秀故事是刊載在 83 期〈蕭嫺女書家小史〉，記述廣東 19 歲才女蕭嫺從小聰慧絕倫，13 歲時便已能書寫隸書、楷書、刻畫金石，之後還靠潤例題字資助家用。才能之外，還提到蕭嫺天性純篤，不僅孝順長輩，對同父異母弟妹的照顧也無微不至。¹⁹⁰呂君豪〈名媛詩話〉也提到徐秀芳嫁到李家不久後，丈夫即得重病，為求治癒丈夫，不惜割下自己手臂的肉作為藥引，但因丈夫已病入膏肓無法醫治。喪夫後徐秀芳鬱鬱寡歡，守寡 3 年病逝。¹⁹¹另外，〈錦心繡口錄〉也記載蜀中一名年輕寡婦，因不願父母再幫她另尋良人便賦詞：

昔年曾伴花前醉，今年空灑花前淚。花不再榮時，人無重見期。故人情意重，不忍榮新寵。日月有盈虧，妾心無改移。¹⁹²

除了賦詞，這名寡婦更以割去一耳作為要脅，展現守貞的決心，最後讓父母打消念頭。

諸如此類的文章，都先提到女子的文學創作技巧，但更重要的是，這些

¹⁸⁹ 曼素恩著，羅曉翔譯，《張門才女》（北京：北京大學，2015年），頁145-148。

¹⁹⁰ 陸傑夫，〈蕭嫺女書家小史〉，《婦女旬刊》，期83(1922年)，頁2-4。

¹⁹¹ 呂君豪，〈名媛詩話〉，《婦女旬刊彙編》，期1(1925年)，頁3。

¹⁹² 張嘯塵、葉國英，〈錦心繡口錄〉，《婦女旬刊彙編》，期1(1925年)，頁4。

作品得以遺留傳誦的女子不分出身高低、職業貴賤，品性皆是純良高尚。以引文所述的貞節觀為例，女主角不僅是才女，更是願意守貞、殉節的道德高尚女子。由此可見，男性文人在編寫閨秀詩話時，不僅呈現才女文化、文學評斷標準，更顯露出他們的道德價值觀。即便是女性作家陳蘭言在描述女性友人的〈羅魂木影室尚友錄〉也多用「性情幽嫻」、「秉性謙和」、「和藹可親」、「秉性溫和」作為形容詞。

閨秀詩話雖然提供讀者休閒娛樂，卻也塑造、強化女性的道德典範。然而這樣的婦德規範在五四運動過後，被許多鼓吹女子解放的運動者們唾棄，甚至連《婦女旬刊》的讀者都認為這些言論早已過時，不過就刊載的情況而論，這樣帶有守舊道德言論的文章仍具有市場價值，如同張麗娟主張，新文化運動時期雖然有諸多新思想誕生，但舊價值仍未消除，值此新舊文化交融時期，不能只刊登一家之言，而是應該在刊中呈現多元樣貌。

此外，如同朱天石〈婦女與文藝〉所提，「女子無才便是德」斷裂了婦女們的文藝創作，也剝奪了女性鑑賞文藝的權利，使得中國文學歷史中女性名字寥寥可數。¹⁹³所以即使文集選編過程帶有男性文人價值判斷，但才女文化的呈現使文學史增添不同風貌，讀者可以也從各種閨秀詩話中重新建構女性的形象。除了詩話外，小說也是《婦女旬刊》用以吸引讀者目光、達到寓教於樂的文類。編者曾多次強調不惜花費重金購買各種短篇、長篇小說，並邀請文學社團擔任小說專號編輯，一方面藉此充實版面，另一方面則是透過故事敘述達到《婦女旬刊》的啟蒙目的。

二、小說中的悲情女子

閨秀詩話與小說刊載高峰期集中在 1926 年以前，1926 年以後，閨秀詩

¹⁹³ 朱天石，〈婦女與文藝〉，《婦女旬刊彙編》，期1(1925年)，頁289。

話就不曾出現在《婦女旬刊》，此後小說便與論說文成為刊物中主要文體，直到 1935 年杭州中國民俗學會成為編輯群才中斷。1946 年，戰後《婦女旬刊》副刊後，雖偏重論說文，但小說又再次現身刊物中，並持續這樣的狀態直到 1948 年終刊。

在前一章論述刊物風格轉換時已提到《婦女旬刊》於 1920 年代時處在新舊文學共存時期，編輯群除中華婦女學社外，曾多次邀請知名文學作家、社團作為客座編輯，一方面以知名度吸引讀者，增加刊物銷售和市場價值，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透過文學社團的力量，由社員提供稿件增加《婦女旬刊》的篇幅，因此創刊之初，不僅向文藝社團秋聲編譯社、閩聲社購買稿件，1922 年張儷娟和何慨秋更利用先前建立的人脈，邀請文學社團蘭社編輯「秋季小說專號」、誥社編輯「冬季小說號」，此後還以蘭社社員馬鵲魂、張寒壺、綠社社員黃轉陶擔任編輯，並同時邀請上海青社、蘇州星社多位成員為《婦女旬刊》撰稿。1925、1926 年發行的兩期《婦女旬刊彙編》收錄大部份 1920 年創刊以來的各類稿件，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多達 80 篇。

這些為《婦女旬刊》提供稿件的文學社團和文人，多半被認定為鴛鴦蝴蝶派作家，甚至連編輯找人替刊物繪製封面的畫家也與鴛鴦蝴蝶派刊物《禮拜六》、《小說月報》、《紫羅蘭》等相同，如丁悚、丁訥、楊清磐、何漢光、胡亞光等人，這般不論表裡皆與「舊派」帶有密切關聯的《婦女旬刊》便遭到讀者懷疑是否與創刊宗旨背道而馳。但新舊文學的界線是否該以文章形式作為區分？還是應該先觀察文意呢？

沈雁冰認為民初中國的舊派小說主要有 3 種類型，分別是舊式章回體長篇小說、不分章回的舊式小說、只截取片斷故事但結構不完整的短篇小說。這些都是由文言文、白話文交雜寫作，內容僅是無意義的流水帳，或為宣揚

理念而帶有強烈主觀意識，忽略客觀分析的虛構故事。¹⁹⁴不幸的是，《婦女旬刊》中小說多半應證沈雁冰的批評，字句文白混用、故事鋪陳冗長，也是作者為傳達理念而寫的文章。然而即便如此，《婦女旬刊》刊登的小說真是如此不堪？進而喪失閱讀價值嗎？

《婦女旬刊》中的作品無論是在哪一個時期，大多是悲情故事。女主角的身世背景守貞寡婦、苦命媳婦、女學生、職業女性與家庭身分的衝突。高秋堃的〈殉〉故事講述一名未及 24 歲即守寡的少婦，在丈夫過世後本欲自殺殉節，但在小姑責備和勸說之下，含辛茹苦地將幼兒拉拔至 17 歲並娶妻生子。最後寡婦認為已完成丈夫遺言囑託，便絕筆囑咐兒子代為孝順公婆，自己服藥自殺。¹⁹⁵金明霞〈小病〉則是以女性身分控訴「女大當嫁」的傳統和父母之命的婚姻。¹⁹⁶

何樸齋〈社會的罪惡〉敘述一名家境優渥的馬敏如接到前妻沈秀貞訣別信。沈秀貞因經濟困頓且有父母要養，被迫赴環境不良的紗廠工作，但才半個月就遭馬敏如質疑「做女工沒有一個清白的」，並提出離婚。沈秀貞雖在離婚前守身如玉，但後來終究難逃工廠男性職員的魔爪而喪失貞節，名譽敗壞之下只得自殺以明心跡。因此來信說道自己不怪前夫，而是被社會逼迫而死，希望社會能改造，不再有蹂躪女界之事。¹⁹⁷作者僅利用短短的篇幅便讓讀者感受到社會對職業女性的懷疑和不解，以及職場女性面臨的性威脅、性暴力，還有貞操觀對於女性的束縛。

王天恨的〈離婚〉描述陳志明和王畹芳兩人因自由戀愛而相識，甚至在未經過父母同意之下便先行結婚。最後男方母親認為娶受過教育的女子會薄

¹⁹⁴ 沈雁冰，〈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小說月報》，第13卷第7期(1922年)，頁1-12。

¹⁹⁵ 高秋堃，〈殉〉，《婦女旬刊彙編》，期2(1926年)，頁73-76。

¹⁹⁶ 金明霞女士，〈小病〉，《婦女旬刊彙編》，期1(1925年)，頁107-108。

¹⁹⁷ 何樸齋，〈社會的罪惡〉，《婦女旬刊彙編》，期1(1925年)，頁110。

福，因而要求兩人離婚。王畹芳不願造成丈夫和婆婆母子失和，成為不赦的罪人，便與陳志明說「不如犧牲了我一生幸福和名譽，實行離異。」志明雖不願但為了孝順也只能接受，所以這場自由戀愛婚姻僅維持一個月便以離婚收場。¹⁹⁸

王畹芳於故事中亮相便「手持一張報紙，低著頭而讀著。」接著男主角蘇州金華學校教師陳志明進場後，兩人四目交接、皆表現得落落大方、毫不閃避，接著畹芳又繼續讀報。志明認為此種面對陌生男子仍能神情若定，不害羞也不驕傲，且裝束入時但又不俗艷的女子非常少見。打聽後才知王畹芳是高等小學畢業，因家境不允無法升學，但仍在家勤奮自學。對於畹芳的哥哥認為她性情活潑直率，志明說道「現在的女子都要活潑直率些，如果過於莊靜陰險就違反現代解放種種等潮流了。」兩人在接觸頻繁，互相欣賞對方品性、學識後決議結婚，但最後因家人不許而被迫分離。

相較於前兩篇，王天恨為鋪陳兩人性格和相愛、結婚、離婚過程，使得此文看似淪為沈雁冰所說的流水帳，且結局仍是以鴛鴦蝴蝶派那種苦情、悲情的發展做為結局。然而，讀者在這冗長的閱讀過程中，不僅見到了不同於以往靜待閨房的嬌羞女子，還讀到敢於公開社交、受過教育的新女性，女性形象由此建構。此外，她不卑不亢的出場，最後卻委曲求全的離去，不僅使讀者為畹芳惋惜，也感嘆志明母親的保守顯預毀了才子佳人之情，因此有可能察覺傳統價值觀應被更改，達到啟蒙作用。

一部優質的小說不僅可以為讀者帶來閱讀樂趣，更要能反映時代樣貌。《婦女旬刊》中的小說雖然在形式和內容上皆遭新文學家批判，但就《婦女旬刊》銷售、發行的實際情況而言，該刊仍有一定的銷售市場。張儷娟辦刊目

¹⁹⁸ 王天恨，〈離婚〉，《婦女旬刊彙編》，期1(1925年)，頁112-115。

的之一就是要維持刊物運行，並利用各種文體達到啟蒙教化效果。以內容而論，雖然並非全部圍繞在女性議題，但至少其他主題，例如戰爭、貧窮，以及兒童、童工等也能反映時局，而遭新文家批判的黑幕、偵探、艷情小說則占非常低的比例。所以即使這類文學作品在當時為新文學家唾棄，可是閱讀《婦女旬刊》中的小說確實可教化、傳遞思想給讀者。除了閩秀詩詞、小說以外，《婦女旬刊》用來傳播文化思想的就是論說文。

第二節 女性的社會角色

一、高尚人格的養成

藉由閱讀《婦女旬刊》中關於女性品格或行為舉止的論說文章，可以很明顯觀察論者寫作模式。首先，作者會針砭女子的道德價值觀和日常生活，再提出自己的見解，要求女子改進，如此才能養成高尚人格，還有，先求個人進步後，才能使整體女性達到解放，否則只是口號上追求性別平等、婦女解放，實際上只是空談，或造成社會亂象。而最容易遭致批判的就是受新式教育，反對舊思想、舊道德，崇尚西方文化的女學生。

靈芬女士有一日問鄰居怎麼不把女兒送去上學，鄰居回應：「妳哪裡曉得啊！讀書的害處比甚麼還厲害呢，沾了那個害處簡直可以說沒有救藥了！」接著開始繼續抱怨其他親戚的女兒去學校讀書後，性格大變，且對服裝越來越講究，甚至連簡單的寫字、打算盤都錯誤百出，因此決議不將女兒送至學校，避免沾染惡習。靈芬女士聽完敘述後，認為女子教育問題在於女學生不曉得自重。每天敷衍功課外，便是追求裝飾打扮，週末不是到遊藝場便是打麻將、玩撲克，「現在的女學生，虛偽浮華四個字就是她們的批評，這樣的沒

有人格，人家怎麼會不輕視呢？」¹⁹⁹

有的作者則指出女子受教育只是為了提高身價，之後容易找個官員或富翁當丈夫，而不是真的為了學習知識為社會貢獻；²⁰⁰甚至還為此寫下一連串彷彿親身經歷的女學生故事，藉由女校日常住宿生活評論女子天性膽小、又愛八卦嚼舌偷看同學信件。平日不認真學習，不僅早上賴床，即便遲到卻仍花時間在梳妝打扮，到教室後居然是看小說而非聽課，直到考試前才臨時抱佛腳。原先計畫「開夜車」卻因毅力不足而放棄，隔日考試只得依靠同學「派思」(pass)答案，用作弊通過考試。²⁰¹

相較於這些不上進的女學生，有作者肯定交通大學的女大學生們，指出這群女學生不僅穿著樸素，行事穩重，又因學校社團的成員以男子居多，女學生多半不參與，避免衍生閒話八卦。作者認為這些具備高尚品德的女學生，定能學到良好知識，日後便能輔助丈夫和教育子女，是賢妻良母的典範。²⁰²

然而，上述這些行為或是性格，是否專屬於女學生？難道男學生皆毫無缺點嗎？對於這種批判女性多於誇讚的情況，學者曾以《婦女雜誌》為例，認為評論只著眼於女性缺點，而忽略男性的原因，除了可能是因為《婦女雜

¹⁹⁹ 靈芬女士，〈女子教育問題〉，《婦女旬刊彙編》，期1(1925年)，頁56-57。

²⁰⁰ 陳志熊，〈女子教育是提高婚嫁的〉，《婦女旬刊》，卷17期14(1933年)，頁4。

²⁰¹ 小柏，〈女學生生活素描之一：合鋪〉，《婦女旬刊》，631期(1935年)，頁24-25、蓮吟，〈女學生生活素描之一：信的檢查〉，《婦女旬刊》，633期(1935年)，頁34-35、蓮吟，〈女學生生活素描之三：開夜車〉，《婦女旬刊》，634期(1935年)，頁45-47、小柏，〈女學生生活素描之四：派司〉，《婦女旬刊》，635期(1935年)，頁56-58、蓮吟，〈女學生生活素描之五：上課〉，《婦女旬刊》，636期(1935年)，頁68-70。

²⁰² 紫金，〈交通大學女生生活〉，《婦女旬刊》，631期(1935年)，頁15。

誌》正是一本專門討論婦女的刊物之外，更是反映了男性將女性作為「他者」觀看。男性在論述之中成為比較的基準點，也是作為「完人」的存在，相較之下，女性則是被用來比較和期望被「糾正」的對象。²⁰³同樣地，《婦女旬刊》的作者們提到，一旦女性修正行為、遵守評論指示，則女性便可提升人格，進而走向解放。

以批判女學生使用洋貨化妝品為例，楊鄂聯在上海務本女學演講時提到，抵制洋貨需由女子教育做起。論者認為女性主持家政，家庭花費皆由女性主導，所以女子如果愛用國貨，一家日常用品則都會是國貨。因此女校應教導女學生操持家政不僅是家事更是國家社會事業。此外，女子尚須學習經濟、財務常識，避免因缺乏計算虧盈的能力，對家庭進而對社會經濟造成不良影響。²⁰⁴1929年，為響應國貨運動，《婦女旬刊》發行「國貨專刊」，裡頭文章更將洋貨與國家利權喪失的矛頭指向都市女性。女子曼蘭認為這些時髦女子身上的脂粉香水鮮為國貨，打扮更是為悅己者容，口中雖高喊解放、平等，卻又甘心作為男子玩物，實在是女界的羞恥。²⁰⁵為了拯救國家，柳纖分別提出了農人、商人、工人和學生提倡國貨的辦法，而「婦女」則是在這些職業類別外獨立討論，明顯成為各行各業以外的「他者」。²⁰⁶

婦女解放運動與國族主義話語的糾纏自清末以來即存在，男性對此的態度是提高婦女地位，使其能與男人們一同為國家服務，國貨運動的目標正是使所有中國人，不分男女的消費行為都能民族主義化。²⁰⁷然而由上述引文可見，對於女性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仍是以家庭主婦和賢妻良母為主，認為女

²⁰³ 江勇振，〈男人是「人」、女人只是「他者」：《婦女旬刊》的性別論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12(2004年12月)，頁48。

²⁰⁴ 楊鄂聯，〈女子教育與國貨前途〉，《婦女旬刊》，期291-293(1928年)，頁1-2。

²⁰⁵ 曼蘭，〈關於國貨的運動(四)〉，《婦女旬刊》，國貨運動專號(1929年)，頁11-12。

²⁰⁶ 柳纖，〈關於國貨的運動(七)〉，《婦女旬刊》，國貨運動專號(1929年)，頁35-38。

²⁰⁷ Karl Gerth著，黃振萍譯，《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頁291-293。

性掌握家中消費行為，以及教育子女的責任。一方面要求女子們支持國貨，更要求母親們也能灌輸下一代國民，使之從小就有國族意識，與成人一同改變國家現狀。

在這些討論中，被批判和要求改進的多屬於城市中的女子，她們不僅遭到男性指責崇尚洋貨，與奢侈、浪費等負面符號結合，更因為穿著和社交行為等因素被「娼妓化」。不過除了這些批評外，婦女解放也被認為僅是上層階級女性的自我意識實現，而非為整體女性著想。

1928年，《婦女旬刊》編者指出，

我的意見以為一個解放的婦女，必須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人而不是奴隸。……現在有甚麼東西在束縛著我們，第一是現代不平等的社會制度，第二是傳統的禮教。因此，我們要謀自身的解放，必須根本剷除現在的經濟制度和舊思想，纔能既不受男性的壓迫，也不受資本主義的壓迫，可是以這樣的目的來得解放，這問題便不僅是在女性一方面，應當聯絡一切的被壓迫階級，不分性別地向統治階級進攻。這決是放棄了婦女解放而轉到別一方面，我相信婦女真正的解放不能在現代經濟制度之下完成，牠的完成，一定同全人類的解放同時。²⁰⁸

在編者主導下，階級議題也開始出現於刊物之中。論者們認為女子教育或參政權爭取等行動只是有利於上層階級女性，但底層勞動婦女面臨更迫切的困境是經濟問題。上層階級女子得以考慮性別平等、社交公開、女子教育等問題是因為她們即便不工作仍有遺產可以繼承，經濟獨立與否對於她們並非生存問題，然而底層階級不論男女，生存條件已嚴重不足，何來談解放？當所有男女都能不再為生活所困，擁有平等的生存權、勞動權，任何人皆不

²⁰⁸ 編者，〈致讀者〉，《婦女旬刊》，期279-281(1928年)，頁1-4。

去支配他人，或被人支配，階級界線不存在之時，女子才能夠真正的解放。²⁰⁹雖然編者和論者為了呼籲讀者們關注農村和勞動婦女們面臨的現實問題，以突破階級界線作為切入。然而，都市中要求平等的女子們是否真如編者和論者所說，並無經濟壓迫問題？

二、職業婦女與婦女回家

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說》中提到，社會分利者可分為「不勞力而分利者」、「勞力而仍分利者」。不勞力而分利者包括乞丐、盜竊、棍騙、僧道、紈褲子弟、浪子、兵勇、大半官吏、土豪鄉紳、廢疾、罪人以及大半婦女。雖然梁啟超提到養育兒女、主持家計雖也是分擔社會責任，但有6、7成女性「不讀書、不識字、不知會計之方、不識教子之法。蓮步妖嬈，不能操作」，屬於社會分利者，導致中國貧弱。²¹⁰在此理論下，女性被視為應該要和男性一般為社會貢獻心力。

《婦女旬刊》首次出現「經濟獨立」是1923年第94期〈我之今日婦女觀〉，作者認為女子解放第一要務是具有「知識慾」，如此才能達到教育普及，有了學識才能擁有職業技能、從事工作，實行經濟獨立，不再是男子的附屬品，這樣男女自然可以平權。²¹¹此後刊物中仍陸續出現相關議題文章，除了強化「知識、教育、技能、工作、經濟獨立」彼此環環相扣的理論，也有依照女性性格而給予職業建議的討論。

例如菊如女士認為農業為民生之本，包括糧食耕作、田藝、園藝、蠶桑、畜牧等。雖然有些論者表示農業多粗重工作不適合女性，但菊如指出上古時

²⁰⁹ 曉霞，〈婦女解放與參政權與勞動婦女〉，《婦女旬刊》，期279-281(1928年)，頁4-8、幹丞，〈我為中國婦女界進一葛葛〉，《婦女旬刊》，期282-284(1928年)，頁1-2。

²¹⁰ 梁啟超，《新民說》(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87。

²¹¹ 方潔，〈我之今日婦女觀〉，《婦女旬刊》，期94(1923年)，頁1。

期男性忙於戰爭、漁獵時，耕作便由女性負責，此外，女子個性較男子勤勞、謹慎，更能勝任養蠶織布、養殖家畜、種植蔬果，或栽植花草等工作。壽介藩則主張女子應該學醫。因為女子心靜氣柔，非男子可以企及，在學習過程或是日後執業有開刀解剖時，能比男子更細心謹慎。除此之外，女子擔任婦產科醫師，可以淘汰舊式產婆，降低產婦死亡率，還可使女病患敢於將私密部位和相關疾病告知醫生，避免先前因男醫師、女病患之間的性別隔閡導致無法仔細診治、對症下藥。其次，女子專心謹慎、體貼入微的個性，以及生兒育女天性的，比較能醫治不擅於表達身體狀態的兒童，對於一般病人也更能細心耐心照料，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能照顧家人。最後就是人種之改良。根據當時科學研究指出，古時中國的身高比例比現今高 20%，減少的比例是因為女子在社會中未能提出貢獻，僅安逸地待在家庭之內，束縛思想，導致身體萎縮。女子學醫除可服務社會、為社會生利，還可以使國民體格強壯、精神更活潑、智力更豐富。²¹²

隨著職業婦女成為報刊討論的熱門議題後，婦女走出家門，進入職場對社會造成的影響，也使得部分論述開始評判與回顧五四以來婦女運動的種種。學者已指出，由於婦女解放者將婦女就業視為獲得經濟獨立的重要途徑，也是建立兩性平權的基礎，使得婦女就業一直是婦女問題的焦點。職業婦女展現婦女走出家庭，從事職業，不再只是家庭成員，而是社會成員。然而在傳統價值觀影響下，婦女從事工作必然會面臨工作與家事、職場與家庭的衝突。²¹³因此，關於婦女究竟要回家，還是走出家庭當「娜拉」，成為媒體爭相

²¹² 菊如女士，〈婦女與農業〉，《婦女旬刊》，期199(1926年)，頁1、壽介藩，〈婦女之業醫談〉，《婦女旬刊》，期224(1926年)，頁6-7。

²¹³ 呂芳上，《民國史論》上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509。

論辯的議題。²¹⁴

1933年9月13日，上海《時事新報》以〈婚嫁與女子職業〉為題，講述林語堂於上海中西女塾的演講中提到職場對於男女仍是不平等，因此女學生畢業後最好的職業就是結婚、回到家裡相夫教子，擔任賢妻良母。此等言論拉開了第一次「婦女回家」論戰的序幕。²¹⁵此後許多報刊開始討論婦女究竟要出門工作，還是回家擔任賢妻良母。1935年，南京《婦女共鳴》發行「賢良專號」，討論女子是否應該成為「賢妻良母」。《婦女共鳴》編者李峙山提到：

提倡賢妻良母與否認賢妻良母的人，成了兩大壁壘，提倡的仍在提倡，否認的仍舊否認，似乎各不相關。然而我們認為妻與母受了數千年的賢良訓練，已成了凡妻皆賢，無母不良的現象了。……提倡賢妻良母的先們，不必再白耗精力來提倡，為夫為父的是太不賢良了，應該集全力來訓練才是。反對提倡賢妻良母的人，也不必因夫與父的不賢良而否認妻與母的賢良。我們應該從提倡賢夫良父來解決目前的問題以治標，他方面自然更要努力實現合理的社會期望達我們最終目的以治本。……這就是本刊出此專號的本意。²¹⁶

《婦女共鳴》賢良專號中的論述可分為兩種主張，一是「賢妻良母」必須

²¹⁴ 「娜拉」(Nora)是挪威劇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的代表作《傀儡家庭》中女主角。娜拉勇於反抗傳統，最後離開家庭，展現個人自由價值的劇情在傳到中國後，被知識份子翻譯成中文刊登於報刊、演出於舞台之上。對中國婦女而言，娜拉的作為象徵對自我的覺悟和解放，也是對傳統社會的反抗。相關研究見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2003年、呂芳上，〈娜拉出走以後—五四到北伐青年婦女的活動〉，收入於《民國史論》上冊，頁292-331。

²¹⁵ 臧健，〈「婦女回家」：一個關於中國婦女解放的話題〉，游鑑明、羅梅君、史明主編，《共合時代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2007年)，頁368-369。

²¹⁶ 編者，〈我們為什麼出這個專號〉，《婦女共鳴》，卷4期11(1935年)，頁6。

建立在「賢夫良父」的平等關係之上，稱為「新賢良主義」；²¹⁷另外一派則是如集熙所述，認為夫妻關係的絕對平等只有在原始的公經濟社會裡面才會發生，婦女能否跳出賢妻良母的牢籠是建立在社會經濟組織的變革與否之中，如果以提倡「賢夫良父」來應對「賢妻良母」，主觀上看來似乎合理，「可是在客觀經濟條見存在的現社會裡，夫妻對於家庭責任的平等發展，究竟是現實，還是幻想？」²¹⁸無論是哪一主張，其實皆是建立在「家庭分工」之上。女性究竟是否可以離開家庭，成為職業女性，或是應該待在家中操持家事，照顧家人呢？面對這些爭論，《婦女旬刊》主編決議開闢專欄，正式「參與論戰」。

1934年12月底，《婦女旬刊》編輯們便開始向各地知名人士徵稿，並於1935年1月1日第631期以「中國婦女應上哪兒跑，離開家庭，去找職業；丟掉職業，回到家庭？」作為標題，投入「婦女回家」論戰，聲明「徵得大眾的高見，決定我們此後言論應走的方向。」此專欄更持續刊登了7期，共計44篇文章，內容大致可分為五種立場。²¹⁹

第一種，主張婦女回家，以郁達夫、陳立夫、車久享等人為例：郁達夫認為家庭與職業應兼顧，若情況不得以，則獨身成年女性應離開家庭從事工作，但已婚婦女應先顧到家庭，再談職業。若不顧家庭而出去工作，將致使男人不得不受育兒治家之累；陳立夫主張中國婦女應為民族的光明前途努

²¹⁷ 蜀龍，〈賢良問題的探討第一輯：新賢良主義的基本概念〉，《婦女共鳴》，卷4期11(1935年)，頁9-14、李峙山，〈賢良問題的探討第一輯：賢夫賢妻的必要條件〉，《婦女共鳴》，卷4期11(1935年)，頁15-19。

²¹⁸ 集熙，〈賢良問題的探討第二輯：「賢妻良母」的認識〉，《婦女共鳴》，卷4期11(1935年)，頁44-46。

²¹⁹ 相關討論可見1935年《婦女旬刊》第631至637期。

力，有小孩的就在家擔任賢妻良母，無小孩的在家庭工作有餘暇時可從事其他職業；車久享認為有小孩後仍可找職業，但不應該離開家庭。近代整個民族的墮落，做母親的難逃責任。²²⁰由此可見，這一派人士認為婦女對家庭教育有重要影響力，若母親因為生計或奢侈私欲拋下子女，將致使孩子無人照顧，而缺乏母愛的孩子容易作出偏差行為，日後將會危害社會。此外，丈夫也會因家中不和睦，導致工作無法專心。因此若有小孩以後，女子應待在家中相夫教子，為國家、民族、社會謀取更大的利益。

第二種，主張應視情況而定，如羅家倫、易君左、沈茲九、徐悲鴻。四人皆認為這個問題無法給予完全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因為每個家庭面臨的經濟問題不同，每位女性的個性也天差地遠，有的恬靜適合在家，有的則有特殊專長，不應守在家中而應貢獻社會。²²¹

第三種：支持婦女不應回家，應繼續於社會中爭取權益，並為國家謀福利，如黃心勉、郭威白。黃心勉認為中國婦女應完全投入生產事業，將中國從貧困中拯救出來。但若真的非得待在家中，也須投入家中可以從事的生產事業。郭威白則認為若婦女丟掉職業回到家庭，則枉費過往婦女職業訓練的成本，也剝奪女子受職業教育的機會。²²²

第四種：主張問題不在於回家或是踏入職場，而是提出對社會福利制度

²²⁰ 郁達夫，〈中國婦女應上哪兒跑？(一)〉，《婦女旬刊》，631期(1935年)，頁2、陳立夫，〈中國婦女應上哪兒跑？(十二)〉，《婦女旬刊》，632期(1935年)，頁2、車久享，〈中國婦女應上哪兒跑？(十九)〉，《婦女旬刊》，633期(1935年)，頁3。

²²¹ 羅家倫，〈中國婦女應上哪兒跑？(一)〉，《婦女旬刊》，631期(1935年)，頁4、易君左，〈中國婦女應上哪兒跑？(八)〉，《婦女旬刊》，631期(1935年)，頁4、沈茲九，〈中國婦女應上哪兒跑？(二十四)〉，《婦女旬刊》，633期(1935年)，頁4、徐悲鴻，〈中國婦女應上哪兒跑？(四十二)〉，《婦女旬刊》，637期(1935年)，頁2。

²²² 黃心勉，〈中國婦女應上哪兒跑？(三十五)〉，《婦女旬刊》，637期(1935年)，頁4、郭威白，〈中國婦女應上哪兒跑？(三十六)〉，《婦女旬刊》，637期(1935年)，頁4

的不滿，如陶思瑾、俞子夷。陶思瑾認為應設立貧民嬰孩借養所，兒童公育制度才能讓需要工作的女子仍有辦法照顧孩子，不至於使孩子疏於照顧，又不會讓家計無法維持；俞子夷認為家庭應進化，使日後賢妻良母的燒飯、育嬰、看護等工作能有專職負責，讓女性不被將家庭拖累。²²³

這些支持婦女回家的論述引起部分讀者的不滿，甚至發生了「隔空叫罵」的情況。針對郁達夫所言，讀者於《申報》副刊「婦女園地」中指責郁達夫的思想和言語是封建遺孽，郁達夫因此在《婦女旬刊》上反擊，申明自己的主張是婦女要兼顧家庭和職業，而不是絕對不可從事職業，認為讀者誤讀；²²⁴白芸則是在上海《女青年月刊》中指責《婦女旬刊》猶如「一個又老又舊的封建老太婆」，雖號稱徵求知名之士的意見，卻盡是些主張壓迫婦女，反對婦女離開家庭去找職業，或丟掉現有職業回到家庭的迂腐言論。²²⁵不論是上述何種立場，討論的方向仍集中於都市女子的情況，孫伏園因此提出第五種說法。

孫伏園認為「中國婦女應上哪兒跑，離開家庭，去找職業；丟掉職業，回到家庭？」的問法，只將議題設定討論城市裡知識女子的職業與家庭，而非農村婦女或都市裡的貧苦婦女。因為對底層女性而言，家庭與農事，或是家庭代工是結合在一起的。農婦從事耕作時，子女便帶在身邊，無所謂離開家庭從事工作，或放棄工作回到家庭。²²⁶學者也曾指出，1930年代「婦女回家」論戰企圖塑造的新女性形象，並未顧及廣大農工階級婦女的現實生存問

²²³ 陶思瑾，〈中國婦女應上哪兒跑？(十五)〉，《婦女旬刊》，632期(1935年)，頁3-4、

俞子夷，〈中國婦女應上哪兒跑？(十七)〉，《婦女旬刊》，632期(1935年)，頁4、

²²⁴ 郁達夫，〈答申報婦女園地沁一先生〉，《婦女旬刊》，633期(1935年)，頁33、

²²⁵ 白芸，〈評《婦女旬刊》復興號〉，《女青年月刊》，卷14期2(1935)，15-20頁。

²²⁶ 孫伏園，〈中國婦女應上哪兒跑？(十八)〉，《婦女旬刊》，633期(1935年)，頁1-2。

題。²²⁷

藉由《婦女旬刊》的討論可知，自五四運動以來，10餘年的婦女議題討論並無絕對的立場，隨著不同社會現實狀況，始終保有討論空間。由上述5種分類可知，《婦女旬刊》再一次地展現中立立場，不偏頗於任何一方，將各種論述全部刊出，供讀者自己進行價值判斷。但不論立場如何，論述皆以「漢人」女性為對象，然而中國並非由單一民族組成。不同族群、區域皆會因地制宜衍生出不同的經濟、生活、人際互動、性別相處模式。《婦女旬刊》參與「婦女回家」論戰時，恰逢編輯群更動，編輯大權掌握在杭州中國民俗學會手中，使得刊物裡開始系統性地出現各地區的女性身影，其中也不乏非漢族女性，不僅讓讀者開眼界，也使他們對於女性有了不同的認識。

三、她山之石

1921年，《婦女雜誌》上刊登胡愈之〈論民間文學〉一文，開啟婦女期刊討論民俗學研究的先河，除《婦女雜誌》外，日後成立的《女子月刊》、《婦女月刊》、《婦女共鳴》中也都有關於非漢族女性的文章，學者也曾在討論民國時期漢人對西藏的認識時，藉由這些刊物或地方志記載，連帶討論漢人如何藉助文本對藏族女性產生想像。²²⁸然而上述婦女刊物對於異族女性的介紹寥寥無幾，未成系統。

1925年，浙江人黃造雄將他在滿州所見所聞寫成〈滿州婦女的狀況〉刊登於《婦女旬刊》。他開宗明義表示，希望滿州婦女生活方式可以作為漢族婦女的他山之石。黃造雄首先以滿州婦女不纏足為開頭，接著講述服裝、職業，

²²⁷ 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頁328。

²²⁸ 見簡金生，〈民國時期漢人對西藏婦女的情色化想像〉，《新史學》，卷25期3(2014年9月)，頁103-142、簡金生，〈藏人論藏：民國時期藏人的西藏觀〉，《臺灣師大歷史學報》，期50(2013年12月)，頁97-154。

以及滿州第一女子師範學校的觀察。一位同樣來自浙江的師範老師表示：

滿州女學生，不但她們衣服飲食，比較我們關內漢族女學生來得節儉樸實，就是學業品行亦是比較我們關內漢族女生來得勤勉誠實。

然而作者也提到在滿州報紙上鮮少見到女學生論著，即便見到也無討論「社交公開」、「男女平權」、「婚姻自由」等關內女學生的熱門議題。

這套情形，表面上把它論起來，固然要算是一種不開化的女學生，是一種十八世紀裡的女學生；但是依良心上，把她們實在方面論起來，實在是她們女學生一種安心向學，和規規矩矩的表徵。²²⁹

這是《婦女旬刊》中首次將漢人女性與異族女性作為比較，希望女子能從中得知雙方優劣之處，以收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的效果，然而真正大量刊載非漢族女性的民俗學文章要到杭州中國民俗學會介入《婦女旬刊》編輯事務以後。

杭州中國民俗學會由鍾敬文、婁子匡等人成立，繼承北京大學歌謠社、廣州中山大學民俗學研究傳統，廣蒐中國和世界各地民俗故事、童話歌謠，1935年與《婦女旬刊》開啟合作關係，使得《婦女旬刊》在1935年和1936年時成為既討論婦女議題，又帶有民俗學研究的刊物，此後還發行兒童故事、婦女生活經驗、兒童歌謠、婦女戀歌等主題的專號刊物，此舉除了讓讀者接觸民俗學研究，更藉由刊物中的異族女性照片、插圖，讓讀者對於女性有了更不一樣的認知。

許家存〈婦女在暹羅〉一文，講述暹羅女子的婚姻很自由，青年男女可隨意和田間、家裡縱情談歡，家人見狀也不介意，「只要女子同意，貞節的事情，就不很講究。」結婚以後也可離婚，離婚之後，女子可以再嫁。若是女

²²⁹ 黃造雄，〈滿州婦女的狀況〉，《婦女旬刊彙編》，期1(1925年)，頁8-10。

子提出離婚，「若有了子女，男的歸男，女的歸女，夫家還要負擔贍養費，或家產平分。」另外，論者認為暹羅女子還有一個優點：

她們各有一種獨立的精神，無論結婚與不結婚，她們都能忍受勞苦，在烈日之下努力的作工，以求經濟獨立。不像一般的女郎，自甘懦弱，不肯做事，只低首下心的去做丈夫的玩物。²³⁰

除了論說文外，中國民俗學會也透過大量歌謠、故事豐富讀者對女性形象的認識。學會成員錢小柏認為民間文學是永遠不朽的藝術，而歌謠是民間文學的骨幹，戀歌又是其中的精華，所以蒐集全國 23 省份的戀歌，集結成《中國民間戀歌集》，約 1600 首左右。《婦女旬刊》此時的編輯婁子匡認為戀歌是男女戀愛生活的真切描寫，婦女在戀歌中的處於主角的地位，展現女性對於情愛的想像和期待，因此便從《中國民間戀歌集》隨機挑選 96 首戀歌，作為「婦女戀歌專號」。²³¹相較於先前《婦女旬刊》的文章，婦女戀歌的直白歌詞確實會令讀者有不同觀感，也能更直接明白女性想法。以蒙古戀歌〈若然你要嚐女人吻上的蜜〉為例：

少年人，若然你要吃刀邊上的蜜，你就要割壞你的嘴了。若然你要嚐女人吻上的蜜，你就只該用嘴唇去嚐牠；要不然，少年人呀！你就要咬壞了自己的心了。²³²

²³⁰ 許家存，〈婦女在暹羅〉，《婦女旬刊》，期648(1935年)，頁216。

²³¹ 《中國民間戀歌集》尚缺吉林、遼寧、熱河、察哈爾、新疆、青海、寧夏等省。〈婦女戀歌專號〉刊載的省份有山東、山西、廣東、廣西、雲南、四川、甘肅、安徽、江西、西康、西藏、河北、河南、浙江、湖北、湖南、黑龍江、福建、蒙古、綏遠、貴州等地。錢小柏，〈婦女戀歌專號前言〉，《婦女旬刊》，期647(1935年)，頁1、婁子匡，〈關於戀歌：序錢小柏編中國戀歌集〉，《婦女旬刊》，期647(1935年)，頁2。

²³² 〈蒙古戀歌：若然你要嚐女人吻上的蜜〉，《婦女旬刊》，期647(1935)，頁12。

或者更露骨者，如江西戀歌〈兩只乳子起尖峰〉：

十八妹子嫩鬆鬆，兩隻乳子起尖峰。

那個情哥戀得到，勝過豬肉炒蒜芎。²³³

除了言語煽情的歌曲外，也有一些帶有地方風俗民情的歌曲，如西藏戀歌〈你厭世而學佛嗎〉：

我心愛的人兒呀！你厭世而學佛嗎？

青春年富的我，可否同去參禪？

也有反應時代潮流的戀歌，如綏遠〈你看妹妹好不好〉：

妹妹腰細腳又小，大年下的餃子比不了；

穿上紅鞋戴上孝，你看妹妹好不好？

剪髮放足真風流，快引上妹妹回包頭。²³⁴

諸如此類的歌曲不僅刺激讀者的感觀，更豐富化對各地女性的想像，此外，藉由這些民間歌謠可以破除過去對女性的日常生活想像，歌詞中男女邂逅於溪邊、涼亭、街道等反映出一般民間女性生活圈不被局限於家中，「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說法只能用於部分大家閨秀，而非全體女性之上。五四以來對於婦女生活的描述總是充滿悲苦、壓迫，如同《婦女旬刊》過去的小說、論說文所述，然而最貼近一般大眾的民間文學確呈現不同樣貌。她們透過歌曲表達對男性的愛意，又比過去女性文人寫作的詩詞更能展現女性對於情感的追求。女性不只是被動於接受父母之命，又或者在情感生活中總是處

²³³ 〈江西戀歌：兩只乳子起尖峰〉，《婦女旬刊》，期647(1935)，頁6。

²³⁴ 〈綏遠戀歌：你看妹妹好不好〉，《婦女旬刊》，期647(1935)，頁9。

於男子附屬品。福建戀歌〈思想進屋看妹妹〉便顯示出女子的舉手投足牽動著男性魂魄，一日不見心愛女子便感到焦慮，展現實際生活中的女性在兩性互動上仍能扮演主導角色。²³⁵

除了這些情慾的展現外，《婦女旬刊》為使女子能掌握持家、育兒技巧，因此徵文婦女生活經驗談 8 篇、各地兒歌、故事，編輯成〈兒童故事專號〉、〈兒童歌謠專號〉、〈婦女生活經驗專號〉。²³⁶編輯雖然未明確表示此舉是否已將婦女與「賢妻良母」畫上等號，但就發行動機而言，不免讓人懷疑這是否是響應「婦女回家」的論述。

第三節 女性的居家責任與功能

一、既是良母亦是國民之母

《婦女旬刊》中雖有許多關於職業婦女的討論，但如同前述「婦女回家」論戰所述，許多支持婦女走出家門從事工作的前提是成年未婚的女性。至於結婚，以及有了小孩以後，多數論者認為，女性應回到家中主持家務，而這樣的「婦女回家」論述中又衍生出兩種說法。第一種，以社會分工為出發：論者指出女性回家擔任家庭主婦並非脫離社會，因為家庭是社會組成的基本單位，女性若能維持家庭穩定，則可讓丈夫免於擔憂家務，專心工作，子女也可擁有良好成長環境，日後才不會誤入歧途。²³⁷第二種，以個性和天職為論點：這類說法認為女子恬靜嫻淑、細膩耐心的天性適合待在家中照顧丈夫，

²³⁵ 〈福建戀歌：思想進屋看妹妹〉，《婦女旬刊》，期647(1935)，頁11。

²³⁶ 編者，〈兒童歌謠專號前言〉，《婦女旬刊》，期646(1935年)，頁185。

²³⁷ 金光楣，〈中國婦女應上哪兒跑？(二十二)〉，《婦女旬刊》，633期(1935年)，頁3-4。

處理瑣碎的家事，此外，女性無法取代的功能就是生育，此為女性天職，所以衍生出來的「母性」使得女子是在家中育兒教子的最佳人選。²³⁸

無論是上述何種說法，對於大部分婦女解放、經濟獨立的支持者而言皆難以接受。尤其在 1935 年參與「婦女回家」論戰後，女性當為賢妻良母的論述較以往增加許多。雖然《婦女旬刊》編輯群無論是在哪一個時期都未曾明說女性應從事職業或擔任家庭主婦，只說創刊目的是為啟蒙女性，並提供論述空間給各方，但若從〈兒童故事專號〉、〈兒童歌謠專號〉、〈婦女生活經驗專號〉等前言來看，編者似乎也偏向將育兒責任和主持家務交與婦女。

1935 年 5 月，《婦女旬刊》為響應全國兒童年出版〈兒童故事專號〉。編者指出，婦女和兒童的關係密不可分，談到婦女問題必須連帶討論兒童的教養和一切家庭問題，「婦女是兒童的教養者，兒童是婦女的慰安人」。所以自《婦女旬刊》第 638 期起，決意在兒童年和兒童節前後改變編制，除了談論婦女相關議題外，今後更要增加兒童專欄。編者期望：

我們更想把這一個渺小的刊物，打破編行者的私有領域，而要使它變成是讀者共有的。我們也不願使它只是智識婦女的書刊，而要使它進而為大眾婦女與兒童的讀物。²³⁹

除了兒童故事，第 646 期也出版〈兒童歌謠專號〉。第一個出版原因是編者希望藉由小朋友們閱讀完畢後，也能將知道的童謠寄給編輯，使編輯得以蒐集更民間文學。第二個原因就是希望婦女讀者們讀完後，也能傳給孩子或

²³⁸ 章興亞，〈中國婦女應上哪兒跑？(二十九)〉，《婦女旬刊》，634期(1935年)，頁2-3、徐悲鴻，〈中國婦女應上哪兒跑？(四十二)〉，《婦女旬刊》，637期(1935年)，頁2。

²³⁹ 編者，〈兒童故事專號前言〉，《婦女旬刊》，期638(1935年)，頁1。

是弟、妹、姪子，藉由與兒童共同歌唱，增進家庭娛樂，也能助長兒童識字和造句的能力。²⁴⁰

在故事、歌謠以外，刊物也刊載許多育兒方針，包括孩童疾病原因和預防方式，或是日常生活行為舉止。滄陵認為孩童夜間遺尿(俗稱「尿床」)有多種原因，包括父母或褸母教育不良，未訓練孩子定時排尿，又或者是因為床鋪棉被過於溫暖，加上睡前可能攝取過多水份等，促使孩童尿意增加；劉儂認為婦女智識提高後，多於社會中擔任職業女性，不再專任家政，然而「育兒一事，則不能不認為婦女之唯一天職」，因此透過撰寫育兒經驗談，如日常清潔、哺乳、衣服穿著等等，供女性讀者學習。²⁴¹雪蕉女士指出父母應在打雷、月蝕等氣象出現時向孩童講解，避免他們因為不解而感到恐懼，又或者當孩童得到玩具後，喜歡反覆審視甚至拆解、實驗，父母不應禁止、責罰，因為此時正值兒童知識發展時期，父母應該從旁陪伴、教導。²⁴²

然而也有言論指出，各種育兒方針必須建立在節制生育之上，否則將無用武之地。1922年12月，《婦女旬刊》第91期「家庭專號」出版，意圖討論節育議題，可惜的是編輯並未指出此舉是否與同年4月刪格爾夫人(Mrs. Margaret H. Sanger, 1853-1966)²⁴³到中國有關，僅提到此次專號作者之一是時

²⁴⁰ 〈兒童歌謠專號〉收入雲南、貴州、西康、四川、西藏、廣東、湖南、湖北、福建、安徽、江西、江蘇、浙江、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陝西等地歌謠。編者，〈兒童歌謠專號前言〉，《婦女旬刊》，期646(1935年)，頁1。

²⁴¹ 滄陵，〈小兒遺尿的原因和預防〉，《婦女旬刊》，期101(1923年)，頁8、劉儂，〈育兒雜談〉，《婦女旬刊彙編》，期1(1925年)，頁23。

²⁴² 雪蕉女士，〈兒童教育經驗談〉，《婦女旬刊》，期179(1925年)，頁1-2、康，〈怎樣對待特住小孩〉，《婦女旬刊》，期180(1925年)，頁1-2、徐敬哉，〈小孩最初之發達〉，《婦女旬刊》，期216(1926年)，頁1、董堯，〈爸媽溺愛的兒童們〉，《婦女旬刊》，期648(1935年)，頁214。

²⁴³ Mrs. Margaret H. Sanger, 有多種中文譯名，如刪格爾夫人、山額夫人等。本文以

常在《婦女雜誌》刊登稿件的李紹先。²⁴⁴李紹先認為，節制生育首先可保持女性的自由，避免讓女性因懷胎生育便將活動範圍限制在家中。其次，生育過多家庭會有經濟問題，因為懷孕和育兒時期皆須金錢支持，限制生育才能讓家庭免於經濟壓迫。第三，婦女若未待體力恢復又再次懷胎，身體損耗巨大，胎兒也無法健康地在母體成長，即便孩子出生後，也會因為身心俱疲無心照顧。又或者因為孩子眾多，分散教育資源，無法妥善照顧每一個子女。缺乏母親關愛，又無妥善教育的孩子日後若道德感薄弱，則會誤入歧途，造成社會負擔。²⁴⁵

所以不只要節制生育，孩童從小的家庭教育就非常重要，而一切源頭又可追溯到女子教育問題之上，母親若要有足夠的學識和道德，必須有良好的教育，如此才能為國作育英才。²⁴⁶上述節制生育的言論不僅談到過度生育對於母親身體的損害，以及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問題等問題，但更重要的是孩童出生、成長必須建立在良好環境之上，如此方能養育出良好的國民。

在對於女性形象建構過程中，女性因其具有懷孕「功能」倍受關注，成為各種話語中競相表述的對象。生育議題更是隨著清末以來亡國滅種、強國強種的話語下受到注視。²⁴⁷學者曾就近代中國節育的觀念提出反思，認為「母性自決」、「生育自主」雖是五四時期婦女解放的主題之一，但根據 1920 年代中國至 1950 年代臺灣的節育運動經驗顯示，節育和人口問題、社會經濟發

1922年6月《婦女雜誌》「產兒限制專號」中的譯名為準。

²⁴⁴ 張儷娟，〈編輯室燈下〉，《婦女旬刊》，期91(1922年)，頁8。

²⁴⁵ 李紹先，〈為什麼限制生育〉，《婦女旬刊彙編》，期1(1925年)，頁28-29。

²⁴⁶ 陳獨醒，〈兒童環境底改造〉，《婦女旬刊彙編》，期1(1925年)，頁53-56。

²⁴⁷ 趙婧，〈近代上海的分娩衛生研究(1927-1949)〉(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頁2。

展密切關聯，致使女子生育與否已非「個人私事」，而是「國家公事」。²⁴⁸畢汝剛《公共衛生學》論道：

婦嬰衛生之重要，國家之強盛，基於民族之健康，民族之健康則又基於婦嬰衛生。蓋忽視婦女衛生，則難忘有健全之嬰兒，不注意嬰兒衛生，則民族健康之基礎動搖，其理至明。²⁴⁹

傳播養育新知識，不只是為了讓女性有健康的身體，而是希望母親們能遵循現代醫學新知蘊育出健康的新生命，進而培養出優良的成長環境，以打造出健壯的新國民，為「中華民族」注入新血，擺脫舊有的羸弱。在原有的「保國強種」、「國民之母」概念之上，1920年後期又興起「健康美」、「體育救國」的理論。學者指出，「健康美」是體能運動下的產物，也是「健康」與「美麗」兩個對等詞的組合。²⁵⁰對此《婦女旬刊》也出現相關文章。

陳鳳雅指出過去中國社會不論男女皆沒有「運動」這個概念，即便有也將運動視為妨礙學業發展，如此概念致使外國人稱中國為病夫。但陳鳳雅表示現在的學校已不再如此了，校方相信運動能使身體強健，提升學習效能。²⁵¹錢一葦認為婦女必須注意身體健康。身體不健康，即便透過化妝、衣服修飾也缺乏生動的美感。女性應該要追求健康美、姿態美，必須廢除一切妨害身體的裝束和修飾，如纏足、束胸、穿耳洞、化妝品等，並需要從事運動鍛鍊，改善體態，並注意飲時起居的衛生，他特別強調：

只有康健美才能打破中國的積弱，使種類優生化。只有姿態美才能掃蕩苟且墮落的醜態，收到民族傑出的效果。如此才能達到國加強盛的

²⁴⁸ 呂芳上，〈個人抉擇或國家政策：近代中國節育的反思—從1920年代《婦女雜誌》出版產兒限制專號說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12(2004年)，頁195。

²⁴⁹ 畢汝剛，《公共衛生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頁19。

²⁵⁰ 游鑑明，《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頁44。

²⁵¹ 陳鳳雅，〈運動與學業〉，《婦女旬刊》，卷16期1(1932年)，頁1。

途徑。²⁵²

相較於古典文學中的女性弱不禁風，此時的新女性要追求真正的「女性美」，這樣的美不是用化妝品或衣著就能顯現的美，而是建立在身體健康、有智識才能之上，尤其是能使孩童在健全環境中成長的家政知識。

二、一家之主

《婦女旬刊》如同《婦女雜誌》一般，創刊以來，曾數次向讀者介紹各種家政知識，將維護家庭大小事務的責任交付於女性。學者指出，《婦女雜誌》是一本為家庭服務的刊物，凡與女性生活有關的問題都是刊物討論的對象，其中家政知識更是不可或缺。論者們藉由科學、衛生等新式理論，解釋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應注意的事項，灌輸新知給女性，改變主婦們主持家庭的方式。²⁵³然而觀察《婦女旬刊》中的家政知識討論可以發現，除了前述養兒知識外，對於更瑣碎的家務，如買菜、煮飯、洗衣等皆未提及。論述多半是討論婦女如何運用有限資源，應付家庭每日開銷。

劍松認為家庭組織完善與否將影響一國的興衰。主持家政的責任在於婦女，所以家庭的興衰端看主婦是否賢良，家裡要先能穩定，丈夫才能安心在外工作，所以主婦如何治理家庭非常重要。²⁵⁴類似的主張在「婦女回家」論戰中更加頻繁出現於刊物之中。然而如同張儷娟在創刊時所說，論說文只談理論和理想，卻未提供實際方法讓讀者依循操作，根本只是紙上談兵。

²⁵² 錢一葦，〈婦女美的問題〉，《婦女旬刊》，期650(1935年)，頁233。

²⁵³ 游鑑明，〈《婦女雜誌》(1915-1931)對近代家政知識的建構：以食衣住為例〉，《當二十世紀中國女性遇到媒體》(台北：五南圖書，2017)，頁317。

²⁵⁴ 劍松，〈婦女和國家的關係〉，《婦女旬刊》，卷17期13(1933年)，頁2。

所幸 1935 年《婦女旬刊》將第 645 期定為〈婦女生活經驗專號〉，編者指出此次專號目的是刊登日常生活經驗，讓婦女得以從中學習所需要的知識。²⁵⁵其中光容便以寡婦身份分享個人持家經驗，她提到丈夫生前為公司職員，家中除夫妻倆外另有婆婆要照顧。丈夫每月薪水 120 元，足夠 3 人使用，因此光容得以在家擔任家庭主婦。然而第 3 年起丈夫臥病在床，作者只得擔任鄉村小學代理教員，成為職業婦女，但薪水僅有 32 元，在這段期間中兩人共生了 3 名小孩。丈夫過世後，光容成為正式教員，薪水增至 45 元。值得注意的是，除住宿、膳食等必要花費，為使孩子受到妥善教育，現階段的教育費便佔所有開銷第二位(6%)，此外，光容還希望子女日後還能繼續升學，因而將儲蓄比例提高至所有花費的第一位(17%)。²⁵⁶

雖然文章並未解釋光容為何如此具有遠見，但從她的教職員身分便可知她必定受過教育，這便呼應先前所提，兒童教養問題始於女子教育，女子要先受教育才能在日後主管家政時，將有限資源分配到最重要的事物之上。

本章藉由文本分析以及編輯群的改變，將《婦女旬刊》內容以三個主題討論，呈現女子的不同樣貌。舊時才女與民國時期所謂的「舊派」文人創作的詩歌、詞曲以及小說雖然在新文學作家眼裡開新文化倒車，但就內容而言，卻是真實反映現實社會中女性面臨的困境，也透過明清才女文化補白女性在文學歷史中的空白。隨著社會風潮演變，城市中的成年女性開始踏入職場，追求經濟自主，未成年女性也進入校園學習。民俗學研究者們也將各地婦女狀況刊於媒體，社會頓時充滿各種不同女性形象。然而並非所有人皆贊同這樣的多元發展，邁出家門，踏入社會的女性被部份人士視為拋家棄子，不顧國家、民族的未來發展，部份婦女因此退回家庭。

總之，本章希望藉主題式分析《婦女旬刊》中的各種女性樣貌，試著感

²⁵⁵ 編者，〈婦女生活經驗專號前言〉，《婦女旬刊》，期645(1935年)，頁1。

²⁵⁶ 光容，〈女主婦治家的經驗談〉，《婦女旬刊》，期645(1935年)，頁2-3。

受那些歷史中的女性如何被社會大眾看待，以及她們又如何自處於 1920 至 1948 年間的時局變化。



第五章 結論

一、期刊研究的新方法：刊物中的社會關係網絡

本文除了運用過往婦女史和期刊史研究者們慣用的文本分析之外，更對編輯群與作者之間進行各別研究，最後不僅找出他們之間的社群關係，更可以藉由這項發現得知刊物在戰前的經營方式。

中華婦女學社為經營並確保《婦女旬刊》能持續發行，運用多種行銷策略，如封面裝幀設計，邀請知名畫家繪製封面、政要題字，並與其他知名出版社、社團交換刊物、互登廣告，或主辦、參與地方活動，延攬讀者，增加社會信望，再廣設分銷經理處。何以在眾多畫家、社團之中，中華婦女學社選擇與他們合作？經第二章研究成果指出，關鍵在於學社成員與合作夥伴的社會關係，或為親人，或為友人、同學。

過去對於刊物中的廣告研究方法多半著重在分析廣告內容，結合消費文化和國家利益，或是以性別視角做切入，解析廣告與女性的關聯性。但並未注意廣告商與出版社之間的關係。本文先透過《婦女旬刊》中的廣告詞，再追溯廣告商身分，進而找出關聯性。以第二章討論的中華婦女學社與上海三廉學社為例，藉由《婦女旬刊》各地經銷商的廣告得知，三廉學社社長鄧履冰正是《婦女旬刊》上海代理商，因此不僅《婦女旬刊》中可以見到三廉學社的廣告，也可以從鄧履冰主編的《幻術月刊》找到《婦女旬刊》廣告，兩者互投廣告拉抬彼此，達到互利共生。

除了行銷策略，編輯的社群關係網絡也影響到《婦女旬刊》不同時期的編輯團隊和文章內容改變。第三章在分析行銷作為以外，中華婦女學社的社長張儷娟還與營業部主任何慨秋抓住文化市場脈動，因應時局變化而持續更動文章編輯團隊。例如創刊之初正處於新舊文學交融時期，恰逢刊物缺少稿

件，總務部主任何慨秋便向先前參與的秋聲社購買稿件，或是邀請新光郵票會認識的蘭社、綠社成員擔任編輯。然後這幾個社團的文學創作風格使得《婦女旬刊》討論婦女的文章，除了透過論說文闡述，還以小說、詩詞、雜文等文類呈現。第四章即以文本分析出發，解析編輯群更動對執筆陣容產生的變化，並進一步論述不同編輯團隊如何運用各種文體呈現女性的多重角色和形象。

鑒於本文初步研究成果不禁令人思考，若是之後的期刊研究者也能對刊物的編輯、作者、廣告商等角色進行身分考證，是否也能從中找出類似《婦女旬刊》間的社會關係網絡？本文研究目的不只希望能充足近現代報刊史研究的數量，更希望能藉由不同的方法使未來研究能以其他角度切入。若研究者日後持續挖掘刊物和知識建構者之間的聯繫，相信將使報刊研究有更多不同的觀看角度。

二、「跨時代」的《婦女旬刊》

《婦女旬刊》的發行跨越 1920、1930 和 1940 年代，就發行歷程看來確實跨時代。在刊物編輯群、作者群，由起初文學社團，轉變為民俗學研究社團，到戰後打破過往社團主導，改為個人投稿形式也有著時代的變化。文本呈現方式也由起初文白不分的小說、詩詞、雜記，轉變為帶有新式標點符號的白話論說文。然而，《婦女旬刊》的經營理念和辦刊宗旨是否也隨著時代的產生變化？還是「跨時代」的一層不變呢？

《婦女旬刊》發行旨趣提到：

婦女久受環境束縛之困苦，欲解決一切問題，須先研究過去及現在社會情形，方可解決。本刊對於此項尤為努力進行，討論切實方法，而

裨實益。家庭為吾人安樂之鄉，公暇事畢，互相聚首言歡，較勞神傷財之遊戲場，高尚良多。吾國家庭現在舊新兩式並行，優劣之點各有弊端，究竟應從何法，方可有利。本刊對於此項廣徵群重之狀況，取其善美處，公告世人。兒童為將來優秀之國民，國之強盛，全賴青年，故培養兒童高尚人格，為急迫之事，本刊對於此項文字，以能實施者刊布，為家庭教育助力。²⁵⁷

1920年，中華婦女學社受新文化運動影響，先有感中國女子深受過去禮教、家庭限制，故提出改革婦女地位之說，再嘆中國社會當時正處在新文化與舊傳統相遇、衝突、融合共存之際，所以響應社會風潮創社並發行《婦女旬刊》。一方面希望藉由刊物傳播知識、宣揚理念，使女子接受教育、養成工作能力，培養高尚人格，最後達到經濟獨立、自舊式家庭和社會壓迫中解放，改善家庭生活，如此不僅能提升女子社會地位，同時也帶給兒童青年良好成長環境，使他們成為國家未來優秀、健壯的國民，這樣才能在根本上國家強盛。

另一方面，在認同社會需要改革、女性必須解放之餘，更期許中華婦女學社能夠擔任新思想與舊道德間緩衝、溝通的橋樑，扮演循序漸進的啟蒙者。在中華婦女學社看來，新舊相遇所產生的衝突，實在是因為年輕人對於過去社會有太多不滿，所以當新理想，如婦女解放、社交公開、自由戀愛、經濟獨立等理想進入中國後，有感於國家、民族羸弱，所以掀起軒然大波，學子們無不趨之若鶩，然而一知半解的「跟風」行為造就對立的產生。

以《婦女旬刊》而言，因為它的小說、詩詞，和部分論說仍屬於舊時代文章體制和社會思想，所以被時人批判違背新文化運動崇新、改革、進步的精神。但就中華婦女學社和《婦女旬刊》的立場出發，認為文化界、出版界一時之間捨棄過去已沿用多年的閱讀文體，大幅更動刊物內容和言論立場，

²⁵⁷ 〈婦女旬刊發行旨趣〉，《婦女旬刊彙編》，期1(1925年)，頁83。

將令讀者無論是在知識涵養，或是心態轉變無法跟上刊物和時代更新的速度，致使放棄閱讀。對於出版社而言，讀者不訂閱則出版社倒閉；對於整體社會而言，對立產生源於溝通的欠缺，雙方各說各話缺少交流後，只會使改革更加困難。有感於此，《婦女旬刊》決議抱持中立立場，投稿形式不拘泥於論說文，且作品立場兼容並蓄，只有立論充足，即便與總編輯持反對意見依然刊登，提供各方立場的支持者一個公共空間申論已見。

儘管此等中庸主義遭逢讀者，乃至於其他編輯的抨擊，但在總編輯張儷娟堅持之下，女子的形象才得以透過不同樣貌出現在讀者面前。雖然最後刊物傾向傳統的「賢妻良母」形象、功能塑造，才女詩詞、小說敘述當中也帶有傳統禮教的道德規範成份，但在這些限制之外，讀者看到的是女性創作能力，和其筆下述說的情感和生活。民俗學研究更是讓讀者了解到城市以外，或外國女性是過著何等活潑奔放的日子，她們不僅可以走出家門從事學習、勞動，更能利用歌謠大膽展現情慾。這些行為舉止表現女性的能動性，突破五四時期對於女性總是活在男性壓迫之下，需要被解放的論述。

馬育新《近代中國女報人與女權主義，1898-1937》認為，學界已有眾多關於近代婦女報刊的研究，不過尚未有系統性的研究中國女性印刷媒體，闡明女性新聞業、女性主義論述、和女性主義實踐三者之間的關係。該研究指出女報人如何在 1898 年至 1937 年間利用期刊這個公共空間進行論述，開創了女性議題的公共論述空間，挑戰男性主流觀點，提倡婦女權利。²⁵⁸張儷娟的態度即展現她對於社會發展的擔憂、疑慮，所以藉由創辦刊物回應時局變化。即便《婦女旬刊》不如其他女性刊物有著鮮明立場，但這就是總編輯以及文章作者們對於新文化、新思想的回應方式，即便戰後總編輯不再是張儷

²⁵⁸ Yuxin Ma, *Women Journalists and Feminism in China, 1898-1937*, Amherst, NY: Cambria Press, 2010.

娟，刊物內容仍然兼容並蓄，《婦女旬刊》的經營理念並未隨著時局變化而有所改變，而是跨時代的延續。

過去總以為「德先生」、「賽先生」代表的民主、科學、進步即是五四新文化時期的樣貌，但是我們得以藉由《婦女旬刊》看到，並非所有人皆一頭栽進那股改革浪潮之中。撰寫論文之際，臺灣正處於無論政治事件、社會運動都要選邊站的年代。社群網站中意識形態強烈的論述粗暴的分化年輕人與中老年人，好像只有年輕人才重視國家未來發展，所作所為皆是代表進步價值，社會必須依照此方向前進，否則就是與中老年人的保守態度沆瀣一氣。如此分化不只無視個體間存在的差異，更是假設各個價值觀之間有明確的界線。此外，雙方在社群網站中經營的社團或粉絲專頁彼此間雖然存在錯綜複雜的關係，但基本上社團成員或閱讀，甚至協助傳播文章的讀者仍屬於「同溫層」，在相同的價值觀下互相取暖，但始終缺少與對立群體對談，致使社會裂縫日趨擴大。撰寫此文不僅是希望能為學術盡微薄之力，更是對自己也曾是那些畫定明顯界線、認為世界非黑即白，相信自己始終處於進步力量一份子的自省。

本文雖已試圖在前人研究方法上另闢途徑，以社會關係網絡分析刊物經營策略和風格演變過程，但文中尚有諸多不足之處。以封面設計為例，在歷史學「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行規」下，雖然隱約認為刊頭題字人與圖畫家與《婦女旬刊》編輯何慨秋、張儷娟等人有深層的社會網路，卻也只能先將題字人和畫家資料列出，並先以總編輯自述內容，以「名人效應為刊物增加買氣」作為解釋，將關係導向商業合作。但值得相信的是，若是日後研究者也能以社會關係網路的方式去研究刊物內的各項訊息，或許就能完成這塊拼圖。另外在文本分析部分，《婦女旬刊》發行 18 年的歷程中，涉及議題廣泛，舉凡性道德、節制生育、女子教育、國貨運動、消費與女子、職

業婦女、兒童公育、家政知識、民俗學研究……等，但本文僅能對各議題進行初步分析。期望未來能再以專文形式對各別議題進行探討，尤其是同時期刊物間的比較研究，包括文章內容分析、熱門議題傳播速度等方向，如此才能對《婦女旬刊》作出更全面的研究，以完整 1920 至 1940 年代期刊世界的網路。



徵引書目

一、中文書目

(一)期刊、報紙史料

- 《女青年月刊》(上海)，1902-1949年。
《小說月報》(上海)，1910-1931年。
《工商新聞》(上海)1923-1927年。
《幻術月刊》(上海)1922年。
《申報》(上海)1872-1949年。
《秋聲雜誌》(杭州)1918年。
《盍簪》(上海)1923年。
《婦女共鳴》(上海、南京、重慶)1929-1944年。
《婦女旬刊》(杭州)，1920-1948年。
《婦女旬刊彙編》(杭州)，1925-1926年。
《婦女雜誌》(上海)，1915-1932年。
《清華週刊》(北平)，1914-1937年。
《郵票新聲》(杭州)，1926-1931年。
《萬象》(上海)，1940-1945年。

(二)圖書館出版品

上海市圖書館編，《上海市各圖書館所藏本國雜誌聯合目錄》，上海：上海市圖書館，1937年。

上海總商會商業圖書館編，《上海商會商業圖書館目錄目次》，上海：上海總商會圖書館，年份不詳。

上海總商會商業圖書館編，《上海總商會圖書館》，上海：上海總商會圖書會，1925年。

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編，《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館刊》，蘇州：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1929年。

金陵大學圖書館編，《金陵大學圖書館中文期刊備檢目錄》，南京：金陵大學圖書館出版，1935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期刊目錄 第一輯》，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1933年。

漢口市新聞紙雜誌暨兒童讀物展覽大會編，《新聞紙展覽特刊》，漢口：漢口市新聞紙雜誌暨兒童讀物展覽大會出版，1936年。

(三)工具書、史料彙編

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彙編：工業商業》第7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編，《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記(1919.5-1937.7)》，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年。

王余光、徐雁主編，《中國閱讀大辭典》，南京：南京大學，2016年。

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杭州圖書館編，《杭州歷史大事記》，杭州：方志出版社，2006年。

邵洛羊主編，《中國美術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

金陵大學圖書館編，《金陵大學圖書館中文期刊備檢目錄》，南京：金陵大學圖書館出版，1935年。

徐乃翔主編，《中國現代文學詞典：第1卷 小說卷》，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盧震京，《圖書學大辭典》下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

(四)專書

Karl Gerth著，黃振萍譯，《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北京：北京大學，2007年。

孔令芝，《從《玲瓏》雜誌看 1930 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的塑造》，臺北：稻鄉出版社，2011 年。

王文寶，《中國民俗研究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

王文寶，《中國民俗學史》，成都：巴蜀書社，1995 年。

王飛仙，《期刊、出版與社會文化變遷：五四前後的商務印書館與《學生雜誌》》，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2004 年。

由國慶，《民國廣告與民國名人》，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14 年。

余夏雲，《雅俗之爭：新文學與鴛鴦蝴蝶派的場域佔位鬥爭考察(1896-1949)》，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4 年。

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7 年。

李毅民，《集郵家的業績》，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汪洋，《中國廣告通史》，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0 年。

沈建中編撰，《施鰲存先生編年事錄》，上海：上海古籍書版社，2013 年。

周敘琪，《1910-1920年代都會新婦女生活風貌：以《婦女雜誌》為分析實例》，臺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叢刊，1996年。

施愛東，《中國現代民俗學的鼓吹與經營》，臺北：秀威出版社，2018 年。

胡曉真，《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清末民初上海「傳統派」文

- 人與閩秀作家的轉型現象》，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年。
- 唐薇、黃大剛，《張光宇年譜》，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
- 徐昌酩主編，《上海美術誌》，上海：上海圖畫出版社，2004年。
- 徐建融、劉毅強主編，《海派書畫文獻彙編》，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
- 徐國衛，《觸摸歷史：中國西洋畫的開拓者》，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
- 益斌，《老上海廣告》，上海：上海畫報出版社，1995年。
- 曼素恩著，羅曉翔譯，《張門才女》，北京：北京大學，2015年。
- 梁啟超，《新民說》，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
- 畢汝剛，《公共衛生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 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2003年。
- 陳平原，《新文化的崛起與流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 戟鋒主編，《同聲抒懷抱：姚江同聲詩社總編》，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 游鑑明，《當二十世紀中國女性遇到媒體》，臺北：五南圖書，2017年。
- 游鑑明，《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
- 賀麥曉，《文體問題—現代中國的文學社團和文學雜誌(1911-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 項士元，《浙江新聞史》，浙江：之江日報社，1930年。
- 黃可，《漫話海派漫畫》，上海：文匯出版社，2015年。
- 黃書權編，《鍾敬文文集：第一卷 民俗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 楊哲，《風雨世紀行：鍾敬文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
- 趙林，《清末民初浙江新舊文化與文學》，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4年。

談社英，《中國婦女運動通史》，南京：婦女共鳴社出版，1925年。

鄭逸梅，《鄭逸梅選集第六卷》，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鍾敬文，《鍾敬文學述》，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魏紹昌，《我看鴛鴦蝴蝶派》，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

(五)期刊、專書論文

江勇振，〈男人是「人」、女人只是「他者」：《婦女旬刊》的性別論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12(2004年12月)，頁39-68。

呂芳上，〈個人抉擇或國家政策：近代中國節育的反思—從1920年代《婦女雜誌》出版產兒制限專號說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12(2004年12月)，頁195-230。

李妮文，〈關於《婦女旬刊》上周作人的幾篇佚文〉，《文教資料》，期36(2013年)，頁12-13。

李妮文、唐東堰，〈從佚文《惟有孟母可作女範》看周作人的人格理想與家庭教育思想〉，《東華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33期1(2014年3月)，頁20-22。

李國平，〈保守主義：吳地現代報人的文化選擇：以1920年代的《晶報》文人群體為中心〉，《蘇州教育學報》，卷32期1(2015年)，頁26-31。

姚毅，〈「犧牲者」、「受害者」言辭的背後—以《婦女雜誌》的娼婦論述為中心〉，《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12(2004年12月)，頁115-144。

胡曉真，〈文苑、多羅與華鬢——王蘊章主編時期(1915-1920)《婦女雜誌》中「女性文學」的觀念與實踐〉，《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12(2004年12月)，頁169-194。

宮立，〈郁達夫的〈答《申報·婦女園地》沁一先生〉〉，《郭沫若學刊》，期109(2014年)，頁39-40。

徐曉虹，〈詩蟄存早期作品鈎沉〉，《新文學史料》，期4(2009年)，頁132-133。

- 高郁雅，〈從《良友畫報》封面女郎看近代上海的摩登狗兒(Modern Girl)〉，《國史館館刊》，復刊期26(1999年6月)，頁57-96。
- 張哲嘉，〈《婦女雜誌》中的「醫事衛生顧問」〉，《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12(2004年12月)，頁145-168。
- 曹禮軍，〈近代報人小說家群體的代際興替與時代特徵〉，《求是學刊》，卷43期4(2016年)，頁108-115。
- 章庵庵著，〈蘭社詩人戴望舒〉，收入於政協杭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杭州文史資料》第18輯，杭州：杭州出版社，1994，頁27-29。
- 許慧琦，〈《婦女雜誌》所反映的自由離婚思想及其實踐——從性別差異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12(2004年12月)，頁69-114。
- 陳丙瑩，〈戴望舒早期文學創作鉤沉〉，《新文學史料》，期1(2014年)，頁132-140。
- 陳姪媛，〈《婦女雜誌》(1915-1931)十七年簡史——《婦女雜誌》何以名為婦女〉，《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12(2004年12月)，頁1-38。
- 陳香杏，〈清末民初文人的社會網絡：以上海南社為個案研究(1909-1923)〉，《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期8(2009年)，頁141-171。
- 傅宇斌，〈晚清民國報刊所見詩畫書錄〉，收入趙敏俐編，《中國詩歌研究動態：第十四輯古詩卷》，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年，頁327-347。
- 葉中強，〈遊走於城市空間：晚清民初上海文人的公共交往〉，《史林》，期4(2006年)，頁80-86、131。
- 葉韋君，〈個人經驗與公共領域：《婦女雜誌》通信欄研究(1915-1931)〉，《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29(2017年)，頁21-104。
- 臧健，〈「婦女回家」：一個關於中國婦女解放的話題〉，游鑑明、羅梅君、史明主編，《共合時代的中國婦女》，臺北：左岸文化，2007年，頁365-400。
- 潘靜如，〈近代雜誌所載閨秀詩畫考論〉，《漢語言文學研究》，期3(2014年)，

頁50-56。

鍾韻玉著，〈杭州早期文藝報刊〉，收於政協杭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杭州文史資料》第8輯，杭州：杭州出版社，1987年，頁81-84。

鍾韻玉著，〈杭州綠社〉，收入於顧國華編，《文壇雜憶全編》第1冊，上海：上海書店，2015年，頁151-152。

簡金生，〈民國時期漢人對西藏婦女的情色化想像〉，《新史學》，卷25期3(2014年9月)，頁103-142。

簡金生，〈藏人論藏：民國時期藏人的西藏觀〉，《臺灣師大歷史學報》，期50(2013年12月)，頁97-154。

(六)學位論文

蔡佳儒，〈新女性與舊文體——呂碧城研究〉，南投：暨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

趙婧，〈近代上海的分娩衛生研究(1927-1949)〉，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

二、英文著作

Judge, Joan. *Republican Lens: Gender, Visuality, and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Ma, Yuxin. *Women Journalists and Feminism in China, 1898-1937*, Amherst, NY: Cambria Press, 2010.

林振彬，*China Publishers' Directory*, Shanghai: China Commercial Advertising Agency, 1934.



附表

附表一 題字人出現次數和年份

題字人出現次數和卷期(先依照出現次數、次按照筆畫排列)

題字人	次數	年份	題字人	次數	年份
林紓	20	1924、1925、 1935	任衿蘋	1	1922
無題名	16		吳國楨	1	1946
王蘊章	14	1924	吳稚暉	1	1927
劉青	12	1923、1925、 1926、1930、 1936	吳靜	1	1922
張嘉璈	10	1933	吳鐵城	1	1948
無法辨識	8		李作人	1	1925
樓桐孫	6	1929	胡亞光	1	1923
康有為	5	1923、1924、	周瘦鵑	1	1922

		1925			
譚雲珊	5	1928、1931、 1932	張枕綠	1	1922
蔡元培	5	1928、1932、1946、 1947	成舍我	1	1923
于右任	4	1928、1947、 1948	江紅蕉	1	1922
孔祥熙	4	1930	畢倚虹	1	1923
王正廷	4	1928、1931	唐駝	1	1923
王寵惠	4	1930、1948	徐謙	1	1923
孫科	4	1934、1946、1947 1948	袁唐志	1	1923
包天笑	3	1925	許世英	1	1947
居正	3	1947	曾仲鳴	1	1934
劍代	3	1924、1925	童愛樓	1	1922

陳立夫	2	1933	馮少山	1	1928
雪舫	2	1929	黃少谷	1	1948
彭學沛	2	1946、1947	董顯光	1	1947
馮文鳳	2	1925	趙眠雲	1	1922
薛篤弼	2	1929	樊守忠	1	1923
靈園	2	1923、1925	鄧文儀	1	1947
陳小蝶	1	1922	鄭子褒	1	1922
徐天嘯	1	1923	蕭攔	1	1922
仲瑾	1	1922			

附註：附表一所列是1922年第81期至1948年第748期的刊頭題字人，大部分是政府官員與知名文化界人士。因資料和篇幅有限，無法對所有題字人身分進行考證和列出所有生平資料。

附表二 《申報》中的《婦女旬刊》贈書廣告

日期	內容
1922年 10月31日	〈奉送珍品〉茲為本社四週紀念之期特，將出版之書報廣送海內外各界士女，按本社迭次印行各品均非常美麗，閱之不忍釋手且與女界以及兒童方面尤為注意。想海內外諸士女定表同情。 <u>欲謀家庭幸福者，請乘此良機函索，當即奉贈。但每位須附郵花三分，並開明地址寄杭州興忠巷婦女學社辦事處。</u> 又本社招請全國女學校學者為通訊員，詳情函詢即奉告。
1925年 11月25日	〈新消息〉本社為女界所辦已達六年，各種出版品於女界、於家庭及個人有益良多。茲為酬答各界士女愛護盛意，新出一書內容豐富，裝訂印刷均極精美， <u>不取書資祇收每本寄費一角郵花可代</u> ，所存不多尚希從速。《婦女旬刊》出達二百期，每期三分，全年三十六本一元二角。又將五年本刊各稿重加選輯，趣味深厚定名彙編，一元二角，海外加倍。各界士女欲謀家庭幸福，社會教育之改良，胥賴是書，為之引導。家庭及個人不可不備。現徵求關於女界及家庭方面問題稿件或各地女界新聞及小品文字，如蒙惠寄刊布後當以現金或書報酬答盛意。杭州馬所巷35婦女學社。 ²⁵⁹
1926年	〈注意良伴益友〉本社為研究人士娛樂及提倡女子教育、家庭間幸福計，編印此項專冊供各界購讀，有益身心，促成家庭和睦，樂趣

²⁵⁹ 〈新消息〉，《申報》(上海)，1925年11月25日，版9。

4月6日	尤多。旅居他鄉人士閱之尤能解除寂寞，實為今日男女界寶書。 <u>剪此券附郵九分即奉</u> 。杭州直骨牌弄十九號婦女學社啟。 ²⁶⁰
1926年 4月6日	〈注意徵求友侶〉諸君置身各界中，終日忙碌片刻，無暇對於家庭。欲否得一經驗豐富，學識淵博，良導師助君，使公餘返家得有一種甜蜜氣象充滿家庭。 <u>詳情剪此券并六分寄費即奉告</u> ，又印《婦女彙編》每冊一元二角。杭州馬所巷三五號婦女學社。 ²⁶¹
1927年 11月16日	〈注意良伴益友〉本社為研究人士娛樂及提倡女子教育、家庭間幸福計編印。此項專冊供各界購讀，有益身心，促成家庭和睦，樂趣尤多。旅居他鄉人士閱之尤能解除寂寞，實為今日男女界寶書。 <u>剪此券附郵九分即奉</u> 。杭州直骨牌弄19號婦女學社啟。 ²⁶²
1928年 8月12日	〈婦女〉欲謀高尚家庭，職業研究，女子實際問題，得無上之幸福，請閱本刊。可使閱者有意外之利益。 <u>每份祈附郵花六分，直接向杭州直骨牌街婦女學社索取</u> ，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均有代售。 ²⁶³
1928年 8月14日	〈婦女〉欲謀高尚家庭，職業研究，女子實際問題，得無上之幸福，請閱本刊。可使閱者有意外之利益。 <u>每份祈附郵花六分，直接向杭州直骨牌街婦女學社索取</u> ，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均有代售。

²⁶⁰ 〈注意良伴益友〉，《申報》(上海)，1926年4月6日，版5。

²⁶¹ 〈注意徵求友侶〉，《申報》(上海)，1926年4月6日，版5。

²⁶² 〈注意良伴益友〉，《申報》(上海)，1927年11月16日，版12。

²⁶³ 〈婦女〉，《申報》(上海)，1928年8月12日，版18。

	264
1928年 8月16日	〈如何安慰你的伴侶？〉君欲解決此事乎？刻印有家庭及女子等問題專書，閱之定使君滿意，且增人生幸福。欲閱請附郵票八分，向 <u>杭州直骨牌街婦女學社索取</u> 。 ²⁶⁵
1930年 4月30日	〈贈送名貴國貨專號〉內載國貨言論，並附小品文字。 <u>極有興趣請寄郵費一角二分即奉</u> 。杭州直骨牌街19號，儷記興號。 ²⁶⁶
1932年 9月22日	〈贈送名書〉處此新時代，欲求身心安樂，非謀家庭幸福不可，茲婦女界編纂名貴刊物，今男女界意趣，閱不忍釋， <u>附郵花十分作寄書費即奉一份</u> ，欲索祈速杭州直骨牌弄十九號婦女社。 ²⁶⁷
1932年 9月22日	〈贈送家庭刊物〉：欲謀家庭幸福，增進女子學識， <u>附郵花一角當奉刊物三本</u> ，使閱者滿意。杭州直骨牌弄十九號婦女學社。 ²⁶⁸
1933年 7月22日	〈遲來不及〉前次贈送名書，索者紛紛。足徵各界關心家庭幸福，謀身心之安樂。 <u>因書少未能遍應，刻已添印尙盼國人從速函索。請附郵花十分作寄費，即將華麗豐富女子刊物郵奉</u> 。杭州直骨牌弄十

²⁶⁴ 〈婦女〉，《申報》(上海)，1928年8月14日，版18。

²⁶⁵ 〈如何安慰你的伴侶？〉，《申報》(上海)，1928年8月16日，版15。

²⁶⁶ 〈贈送名貴國貨專號〉，《申報》(上海)，1930年4月30日，版12。

²⁶⁷ 〈贈送名書〉，《申報》(上海)，1932年9月22日，版16。

²⁶⁸ 〈贈送家庭刊物〉，《申報》(上海)，1932年9月22日，版16。

	九號婦女社啓。 ²⁶⁹
--	------------------------

附註：《婦女旬刊》曾多次在《申報》刊登贈刊廣告，以增加知名度、提升刊物流通率。附表二呈現的12筆資料是利用《申報》資料庫進行全文檢索所得。



²⁶⁹ 〈遲來不及〉，《申報》(上海)，1933年7月22日，版19。

附表三 1922-1930年作者文章數量表

10篇以上	6-9篇	4-5篇	3篇
金震(24；男)	呂碧城(9；女)	阮毅成(5；男)	張默君(3；女)
張儷娟(19；女)	陳獨醒(9；男)	張陶堦(5；男)	劉王立明(3；女)
蔣春木(18；男)	范海容(9；男)	范烟橋(5；男)	金潘文芝(3；女)
徐碧波(17；男)	沈婉(8；女)	鍾韻玉(5；男)	孫弋紅(3；男)
羅妻梅(15；男)	薄友羊(6；男)	金東雷(5；男)	何慨秋(3；男)
陳蘭言(13；女)	朱天石(6；男)	葉元燦(5；男)	範博理(3；男)
金智周(12；男)	柯定龔(6；男)	金惠(5；不明)	舒新城(3；男)
包天白(12；男)	蔣吟秋(6；男)	素冰(4；女)	施蟄存(3；男)
張函胡(11；男)	施督輝(6；男)	戴滌源(4；男)	夏蒼霖(3；男)
張子俊(11；男)	高秋埜(6；不明)	李伊涼(4；男)	徐因時(3；男)
清舫(11；男)	月影(6；不明)	張慕仁(4；男)	童愛樓(3；男)
樓尹庚(11；男)	徐一蟬(6；不明)	呂君豪(4；男)	高亞魂(3；男)
高遙觀(10；男)	瀟湘淚郎(6；不明)	王天恨(4；男)	張道仁(3；男)
戴夢鷗(10；男)		王受生(4；男)	強一醉(3；男)

馬鵑魂(10；男)	葉國俊(4；男)	範菊高(4；男)	陸靜山(3；男)
	陳行百(4；男)	寧達蘊(4；男)	王正廷(3；男)
卍龕(4；)	鐵庵(4；不明)	龐樂園(4；男)	孫碧奇(3；男)
春花蝴蝶館主(4；)	吳筱圃(4；不明)	姚笑髦(4；不明)	沈家驥(3；男)
			陳筠(3；男)
李光亞(3；男)	大白(3；男)	程紫鵑(3；男)	梅子馨(3；男)
程梅姿(3；不明)	陳于德(3；男)	李鶴雲(3；男)	何一雁(3；男)
琪瑛(3；不明)	陳又龕(3；不明)	何蓉直(3；不明)	陳止止(3；不明)

附註：附表三列出目前所掌握最早的資料1922年第81期至1930年324期，《婦女旬刊》555名作者中，撰稿3次以上的編輯和投稿人83名。扣除無法找到生平資料，也無法從文章內容判別性別的作者13名，女性於其中僅佔8名。

